

中共中央在延安 十三年资料汇编

延安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 编



现代出版社



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资料汇编

延安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 编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资料汇编/延安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 编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 - 7 - 80356 - 031 - 3

I. 中… II. 延… III. 资料—文集 IV. 632 - 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9321 号

编 著: 延安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

责任编辑: 王庆欢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印 刷: 西安建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32 开 850 × 1168

印 张: 8.5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356 - 031 - 3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编委会

主 任:牛兴华

副主任:杨延虎 任学岭

李延明 周许胜

杨 钧 郝 琦

刘志学

编 委:叶晓东 阎虹虹

高万兵 阎晓艺

阎晓天

主 编:阎伟东 孙玉玲

前 言

在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上,“延安时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也是“黄金时期”之一。

从1935年到1948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延安生活和战斗了十三年,使延安成为举世闻名的中国革命圣地。在这十三年里,中国共产党正确地领导了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夺取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成功经验和精神财富。这段历史,被后世称为“延安时代”或“延安十三年”。

鲁迅曾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能为立国、治政、安邦及改造自然、社会,求索出鉴往知来之要道。在纪念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进驻陕北七十周年之际,由延安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组织编写的这本《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资料汇编》,全面理出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历史概况。反映了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的组织机构、主要驻地、重要会议、重大决策、辉煌成绩、基本经验、大事记录、主要领导人的重要活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管辖范围、组织机构、政务活动等,本书集思想性、史料性和可读性为一体,从各个方面解答了人们所关心的有关中共中央在延安期间的革命史的问题。其目的就在于让历史和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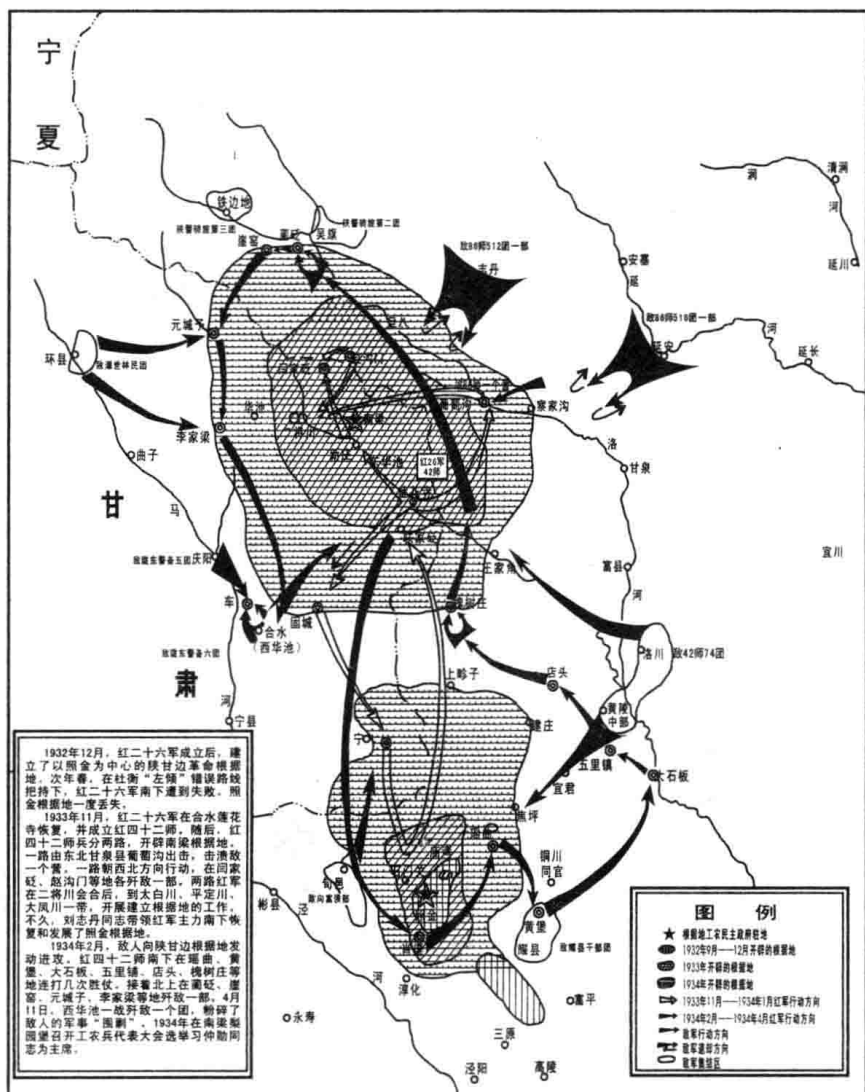
实、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力求以史鉴今,以史育人,存史资政。这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中国人民不朽的革命精神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进步有着现实的指导作用。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力求达到事实准确无误,表述简练明白。但由于涉及知识面太宽,工作量太大,虽然最大限度尽了心尽了力,仍然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编委会
2006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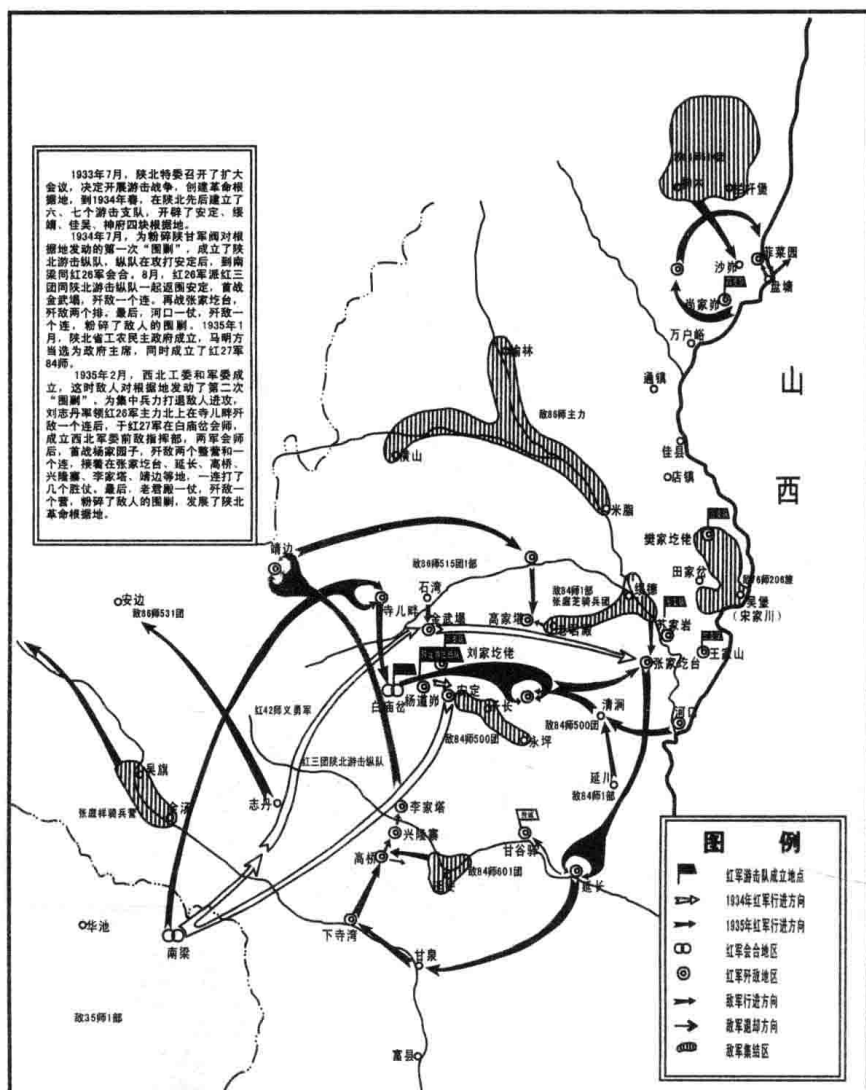
陕甘边根据地发展形势图

(1932.12—193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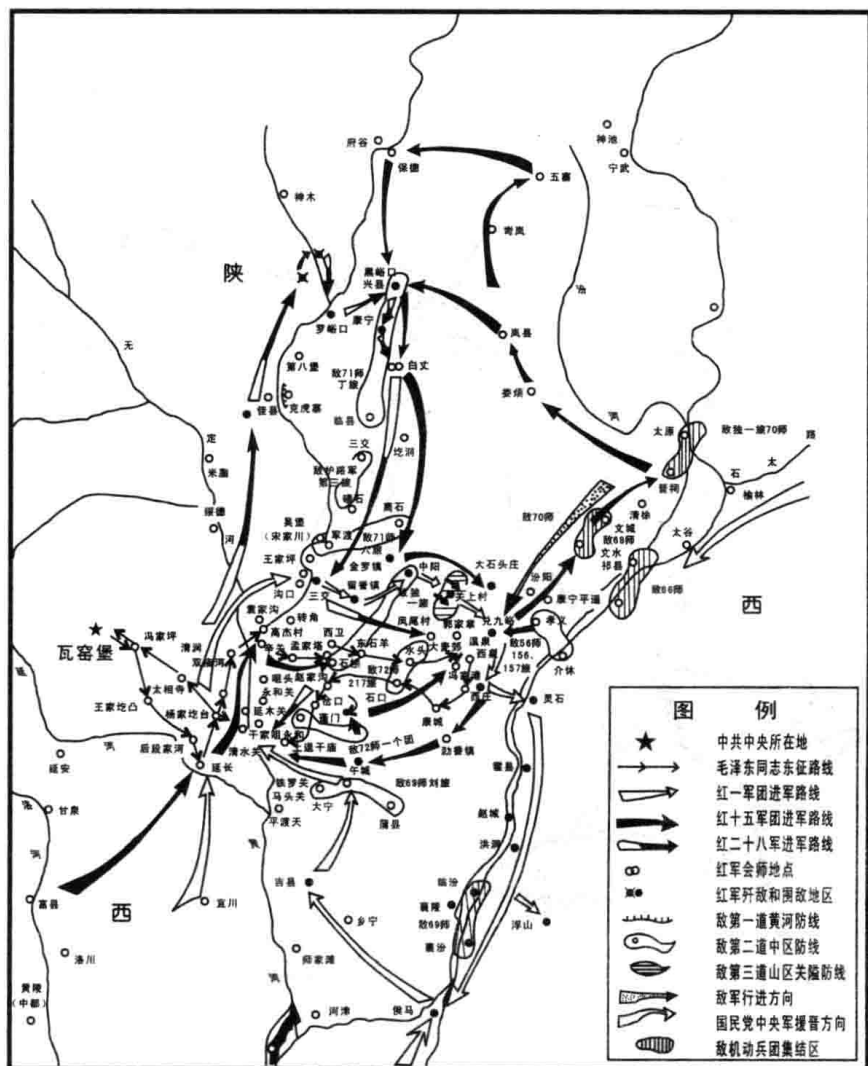
陕北根据地发展形势图

(1934.—193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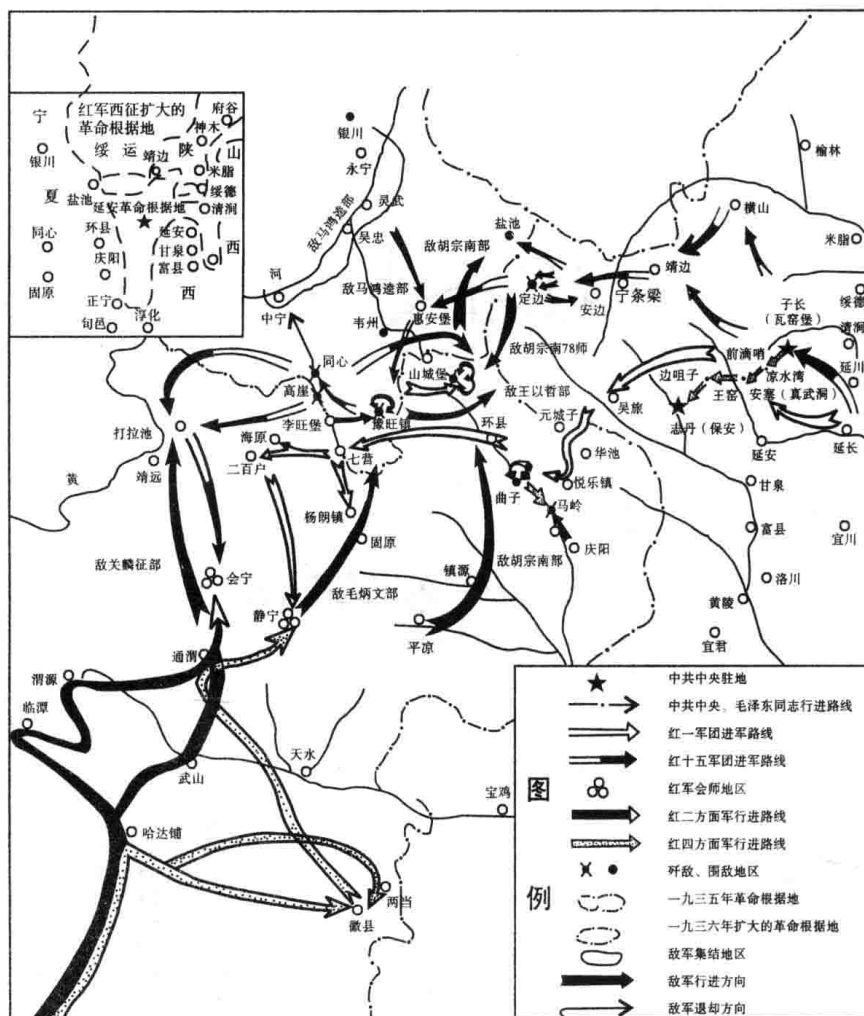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红军东征路线图

(1936年2月—1936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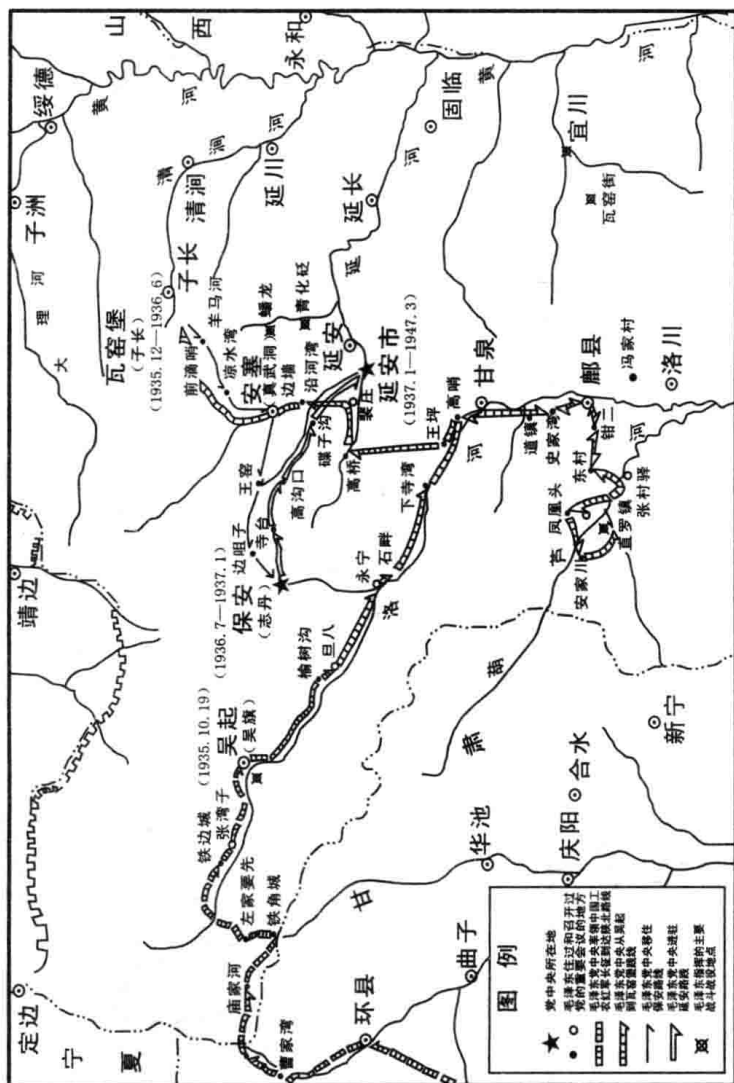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红军西征路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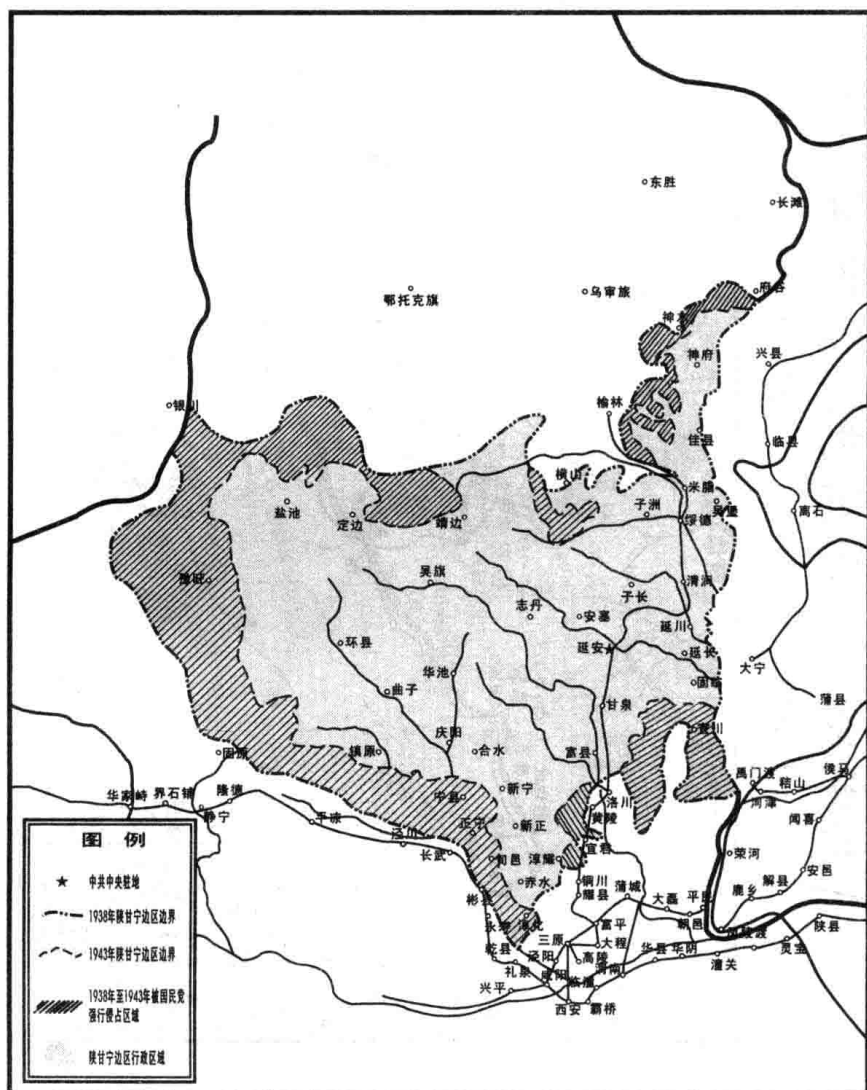
中共中央、毛泽东进驻延安路线图

(1935.10.19 — — 1937.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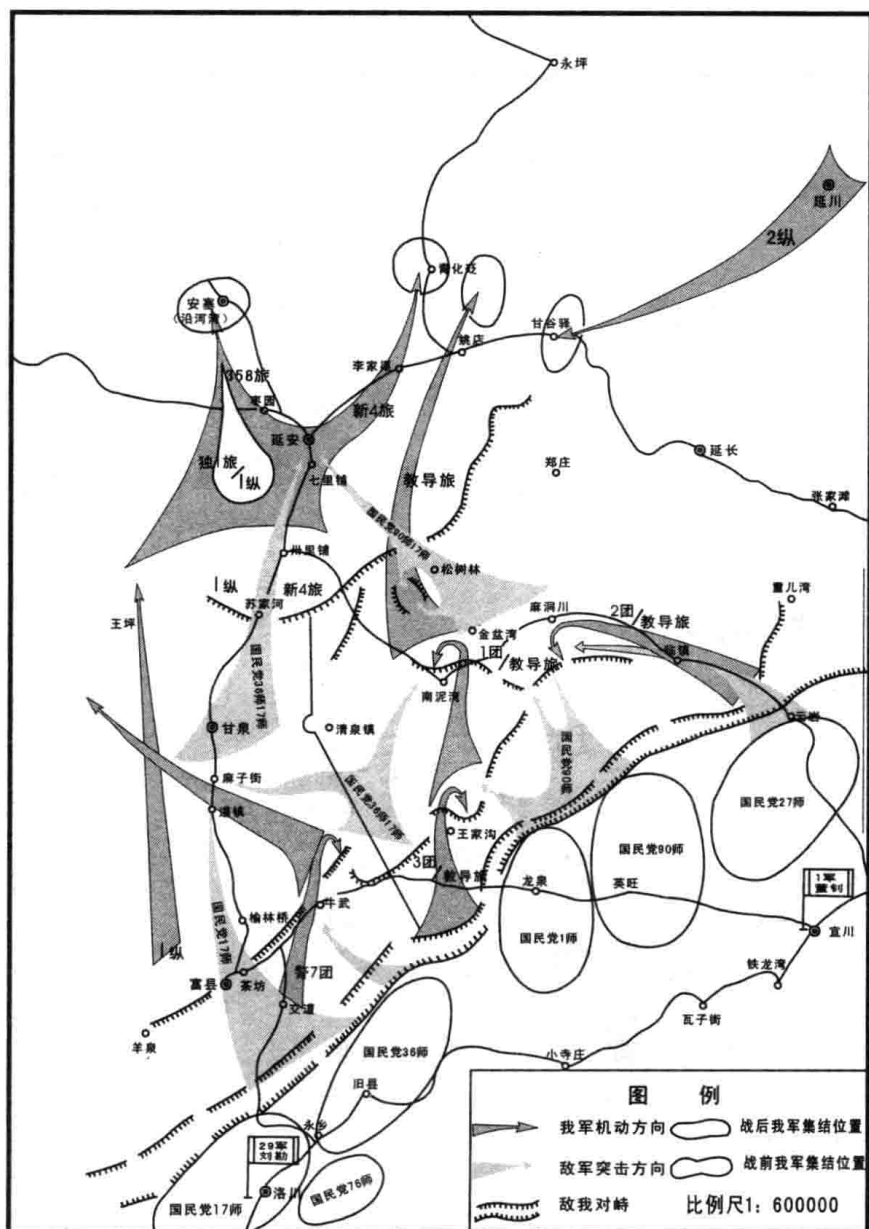


陕甘宁边区行政区域示意图

(1938—19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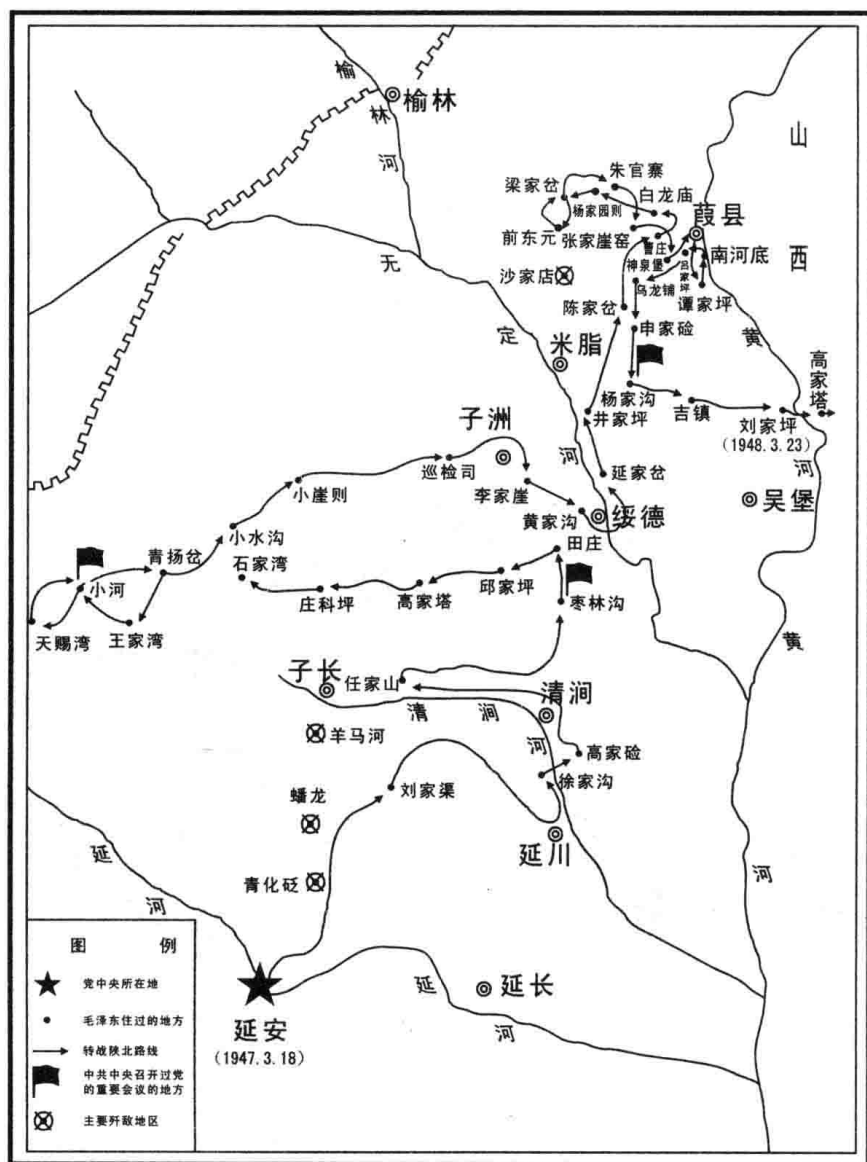


延安保卫战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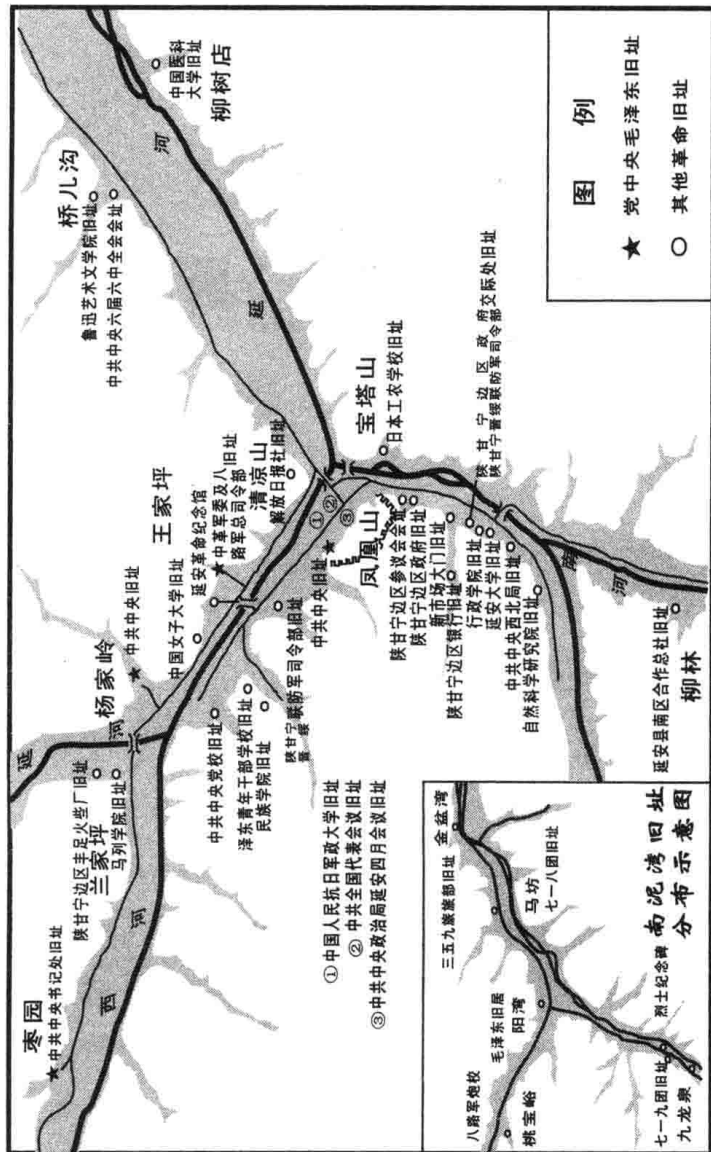
中共中央、毛泽东转战陕北路线图

(1947.3.18—1948.3.23)



中共中央、毛泽东在延安城区旧址示意图

(1937.1.13.—1947.3.18)



第九节 为和平民主斗争	(22)
第十节 转战陕北迎接胜利	(24)

第三章 毛泽东在延安十三年

(31)

第一节 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加强	(32)
第二节 毛泽东的领导和军事指挥艺术达到了炉火纯 青的程度	(34)
第三节 毛泽东创造了“我们这个民族突出的、完整的 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即毛泽 东思想	(40)
第四节 毛泽东开创和实施了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	(45)
第五节 毛泽东率先垂范，精心培育了伟大的延安精神	(50)

第四章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重要领导人在延安的 活动

(55)

第一节 毛泽东	(55)
第二节 周恩来	(62)
第三节 朱 德	(66)
第四节 刘少奇	(68)
第五节 任弼时	(69)

第六节	彭德怀	(72)
第七节	林伯渠	(75)
第八节	秦邦宪	(77)
第九节	王 明	(78)
第十节	张国焘	(79)

第五章 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的组织机构 (83)

第一节	遵义会议确定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83)
第二节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中共中央组织机构	(84)
第三节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943.3)确定增设的 中共中央机关	(88)
第四节	“洛川会议”确定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 织机构	(89)
第五节	转战陕北时中共中央领导机构	(91)
第六节	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西北局)组织情况	(92)

第六章 中共在延安行政组织机构 (94)

第一节	清涧起义组织机构	(94)
第二节	渭华起义组织机构	(94)
第三节	旬邑起义组织机构	(96)
第四节	中共陕甘边特委历任书记名单	(96)

第五节	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组织机构	(97)
第六节	中共陕北特委成员名单	(97)
第七节	陕西省工农民主政府组织机构	(98)
第八节	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	(98)
第九节	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	(99)
第十节	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机构	(99)
第十一节	鲁迅艺术文学院组织机构	(101)
第十二节	陕北公学组织机构	(102)
第十三节	延安日本工(劳)农学校组织机构	(103)
第十四节	延安整风学习组织机构	(104)
第十五节	中央党校学员编制	(104)
第十六节	延安主要文艺社团组织	(105)
第十七节	“抗大”行政组织系统表	(106)

第七章 中共在延安部队序列组织机构

(107)

第一节	西北红二十六军序列	(107)
第二节	西北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序列	(108)
第三节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序列	(108)
第四节	红十五军团序列	(109)
第五节	中国红军抗日先锋军序列	(110)
第六节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亦称十八集团军)战斗 序列	(110)
第七节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战斗序列(一) ...	(112)

第八节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战斗序列(二) …	(113)
第九节 八路军后方留守处部队序列	(115)
第十节 八路军留守兵团序列	(116)
第十一节 八路军南下支队序列	(117)
第十二节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序列	(118)

第八章 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主要驻地

(119)

第一节 吴起镇	(119)
第二节 下寺湾	(120)
第三节 瓦窑堡	(121)
第四节 保 安	(122)
第五节 凤凰山	(122)
第六节 杨家岭	(124)
第七节 枣 园	(126)
第八节 王家坪	(127)
第九节 任家山	(127)
第十节 枣林沟	(128)
第十一节 王家湾	(129)
第十二节 小河村	(129)
第十三节 朱家寨	(130)
第十四节 神泉堡	(130)
第十五节 杨家沟	(131)

第九章 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召开的重要会议

.....	(132)
第一节 瓦窑堡会议	(132)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132)
第三节 洛川会议	(133)
第四节 六届六中全会(扩大)	(133)
第五节 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	(135)
第六节 六届七中全会(扩大)	(135)
第七节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36)
第八节 陕甘宁边区第一、二、三届参议会	(138)
第九节 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	(139)
第十节 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	(139)
第十一节 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	(139)

第十章 陕甘宁边区专员县长名录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各分区专员	(141)
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各县县长	(146)

第十一章 陕甘宁边区时期政务举要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	(167)
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169)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暂行条例	(173)

第四节	陕甘宁边区县政府组织暂行条例	(175)
第五节	陕甘宁边区各县区公署组织暂行条例 ...	(178)
第六节	陕甘宁边区各乡市政府组织暂行条例 ...	(180)
第七节	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纲领(草案)	(181)
第八节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功臣油矿”——延长油矿	(185)
第十二章	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大事记	(191)
第一节	一九三五年	(191)
第二节	一九三六年	(193)
第三节	一九三七年	(195)
第四节	一九三八年	(198)
第五节	一九三九年	(199)
第六节	一九四〇年	(200)
第七节	一九四一年	(202)
第八节	一九四二年	(203)
第九节	一九四三年	(204)
第十节	一九四四年	(206)
第十一节	一九四五年	(207)
第十二节	一九四六年	(209)
第十三节	一九四七年	(211)
第十四节	一九四八年	(214)

第十三章 延安对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 (216)

第一节 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 (216)

第二节 刘志丹和谢子长 …………… (217)

第三节 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和发祥地 …………… (221)

第十四章 中共中央在延安培育的精神支柱

——延安精神 …………… (229)

第一节 延安精神定义概说 …………… (229)

第二节 延安精神的基本内容 …………… (230)

第三节 延安精神的产生和形成 …………… (233)

第四节 延安精神形成的主要标志 …………… (235)

第五节 延安精神的主要特征 …………… (236)

第六节 延安精神的科学体系 …………… (239)

第七节 延安精神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思想基础 … (242)

第八节 延安精神的显著作用 …………… (244)

资料来源 …………… (247)

第一章 “延安时代”的概念

“延安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治上达到成熟的时期，也是领导中国革命成绩最辉煌的时期。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作为毛泽东思想有机组成部分的延安精神，在这一时期产生和成熟。

延安时代，通常是从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算起，到1948年3月21日东渡黄河，离开陕北进入华北为止，共13年的时间。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时代，便于研究、探讨这一时代党领导人民进行的各种活动和毛泽东思想理论和实践诸问题，党史研究者和理论工作者认为，应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来算，延安时代就比较完整了。延安时代，实际上是遵义会议上确定的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正确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辉煌成就的时代。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标志着党在政治上达到成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

“延安时代”又按照这一时代历史发展的轨迹，区分为若干历史发展阶段。

（一）遵义会议的召开和长征的胜利（1935年1月17日至10月18日）；（二）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和陕甘宁革命根据

地的开拓与巩固（1935年10月19日至1936年11月21日）；（三）中国共产党打开局面走向全国，国共第二次合作的酝酿与形成（1936年11月22日至1937年7月6日）；（四）全民抗日战争爆发，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大发展，敌后抗日战场的开辟（1937年7月7日至1941年1月3日）；（五）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战胜严重困难（1941年1月4日至1942年12月31日）；（六）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发展、壮大和巩固，抗日战争的胜利（1943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3日）；（七）争取国内和平民主，努力制止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1945年9月4日至1946年6月25日）；（八）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国民党的军事进攻（1946年6月26日）；（九）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1947年6月30日至1948年9月15日）；（十）战略决战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48年9月16日至1949年10月1日）。

第二章 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至1948年3月23日在吴堡县川口村以南的园则塔乘船东渡黄河，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在陕北战斗和生活了13年。

中共中央在延安领导陕甘宁边区军民巩固和发展了西北革命根据地，战胜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指挥了全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节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

民国23年（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冲破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克服万水千山的自然障碍，经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甘肃、陕西11个省，目的是北上抗日，但落脚点定在哪里，一直踌躇未定。1935年9月18日，部队进入甘肃岷县哈达铺后，发现多种国民党报纸。其中天津《大公报》反映陕北、陕甘边根据地和红军的消息就有9条。如“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区域之势力。”“盘踞陕北者为红军26军……军长刘志丹辖三师……其下尚有十四个

游击支队。此外各种小组及赤卫队等甚多。”“现在陕北状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这些消息，对于外有强敌围追堵截，内遭张国焘严重分裂的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和鼓舞。9月22日，中央军委在哈达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指出：“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接着红一方面军进行整编，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治委员，继续北上准备到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工农红军会合。

10月17日，陕甘支队从定边县分两路入陕，19日抵达吴起镇，进入西北革命根据地。红军到吴起镇看到“赤安县六区一乡苏维埃政府”的牌子，万分激动。为将尾追的国民党军骑兵消灭于革命根据地之外，陕甘支队在吴起镇西山地设伏，打了一场“切尾巴”战斗。21日，全歼国民党军第35师骑兵团，击溃第32师和36师2个骑兵团，打死打伤敌人600余人，俘虏1000余人，缴获战马1600余匹，迫击炮、重机枪数十门（挺）。毛泽东为表彰红军战士的英勇顽强精神和彭德怀的指挥才能，赠诗一首：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枪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11月6日，陕甘支队与红15军团会师于甘泉县象鼻子湾，恢复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番号，陕甘支队改称红一军团，与红15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中央在象鼻子湾召开红军干部会议，毛泽东对红军长征进行了总结，指出红军长征是宣

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这一英雄业绩必将载入史册，号召红军各部之间要加强团结，红军和西北根据地人民群众之间要加强团结，共同完成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任务。

193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到达瓦窑堡，设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撤销中共陕甘晋省委及其领导的西北军委，将西北革命根据地分设为陕北区、陕甘省、神府特区和关中特区，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

11月22—23日，红一方面军在富县西北的直罗镇围歼进犯根据地的国民党军，全歼109师2个团及师直属队，击毙师长牛元峰，击溃106师1个团，是役共打死打伤国民党军官兵1000余人，俘虏5300多人，缴获长短枪3500多枝，轻机枪167挺，迫击炮8门，子弹22万发，无线电发报机2部。11月30日，中央在富县东村召开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作了《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指出直罗战役的胜利给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直罗战役的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就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紧张部署直罗战役的时候，西北根据地的干部和群众反映了一个严重情况。1个多月前，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大批负责干部被捕，有的甚至被杀害。干部群众无比义愤，希望公道处理。毛泽东仔细倾听当地干部群众的反映，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毛泽东说，我们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

的好干部，请大家放心，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的。毛泽东派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王首道和刘向三等火速赶到瓦窑堡，接管西北保卫局的工作，先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王首道等在调查中了解到刘志丹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革命，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委派到黄埔军校学习，积极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大革命失败后，他和其他共产党人一起组织领导了渭华起义，后来又开展陕北游击战争，他和谢子长共同创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创造了条件。这样坚定不移、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被说成“右派”、“反革命”。所谓刘志丹等人的罪行是：执行“富农路线”，是指在土改中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梢山主义”，是指坚持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投降主义”，是指在统战工作中团结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等等。显然所谓“罪状”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直罗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定对刘志丹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同时也严明党纪，对制造这起冤案的有关负责人作出处理。刘志丹出狱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毛泽东说：“你受委屈了！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坐牢也是一种考验，又是一种休息。”毛泽东接着又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这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刘志丹听了喜悦万分，他向毛泽东、周恩来详细汇报了陕北的工作，表示要跟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革命到底。不久，中共中央任命刘志丹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和红 28 军军长。

为建立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1936 年 2 月 17 日

发布《东征宣言》。毛泽东、周恩来随即率红军主力1军团和15军团，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奔赴抗日前线。红军在山西击败了阎锡山的堵截，逼近同蒲铁路沿线，连获多次胜利。正当红军积极准备东出河北、察哈尔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时，蒋介石竟下令从洛阳、浦口、徐州等国防要地调遣国民党军10个师30万人，配合晋绥军拦截红军抗日去路，又令东北军和17路军进攻红军后方，从南、北、西三路蚕食陕北苏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顾全大局、保存抗日实力和表示合作抗日的诚意，当机立断，回师陕北。5月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反蒋口号，呼吁蒋介石及其部下的一切爱国军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东征红军在山西转战30余县，击溃阎锡山30多个团的兵力，歼敌1.3万余人，俘其官兵4000多人，扩红7000余人，筹款近50万元，在山西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1936年5月，红军东征回师陕北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提出“逼蒋抗日”的方针，同时致书国民党中央，呼吁“集中国力，一致对外”，并提议国共各派代表谈判，以实现两党合作抗日。但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些主张，并未被国民政府接受。蒋介石仍然坚持反共反人民立场，在侵占了根据地的吴堡、佳县、绥德、清涧、延川等地后，继续扩张，残酷杀戮群众，夺走农民已经分得的土地，使革命根据地面临严重危机。

为了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打破敌人的进攻和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5月18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西征命令，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由1.7万余人组成左、中、右三路向甘、宁一带进军。经过近两个月战斗，消灭马鸿逵部

主力，俘获人枪各 2000 多，战马 500 余匹，击溃所有向红军进攻的国民党军，解放环县、宁条梁、定边、花马池、盐池、固原、豫旺等城镇。8 月底，革命根据地东西扩大为 600 余公里，南北 300 余公里。

1935 年 3 月，红军第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向四川、西康两省边界转移。9 月，张国焘违抗中央命令，擅自率领左路军（第一方面军与第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决定将两部分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继续北上，左路军由张国焘率领）南下，企图分裂红军。部队南下途中，到达西康的甘孜地区，与由湘鄂川黔根据地突围，经湖南、贵州、云南到达甘孜的红军第二方面军会合。这时，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王震等坚决斗争，张国焘的分裂阴谋终告失败。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一起北上。1936 年 10 月 8 日，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合于甘肃会宁。10 月 19 日，红二方面军也抵会宁，胜利实现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师，结束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1 月中旬，红军主力向东转移，以便再渡黄河，实现对日作战，或是在晋、冀、鲁、豫等省进行机动作战。这时，胡宗南部却分三路向豫旺城进攻。中央军委指示：“敌既继续向我进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打开局面，才有利于统一战线。”主力红军“应即在豫旺县城以东，向山城堡迅速靠近，集结全力，准备打一仗。”红军各部向山城堡南北地区集中。至 22 日 9 时，全歼敌 78 师 1 个旅和另外 2 个团，山城堡战斗胜利结束。向盐池方向进攻之敌，也被红 28 军击溃。山城堡战斗，给胡宗南部第一军以沉重打击。至此，国民党军停止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山城堡战斗结束了西征，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的一仗。

第二节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春，中共中央派李克农到洛川会见东北军将领，又派周恩来、李克农在延安与张学良会谈，达成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协议。8月，为争取民间帮会组织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央派贾拓夫、龚逢春参加在保安马头山召开的哥老会代表大会，与其签订抗日救国协定。12月，“西安事变”爆发，在中共中央统战方针指引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联合抗日，开创全民抗战新局面。1937年2—9月，国共两党经过6次谈判，在“七·七”事变和全国人民抗日呼声的压力下，9月22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1937年9月至1938年5月，统一战线迅速发展和扩大。中共倡导，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团结各党派和民主人士、爱国同胞和海外华侨，掀起抗日救国高潮。

1938年5月至1939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采取一系列巩固边区、反对分裂、保护人民利益的政策，制止顽固派分裂活动，坚持团结抗战正确方针；克服党内右倾投降倾向，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执行党中央自力更生的指示，开展大生产运动，在生产自救中保存团结抗日中坚力量。

1939年11月至1943年7月，国民党连续发动3次反共高潮，企图发展为全国性内战，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3年7月至1945年8月，边区党和政府执行中共中央政策，统一战线工作有新发展，明确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区别，大资产阶级中亲日派与非亲日派的区别，大地主中投降派与顽固派的区别，地主与开明绅士的区别，最大限度团结抗日力量，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国民党在延安等县设立县党部，设有“双重政权”，经常与共产党来往，延安召开纪念会或其他大会，国共两党同时派代表参加，双方都可以散发抗战建国的宣传品。其他党派如“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委员会”即第三党领袖到边区参观，受到边区政府的热烈欢迎。

仅1938年来边区的少数民族有18人，华侨19人，中外记者50人，政府官员63人，军官11人，文化人士90人，科学工作者107人，团体18个，学生2000人。1939年12月21日，边区党委发出《关于吸收知识分子の指示》，培养知识分子入党，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以友好态度对待友军，争取他们抗日；以抗日为前提，争取国际援助；在尊重中国主权与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人来边区游历，参加抗战，从事实业活动等。当年，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制定《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和《选举条例》，其中规定边区一切赞成抗日的民众，通过不记名直接选举产生各级参议会和政府领导成员。1941年提出各级议会和政府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对其他党派在边区活动，只要有利于抗日，从不反对。边区少数民族享有与汉族同等的政治经济权利。1941年，边区政府决定“建立蒙回民族自治区”，成立民族事务委员会，专管民族工作。1944年，边区有天主教堂20处，基督教福音堂7处，佛教会8处，清真寺10余座，还有道教观，入教群众4万人。边区

政府反对资本家过份剥削，但不反对资本家发财。减轻工人劳动强度，但不强调8小时工作制，以10小时为宜。以正确的方法解决劳资矛盾，调动双方的抗日积极性。边区政府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减租减息，保护农民与地主双方的利益。禁止地主向农民索回土地革命中划分的土地和废除的债务，“贫农团”改为“农民会”。允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专家来根据地与共产党合作办学、办报、做事。

第三节 领导了全国的八年抗战

1937年8月22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凯丰、博古、张国焘等和刘伯承、徐向前、关向应、聂荣臻、罗瑞卿、贺龙、李富春、徐海东、张浩、林彪、周建屏、肖劲光、张文彬等军队及各方面的负责人。会议全面分析当时的形势，正确估计国民党片面抗战的危险，指出中共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使已经发动起来的抗战发展成为全面的抗战。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还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内容是：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②全国军事总动员；③全国人民总动员；④改革政治机构；⑤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⑥实行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⑦改良人民生活；⑧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⑨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⑩加强抗日的民族团结。这个纲领全面概括了中共在抗日时期的政治主张，是

中共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行动准则。根据这一纲领，会议确定活动方针：第一，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第二，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群众运动，团结广大人民，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政策进行斗争；第三，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日的前提下，争取全国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实行民主，改善民生，并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以便发动占全国人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的抗日积极性。为了保证上述方针的实现，会议特别强调了“独立自主”放手领导革命斗争的原则。

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 11 人组成，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抗战迅速发展成了全民族的抗战。

1940 年八路军在彭德怀的领导和指挥下，先后组织一百多个团，在华北两千多公里的战线上，向日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史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的主要目标是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摧毁日伪军的据点。百团大战历时三个半月，进行大小战斗 1800 多次，毙伤日伪军 4 万多人，破坏交通线 2000 多公里，拔掉日伪军据点近 3000 个。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主动出击日寇的最大规模的战役，增强了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

在 1941 年到 1942 年里，由于日伪军大举进攻抗日根据地，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根据地面积不断缩小，人口由 1 亿下降到 5000 万，八路军由 40 多万人减少到 30 多万人。根据地的经济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1944 年到 1945 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德国在欧洲的失败已成定局。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也遭到美国的沉

重打击，陷入困境。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鼓舞着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1944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始局部反攻，并取得一系列胜利。在这一年里，八路军、新四军主动出击，共作战两万多次，消灭敌人26万多人，收复大片国土，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到第二年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军队已发展到91万人，民兵发展到220万人。在北起内蒙古，南到海南岛的广大区域内，建立、发展了19个抗日根据地，人口增加到9500多万。日军被迫龟缩到各铁路沿线的一些较大城市里，完全处在人民军队的包围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抗击了侵华的大部分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1945年8月15日，在中国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伟大胜利。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扩大到104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亿多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30多万人，共消灭日军130多万人、伪军118万多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扭转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屡败局面，洗刷了近代以来的民族耻辱，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到振兴的转折点。中国共产党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

第四节 建立了新中国的雏形 ——陕甘宁边区政府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使国民党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形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按照《国共合作宣言》，1937年9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共中央决定，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高岗为边区政府委员（亦称主席团委员），主席林伯渠、副主席张国焘。10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33次会议通过决议（未正式公布）承认陕甘宁边区直属行政院领导，并任命行政长官。陕甘宁边区政府设秘书处、民政厅、财政厅、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厅、公安司令部等机关。边区政府同时设有参议会。

1937年7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例会正式通过陕甘宁边区管辖范围是：陕西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神府、延川、延长、肤施、甘泉、安塞、保安、富县、旬邑、淳化、靖边、安定、定边；甘肃庆阳、合水、宁县、正宁；宁夏盐池，共23个县，总面积为12万平方公里，人口160万。但自八路军主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后，国民政府却不履行诺言，占去淳化、旬邑、正宁、宁县等县城及村镇数百处，计3.06万平方公里，占边区总面积的26%，人口50万，占边区总人口的31%。

1941年11月，为适应新形势，边区辖地分为29个县（市），266个区，1549个乡。

直属县（市）：延安市、延安县、富县、甘泉、固临（宜

川4个区，甘泉1个区）、延川、安塞、安定、延长、志丹、靖边、神府。

三边分区：盐池、定边。

绥德分区：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

关中分区：新正（甘肃正宁1个区，陕西旬邑4个区）、新宁（甘肃宁县与正宁的一部分）、赤水（陕西旬邑与淳化的一部分）、淳耀（陕西淳化3个区，耀县2个区）。（后增加同宜耀县，由陕西同官、宜君、耀县组成，称关中东行政区）。

陇东分区：庆阳、合水、镇原（甘肃镇原一部分）、曲子（由庆阳马岭区、固原三岔区、环县5个区组成）、环县、华池（甘肃庆阳大部、陕西定边、靖边各一部分）。

1948年，地域扩大，设置黄龙分区、西府分区、榆林分区、大荔分区。

1949年3月，陕甘宁、晋绥行政管理统一，成立晋西北和晋南2个行政公署。陕甘宁边区辖16个分区、144个县（市），面积28万平方公里，人口800多万。

新中国成立后，撤消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建制。

第五节 在窑洞大学里培养了一大批革命英才

1937年前，延安城是一个只有3000多人口的小城，各方面都很落后。中共中央到延安后，利用延安比较安定的环境与络绎不绝而来寻求真理的有为青年相结合，创办了大批干部学校，整个延安成了一所窑洞大学，成了一座革命的大熔炉，培养出了一大批革命英才。

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的各类干部学校有：中央党校。1935年12月在瓦窑堡恢复成立。1939年迁到城北的小沟坪。这是

一所对党的高中级干部进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学校，先后任校长、副校长的有董必武、李维汉、康生、陈云、邓发、毛泽东、谢觉哉、彭真等。1943 年经改组，学员共分为六个部，校部与一部设小沟坪，二部以女子大学为基础设王家坪，三部以中央研究院为基础设兰家坪，四部以军事学院为基础设大砭沟（又称文化沟），五、六部以西北局党校为基础设马家湾。

鲁迅艺术学院。1938 年 4 月成立，校址初设北门外，1939 年 8 月迁至桥儿沟。是培养文学艺术干部的学校，沙可夫、吴玉章、周扬、赵毅敏先后任院长、副院长。在延安开办的七年半中，共办文学系四届，戏剧、音乐、美术系五届，共培养各类专业生 685 人，其中文学系 197 人，戏剧系 179 人，音乐系 162 人，美术系 147 人。1945 年 11 月迁往东北。

中国女子大学。是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1939 年 7 月成立于王家坪山下，校长王明，副校长柯庆施，1941 年 8 月并入延安大学。

陕北公学。1937 年 8 月成立，校址初设清凉山下，后移至城北 10 里处的杨家湾，校长成仿吾，副校长李维汉。该校在陕西关中、晋东南、晋察冀设有分校。1939 年 7 月，一部分师生并入华北联合大学，一部分仍留延安。1941 年 9 月并入延安大学。

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1940 年 5 月在安青训班的基础上创办的，校址设在文化沟。1941 年 8 月并入延安大学。

行政学院。校址在南桥西山，是培养行政领导干部的学院。

民族学院。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学校，1941 年 9 月在延安大砭沟（又称文化沟）成立，院长高岗，副院长高克林。该校有蒙、回、藏、彝、苗、满、汉等 8 个民族的学员共 300

多名。1944年5月迁往定边，1948年于三边干校合并。

自然科学学院。是培养科学技术的理工科大学。1939年5月成立于延安南郊马家湾，先后任校长和副校长的有李富春、徐特立、李强、陈康白、恽子强等。1943年4月并入延安大学。

新文字干部学校。1941年4月成立于延安丁泉砭。1943年4月并入延安大学。

延安大学。直属中央文委的一所综合性学校。1941年9月，由陕北公学、女子大学、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1943年4月又将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学院、民族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并入。校址设于女子大学原址（王家坪北山），1944年5月，将行政学院并入延大后，校址迁到城郊凤凰山南麓。

日本工农学校。1940年10月，由八路军总政治部集中日军俘虏创办的。校址设于延安宝塔山南麓，校长野坂参三。1945年日本投降后学校停办。近300名学员离开延安，先后返回日本。

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是培养党的理论干部学校。1938年5月成立，院长张闻天，副院长王学文，校址设在延安北郊兰家坪。1942年改为中央研究院。1943年并入中央党校。

延安外国语学院。1942年5月军委成立俄文学校，归军委编译局领导，校址初设东关黑龙沟，1943年10月迁到丁泉砭，1944年4月，改名为延安外国语学校。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是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1931年在江西成立，1936年1月在瓦窑堡恢复后迁延安二道街。先后任校长、副校长的有林彪、徐向前、罗瑞卿、何长工，该校共办了八期，并在华北、苏北等地办了12个分校，

为我党我军培养了10多万干部。

中国医科大学。是培养医药卫生干部的学校。原在江西苏区成立，1936年2月在瓦窑堡恢复，称红军卫生学校。后迁富县张村驿，1940年3月由富县张村驿迁到延安柳树店。同年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校长王斌，副校长史书翰。

第六节 发动大生产运动，进行衣食自给

为了战胜国民党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造成的严重物质困难，以保障抗战经费的供给，中共中央领导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1939年1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讲话时提出“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号召边区人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全体人员开展必要的生产。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办公厅主任李富春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动员报告，阐明开展生产运动的目的和意义，提出发展生产的具体计划，号召全体军民努力生产，克服困难。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吃饭是第一问题”，要“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号召“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发展人民的与机关部队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屋、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克服困难，以利抗战。”毛泽东正式提出“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口号。

为指导大生产运动的胜利开展，毛泽东一开始就提出“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方针，号召边区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毛泽东先后发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以及《组织起来》等著作，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一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规定了领导解放区大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制定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在工、农、商各项经济事业中，实行“以农业第一”的方针。要求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切部队、机关、学校，在战斗、训练、工作和学习间隙里，一律参加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除集体进行开荒、种粮、种菜之外，还要组织专门人员创办农场、牧场、菜园，或者和农民伙种粮食、蔬菜、养猪、养羊，以便增加粮食、蔬菜、食油和肉类，逐步实现粮、菜、油、肉的半自给或自给。

中共中央还制定减租减息、增开荒地、推广植棉、不误农时、调剂劳动力、增加农贷、提高技术和实行累进税制 8 项政策，以推动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为正确处理大生产运动中军队、政府、机关、学校等部门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共中央提出了“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政策，充分调动各部门、各单位参加大生产的积极性，保证大生产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第七节 开展整风运动端正党风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为彻底肃清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和其它错误的思想根源，提高全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发动了整风运动。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1942年2月，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演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即“四·三”决定）。5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军委、中央党校、中央文委和陕甘宁边区几个系统联系实际，整顿思想方法、思想作风，开展“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运动。清除王明错误的影响和流毒，是整风的重要内容之一。提高认识，掌握思想武器，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的学风，是整风的基本要求。

整风运动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全党认真学习文件，充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思想作风，分析错误原因、性质和危害，找出改正办法，从而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

1943年，中共中央决定在整风运动中审查干部。这次审干，挖出了一些隐藏的敌人，了解了干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直接主持这一工作的康生，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审干工作一度偏向。1943年夏秋搞了约两个多月所谓“抢救运动”，片面夸大敌情，认为“特务如麻”，在审干中追查阶级敌人的比例数字，大搞逼、供、刑，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毛泽东发现这种错误后，立即着手纠正，于1943年8月提出“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9条方针。10月，毛泽东又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

争必须坚持的政策。”以后，根据中央的方针，经过调查和甄别，对冤、假、错案进行平反，给被冤枉者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这次整风运动是一次极其深刻生动的大规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整风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平，加强了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八节 胜利召开了“七大”

1945年初，欧洲反法西斯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行全面战略反攻，就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4月23日在延安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121万党员。大会选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15人组成主席团，任弼时、李富春为大会正、副秘书长。

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他指出，抗日战争中两条路线，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这两条路线的存在是一切关键问题的所在。它不仅影响到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也影响到中国的未来。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有两个前途：一个是光明的前途——变旧中国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另一个是黑暗的前途——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刘少奇在报告中对中共的组织路线作了全面的总结和发

挥，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新党章确定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进一步成熟。

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这个报告根据毛泽东的军事学说，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系统阐述中共的军事原则和战略战术原则，以及人民军事路线的完整性。

周恩来、任弼时、陈云、林伯渠等也在会上发言。

6月11日，毛泽东在题为《愚公移山》的闭幕词中指出，我们应该“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我们的路线”。

大会一致通过政治报告决议案、军事问题决议案和新党章，中共内部意见达到了空前的一致。

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44位中央委员、33名候补委员。

第九节 为和平民主斗争

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发表《关于目前时局的宣言》。宣言指出，在日本侵略者投降以后，“我们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下列紧急措施：①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②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

地区，并给予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战俘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以昭公允。③严惩汉奸，解散伪军。④公平合理的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利国民。⑤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⑥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

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得到全国人民热烈拥护。世界舆论也不赞成中国内战。在国内外反对中国内战的强大政治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改变策略，于8月14日、20日和23日3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想从中制造内战的借口和推卸内战的责任。中国共产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也为了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真面目，以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中共代表团于8月28日抵达重庆，和国民党代表开始谈判。

谈判进行了43天，国共双方代表在10月10日签订《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纪要中，蒋介石表示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国民党不得不同意迅速结束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的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实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和修正，取消特务机关，严禁司法和

警察以外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释放政治犯”，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等。

10月11日，毛泽东由重庆回到延安。周恩来、王若飞仍留在重庆继续谈判。毛泽东回到延安后，受到延安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各地人士函电慰问。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指出，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但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努力。并且提醒大家，在革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物、许多困难。不能设想，哪一天早上，一切反动派会统统自己跪在地下。又说，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

第十节 转战陕北迎接胜利

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从固临、富县分左右两路大举向延安进犯。在解放军的有力抵抗下，至3月18日，胡宗南部右路兵团只推进到宝塔山以南地区，左路兵团也只刚刚越过大、小劳山。这时，中共中央及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已安全转移，市民已疏散完毕。当日傍晚，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从容地撤离延安，向延川与清涧方向转移。3月19日上午，解放军防御兵团主力向延安东北撤离。胡宗南部于当日占领延安空城。

毛泽东在撤离延安前夕，曾对解放军的部分指战员说：“边区军队将用推石磨、石碾的办法粉碎蒋胡军对陕北的进攻。”他说：“老百姓用石磨、石碾把那么多的粮食都磨碾成了细面细米；解放军也用这个办法，把蒋胡军牵上，在陕北这盘石磨上磨，石碾上碾，就一定能把蒋胡的几十万部队磨个稀

巴烂。”

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共主要领导人是否留在陕北，以及如何工作的问题是关系到全国革命大局的关键问题。毛泽东、周恩来等乘汽车沿咸榆公路北上，经延川的刘家渠、永坪、贾家坪，于3月20日黎明到达清涧县的徐家沟；同日周恩来驱车前往子长县的王家坪会见朱德、刘少奇和任弼时。25日夜，毛泽东由清涧县的高家砭转移到子长县的任家山与刘、朱、周、任会合。3月26日，毛、朱、刘、周、任等在任家山就上述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一致决定中央应留在陕甘宁边区，但中央机关要一分为三，一部分要过黄河到华北执行中央委托的任务。在讨论开始时，任弼时主张中央和毛泽东都到河东去较为安全，刘、朱、周也对中央留在陕北的安全问题表示忧虑，但毛泽东始终坚决主张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要留在陕北。他说，我们中央不能离开陕北，我们在延安住了12年，老百姓供养了我们，一遇险情我们就跑，对不起陕北人民。他又说，留在陕北，我们可牵制胡宗南23万大军，叫蒋介石这个战略预备队失去作用。总之，不打垮胡宗南，我是不过黄河的。经过讨论，大家都同意中央留在陕北。周恩来还补充说，留在陕北一方面我们可以做陕北军民的主心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牵制胡宗南的部队，也是对其它战场的支援。同时，毛泽东也认真地考虑了大家的意见，他说，中央也不是全集中到这里，我们中央分个工，成立一个中央工作委员会，一个中央前敌委员会，一个中央后方委员会。工委到晋察冀的河北平山县，任务是处理中央委托的工作，前委留在陕北，代表中央指挥陕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后委进驻晋西北，负责陕北战场后勤保障和安置中直、军直机关及家属的工作。周恩来说，后委就让叶剑英和杨尚昆负责，大家表示同意。在讨论具体分工问

题时，大家都争着要留在陕北，最后毛泽东根据大家的意见提出一个具体方案：总司令跟政治部主任（指刘少奇）搭配，我跟参谋长（指周恩来）搭配；这样，既是政治班子，又是军事班子，两全其美。我和恩来留在陕北，总司令和少奇同志到西柏坡，弼时同志跟我们走。大家表示同意。当天由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宣布，中共中央机关仍在陕北。

周恩来受中央委托于3月27日凌晨乘汽车赴山西临县等地协助负责后方工作的叶剑英、杨尚昆以及贺龙等处理中央机关转移和对付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部队进攻问题。3月29日，毛、朱、刘、任等在清涧县北的枣林则沟村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向中央机关和总部工作人员宣布中央划分为前委、工委和后委的决定，并与大家商定前委和总部主要领导成员的代号：中共中央（即前委）——亚洲部，毛泽东——李德胜，周恩来——胡必成，任弼时——史林，陆定一——郑位。下午，中央领导人毛、朱、刘、任等乘汽车离开枣林则沟到绥德田庄。到田庄后，刘少奇、朱德等与毛泽东、任弼时等告别，前往河北；毛泽东、任弼时、陆定一等骑马西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前委成为“马背中央”。接着，毛泽东等经子洲县的邱家坪（31日夜至4月3日下午）、高家塌、子长县的涧峪岔（4月4日），于4月5日到达靖边县的青阳岔（住到4月12日）。周恩来由河东回到青阳岔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于4月9日在青阳岔向各解放区负责人发出重要通知，说明中央上月作出的三项重要决定并已“分别实行”，这三项决定是：①“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②“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③“为着工作便利，组织中央工

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它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工作”。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从3月转战陕北以来，虽然没有被蒋军发现行踪，但与蒋胡军的距离却很近，有时只相隔一座大山，不过10多公里路，常常处于险境之中。

就在这样的险境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首脑机关继续出色地领导全国革命斗争。5月30日，毛泽东在安塞王家湾为新华社写了《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评论，指出国民党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已形成人民大革命的第二条战线；现在，与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在军事与政治战线上都打了败仗并被全民所包围，想不出逃脱的办法。号召全国广大群众起来为最后打败卖国独裁外强中干的蒋介石政府而斗争。

5月上旬，中共中央在王家湾发出指示，要求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6月10日前南渡黄河向冀鲁豫区与豫皖苏区之蒋军进击，同时要求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于6月10日后配合刘邓大军大举出击，挺进中原。在中共中央部署下，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4个纵队13万人，在鲁西南强渡黄河，揭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刘、邓大军渡河后，随即发起鲁西南战役，歼敌9个半旅共5.6万余人；接着向南实行无后方的千里跃进，8月底到达大别山地区。刘邓大军渡黄河时，人民解放军还没有完全粉碎蒋军的“重点进攻”，在兵员的数量和装备上都还远逊于蒋军。5月下旬到6月中旬，中共中央原打算陈赓率领的晋冀鲁豫解放军太岳纵队西渡黄河支援西北战场。不久，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考虑到全国战略形势发展的要求，从6月下旬开始到7月19日，分别同太岳纵队领导人陈赓以及西北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领导人彭德怀、贺龙等研究，确定把太岳纵队的任务改为南渡黄河，出击豫西，协助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挺进

中原，迫使胡宗南在陕北的主力南下回援，为西北野战军歼灭胡宗南部创造战机。

为了研究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以后全国各个战场的配合问题，中共中央于1947年7月21—23日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即中共中央（小河）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杨尚昆、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陈赓、王震、张经武，以及胡乔木、王铮等。

会议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分析了解放战争第一年的形势，阐述了第二年的任务，提出“打到外线去”，“举行全国性反攻”的口号，说明中共中央制定的三军配合、两翼牵制、夺取中原的战略部署。三军配合是：除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实施中央突破直驱大别山外，陈毅、粟裕等率华东野战军主力为左路军挺进苏鲁豫皖地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第9纵队和第38军组成太岳兵团为右路军，陈赓、谢富治部自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三路大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逐鹿中原，机动歼敌。两翼牵制是：西北野战军出击榆林调动进攻陕北的敌人北上；山东解放军在胶东展开攻势，继续把进攻山东的敌人引向海边，以利刘邓、陈粟和陈谢三路大军的行动。参加会议的将领们完全赞同毛泽东的英明决策，一致拥护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会议还讨论了各解放区土地改革等问题。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举行会议（即中共中央12月会议）。出席会议的除当时能够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外，还有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解放区的负责人，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彭德怀、贺龙、林伯渠、张宗逊、习仲勋、马明方、张德生、

甘洒淇、王维舟、李井泉、谢觉哉等人。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分析人民解放战争转入进攻以后的国内形势，总结人民解放战争的经验，解决了作战方针、土地改革、整顿党的组织、经济政策、革命统一战线等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毛泽东特别强调执行正确政策的重要意义。他指出：“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关于战争形势，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现在，战争主要地已经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毛泽东总结了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打败蒋介石的主要方法，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

毛泽东指出土地改革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为贯彻这个方针，“第一，必须满足贫农与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关于整党，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整风运动，收到了成效，但是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方面所存在的成分不纯与作风不纯的问题，则没有得到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在农村中就不能前进。

关于党的经济工作，毛泽东指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

杨家沟会议认为，毛泽东的报告是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

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纲领性文件。要求全党进行深入教育，并在实践中严格遵照实施。

由于西北人民解放军已经顺利地转入外线进攻，中共中央坚持在陕北的任务已圆满完成。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的胜利，中共中央决定东渡黄河，进驻华北。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率领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从米脂杨家沟出发。23日，在吴堡县川口村以南的园则塔乘船渡过黄河，抵达东岸的高家塔。后经晋绥边区前往晋察冀解放区的平山县西柏坡村与中央工委会合，在那里继续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自1935年10月长征胜利抵达陕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在陕北战斗和生活了13年。

在转战陕北的日日夜夜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废寝忘食、忘我工作，直接指挥陕甘宁边区军民的革命斗争。彭德怀统率西北野战军克服无数艰难困苦，充分依靠边区人民和陕北的有利地形，坚持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经过延安以南阻击战及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陇东、三边、榆林、沙家店、延清、宜瓦等诸次战役，累计歼灭胡宗南部和马鸿逵部约10万人。西北野战军连战连捷，越打越强，不仅彻底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计划，而且不失时机地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出击，坚决把战争引向国统区。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军转战陕北，一直深刻影响着全国的战争形势及其发展趋向，是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向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关键。

第三章 毛泽东在延安十三年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
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

这是陕北佳县农民李有源即兴唱出的一段民歌，歌名叫《东方红》。唱出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唱出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深厚感情，表达了全中国人民的心声，成为千古绝唱。也说明了毛泽东在延安时代的位置，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共党内最有权威的领袖，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

延安时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扭转乾坤、创造辉煌的伟大时代，也是毛泽东一生中向政治高峰迈进的辉煌时代。在延安，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进一步确立、巩固和加强，成为全党衷心拥戴的最高领袖，被党誉为“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和“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杰出代表”，被人民群众歌颂为“人民大救星”；在延安，毛泽东的领导艺术和军事指挥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他在民族和人民处在深重灾难时，呕心沥血、运筹帷幄，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震撼世界的决定性胜利；

在延安，毛泽东坚持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科学探索精神，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创造了“我们这个民族突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即毛泽东思想；在延安，毛泽东开创和实施了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成功地解决了中国具体环境和革命战争条件下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建设问题，把我们党建设成了团结统一、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在延安，毛泽东在领导党和人民进行整风运动中，在领导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进行的大生产运动中，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精心培育了伟大的延安精神。

第一节 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 领导地位进一步加强

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历经四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创造了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五个省级苏维埃政权，设立 21 个县政府，人口达到 250 多万，红军发展到了六个军团十余万人，粉碎了蒋介石的四次反革命围剿。毛泽东任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自此，“朱毛”红军名扬天下。

1931 年 1 月 7 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毛泽东因战事未能出席会议，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能言善辩的王明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领导机关占据了统治地位。王明排挤毛泽东。1931 年 1 月 10 日，项英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到达瑞金中央苏区，宣布苏区中央局成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名单，项英任军委主席，毛泽东、朱德任副主席，撤消了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取消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同年 11 月 1 日

至5日，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王明的主张，攻击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完全没有摆脱游击主义的传统”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会议还宣布红军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这样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的职务完全被取消，只保留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职务。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领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共86000多人，从江西瑞金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由于指挥失误，遭受惨败，冲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以后，中央红军减少到了3万多人，引起全军上下的强烈不满。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取消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帮助周恩来进行军事指挥。从此，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被确立。

1936年12月7日，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组成统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中革军委主席。抗日战争开始后，改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书记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增补刘少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1943年7月8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第一次明确提出和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

1945年6月19日，中共中央举行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从此，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最高领袖和统帅。

第二节 毛泽东的领导和军事指挥 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延安时期代表着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最辉煌的岁月，那么这个时期也恰恰是毛泽东的领导艺术最充分地展示出来并达到了炉火纯青程度的年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抓主要矛盾

毛泽东强调：“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只要“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既是毛泽东深刻的哲学思考，又是毛泽东惯用的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主要方法。这种哲学思维化为伟大的领导实践就形成了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艺术最显著的特色。

例如，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决意要继续“剿共”，被张学良、杨虎城抓了起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蒋介石是一位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鲜血的人民公敌，与共产党结下了血海深仇。当蒋介石被张、杨扣住的消息公诸于世时，人们怎能不期望着对他千刀万剐，以解心头大恨呢！但是，毛泽东思虑的“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他深知，杀掉蒋介石，必将

导致更大规模的内战，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坐收渔利的天赐良机；而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就有可能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全国抗战的实现，这正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之所在，也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整个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杀掉蒋介石的阶级仇恨，必须服从联蒋抗日的民族大义。正是站在这样的战略制高点上，放眼展望民族和人民的灿烂前程，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迫使蒋介石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的这种和平解决，促成了十年内战的结束和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2. 密切联系群众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在任何时候都同人民群众紧紧地站在一起，关心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走群众路线，是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艺术的重要方面，而且还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核心。

例如，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县长联席会议正在进行时，突然天空乌云翻滚，巨雷轰鸣，一股雷电穿入会议室击死了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这件事传出后，一位来延安赶集的农民就借此发泄胸中的不满，在延安最热闹的市场沟指名道姓地谩骂毛泽东：老天爷没长眼，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有人竟然谩骂毛泽东，这还能了得？边区政府工作人员中有人主张严加查办。而毛泽东听到对自己的骂声后，就思考我们党的一些政策、做法是否引起了群众的不满，他指示有关方面进行专门调查。原来，这一年政府向农民预定征收20万石公粮的任务过重，群众难以承受，便借雷电击死人的事发牢骚。毛泽东知道原委后，又指示西北局就群众的负担问题进行了专题

调查，根据调查的情况，作出了减少公粮4万石的决定。与此同时，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组织机关、部队、学校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延安时期毛泽东走群众路线的领导艺术，带动起了全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正因为毛泽东和全党同志坚持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又深深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就能确定给人民带来利益、受人民欢迎的政策和办法，就顺其自然地获得了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支持和真心实意地拥护。人民群众总是倾注自己的全部心力来支援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战争。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在抗日战争时期仅贡献粮食就达100多万石，在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参加支前的民工就达200多万人次。陕北父老还不惜用他们的生命保卫着毛泽东的安全。

一些研究中共党史的外国学者写道：群众路线是“延安道路”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最有威力的创造，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支柱。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自延安时期以来的历史业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坚持了群众路线而取得的。他们说得很好。正因为延安时期毛泽东娴熟地运用了走群众路线的领导艺术，使党、军队和人民群众建立起鱼水关系，凝结成无穷无尽的革命力量，才仅仅用了13年时间，就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从根本上扭转了乾坤，使革命走出山沟，迈向了全国性胜利。

3. 团结革命队伍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讲演中有一句名言：“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讲“走到一起来了”，实际是讲党和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问题。他还说：“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同人民的团结，这些都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全党同志必须珍爱这两个

无价之宝。”作为党的最高领导者，毛泽东既深刻地认识到党的团结的极端重要性，又在自己的领导工作中以身作则地搞团结，反对山头宗派。这也是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的队伍、党的领导骨干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却比较严重地存在。除了一些人存在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向党闹独立性的倾向外，各根据地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新干部与老干部、党内干部与党外干部、一部分军队与另一部分军队、一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这一工作部门与那一工作部门等等之间的关系都存在着不协调状况。针对这种情形，毛泽东在发动全党整风时，鲜明地提出“必须扫除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使党达到完全团结统一的地步”。他要求外来干部首先要扶助本地干部，爱护本地干部，向本地干部学习；本地干部也必须学习外来干部的长处，去掉狭隘的观点；军队干部必须帮助地方干部，地方干部也必须帮助军队干部；一切老干部应该以极大的热忱欢迎新干部，关心新干部；新老干部都要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干部要学习工农干部的实际工作经验，工农干部要向知识分子干部学习文化理论，相互团结，共同提高；党内干部只有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各军队、地方和部门，都必须反对和克服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本位主义倾向。全党在整风运动的党风学习阶段，对照毛泽东指出的宗派主义表现，检查自己的问题、克服工作中和思想上不利于团结的错误倾向。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对部队不尊重西北局和地方政府，闹独立性、

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等缺点作了检讨，主动承担了责任。留守兵团并且首创了拥政爱民活动，地方政府也开展了拥军优属活动，从而促进了军政之间、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团结。

毛泽东团结的领导艺术，使党在延安时期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而有了全党的团结，就有了全体人民的团结，就有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

4. 利用有利时机

无论是进行革命斗争，还是搞社会主义建设，随着国内外局势的演变，总会出现一些难得的有利时机。有的站在历史前台的人，因他们的历史眼光有限，使历史提供的有利时机在他们的眼前悄然滑过。毛泽东超人之处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他以深刻的洞察力，在历史的舞台上，敏锐地发现和抓住难得的有利时机，因势利导，审时度势，把革命斗争推向一个新阶段。

1946年6月，蒋介石凭借美国的援助和在军事、经济上的优势，悍然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那时的蒋介石真是疯狂至极，他扬言“如果配合得法，运用灵活……就一定速战速决”。但是时过半年刚多一点时间，他的全面进攻就无法进行下去了，所谓“速战速决”，不过是一枕黄粱美梦而已。1947年3月，蒋介石被迫把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企图首先消灭陕北、山东两个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当他的得意门生胡宗南进占延安一座空城后，他又幻想着“中共的首脑部无所寄托，只能随处流窜”。可是蒋介石高兴得太早了，人民解放军从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就歼灭了国民党军队100多万人，自己的总兵力已达到近200万人。这时，蒋介石在军事上虽然还占有明显的优势，他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还在进行着，但是他的战略性的机动兵力已大为减少，他的将士们屡战屡败，士气急剧下降。他的统治区内掀起了一个又一个人

民民主运动的浪潮，后方极不稳固。他的两个拳头是打出去了，可是不仅拳头上挂了累累的伤口，而且整个胸膛袒露了出来，明显地摆开了一种挨打的架势。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泽东在陕北的土窑洞里紧紧抓住这个难得的战机，当机立断，作出了出人意料的果敢决策：我们不等到敌人的战略进攻完全被粉碎，不等到我军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超过敌人后再去展开战略进攻，而是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立刻举行全国性的战略进攻。他规定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们不能持久坚持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毛泽东在作出战略进攻决策的同时，就决定将地处中原的大别山区作为主要突击方向，因为大别山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而兵力最薄弱的部位。我军占据了这块地区，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钳制中原，恰似一把利剑插入敌人的心脏。这还能迫使蒋介石调动进攻陕北和山东的部队回援，以利于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为了实现这个战略计划，毛泽东还设计出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独特的进攻样式。在毛泽东、党中央的英明指挥下，我刘邓大军实施中央突破，千里跃进大别山；我陈谢大军作为西路，挺进豫西；我陈粟大军作为东路，挺进苏鲁豫皖地区。三路大军布成“品”字形阵势，纵横驰骋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迄大海的广大地区，把整个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战略宝地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在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经略中原”的同时，我

内线作战的各路大军也渐次转入了反攻。全国各个战场的攻势作战，内外线相互辉映，构成了人民解放军全国规模战略进攻的绝妙态势，大大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毛泽东评价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而这个转折点的实现，不正是毛泽东的巨手抓难得时机抓来的吗！

第三节 毛泽东创造了“我们这个民族突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即毛泽东思想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有几个理论创作的辉煌时期，从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的延安十三年期间，则是他的著述最辉煌的时期。此间，他以惊人的毅力，宏阔的视野，敏锐的思维，严谨的态度，求实的学风，广博的学识，火热的激情，深入总结中国的丰富历史经验，展望中国未来，就在延安的土窑洞里撰写了大量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魄的充满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光辉著作，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在哲学、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党建、外交等方面的杰出理论建树，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奇迹。仅就已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1—4卷来看，延安时期写作的占到总量的70%，即从《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到《关于情况的通报》（1948年3月20日），如果按毛泽东所住地点的先后统计，即：

在瓦窑堡、保安的窑洞里写了3篇；

在凤凰山的窑洞里写了16篇；

在杨家岭的窑洞里写了40篇；

在枣园的窑洞里写了29篇；

在王家坪的窑洞里写了8篇；

在转战陕北期间写了16篇。

毛泽东在延安的这些著述，表现出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的展开而达到成熟，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使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有了鲜明的旗帜、路标和灯塔，使革命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这就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有了属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党已经不再是生吞活剥地纯粹照抄马列的“本本”来观察、认识 and 解决中国的问题，而是已经能够自觉地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对中国革命的基本历史经验作出科学总结；已经能够深入认识中国国情、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及其发展规律，并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已经形成了既属于马克思主义，又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完整的系统科学体系，并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基本路线。即成熟的毛泽东思想。

主要表现在下列十个方面：

第一，新民主主义理论。主要是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观点；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及两步之间的关系；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异同。主要代表作：《新民主主义论》。

第二，关于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的理论概括。主要是关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历史经验的基本总结及其关系的论述并把它提升到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的高度和规律性的反映。主要代表作：《〈共产党人〉发刊词》。

第三，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主要是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的关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方

针。这些观点主要体现为党的建设要以党的政治路线为依据和准则，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原则，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主要代表作：《实践论》、《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

第四，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系统化和完整化。主要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及先城市后农村和与此相反道路的概括；中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以及政治上、经济上的原因。主要代表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战争和战略问题》。

第五，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主要是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关系，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原则；团结和斗争的辩证关系。这些基本原理的具体体现即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及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主要代表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

第六，关于军事战略方针和战略战术原则。主要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以弱国战胜强国的民族反侵略战争中敌我力量消长的辩证法；兵民是胜利之本；客观条件与指挥官的能动作用；战略与战役的军事辩证法。这些基本原理主要体现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持久抗战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方针、军事战略方针的转变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主要代表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

第七，关于和平谈判的理论与策略。主要观点是：坚持和

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主张和平建国；“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蒋打我亦打，蒋停我亦停”，强调和平不能靠乞求得来，必须揭露国民党的和平骗局，警惕内战阴谋，对敢于来犯的一切敌人，坚决给予歼灭的回击；为此，在同国民党和平谈判的同时，部署解放区开展减租、练兵、生产运动；既要坚持原则，又要作出必要的让步，当然“让步是有原则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自力更生，依靠人民。主要代表作：《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理论和策略》、《关于重庆谈判》。

第八，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因此，革命者必须在战略上，在全体上藐视敌人，敢于同他们斗争，敢于夺取胜利；同时又要在战术上、在策略上、在第一局部上、在第一具体斗争问题上重视敌人。善于斗争，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才能一步一步地孤立敌人和消灭敌人，而这两方面必须密切地结合。主要代表作：《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

第九，关于经济建设的思想理论。主要是明确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阐明了经济与财政的关系，强调以发展经济来谋求解决财政困难的出路，指出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在发展经济上必须坚持正确的路线，一定要采取精兵简政，减租减息的正确政策，并制定了经济建设的具体方针，这是：实行以农

业为主的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商业全面发展的方针；实行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实行组织起来的方针；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概念，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主要代表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

第十，关于文化教育工作的理论。主要是发展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反帝反封建文化，建设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以及文化工作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有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和我国古代文化精华；纠正轻视知识分子的错误，正确认识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文化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用文化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思想。主要代表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就是毛泽东延安时期的著作精华和理论精华，当然也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的精华。成功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这一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遇到过的难题。他不但敢于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某些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原理和结论，而且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创造出适合中国情况的新原理、新结论，并构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党建以及哲学各个领域，都有一系列创造性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做了全方位的发展和多方面的贡献。他的理论建树之多，在历史上的影响之大，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之外，很少有能与他相比的。他的科学著述就是毛泽东思想集中的概括。

第四节 毛泽东开创和实施了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建设学说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的具体环境，以自己的卓越智慧和领导艺术，终于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一支团结统一、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这在世界政治史上是罕见的壮举。而这项“伟大的工程”的建构，正是毛泽东在延安时代完成的。

1. 造就“最好的干部”

在党的建设问题上，毛泽东非常重视造就“最好的干部”。1936年2月，毛泽东在致红一军团领导人的电报中强调指出：“干部问题是一个有决定作用的问题。”后来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专门论述了干部问题。他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因而，在我们的党组织要向全国发展的同时，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应该具有崇高的品格，既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又要有工作能力，富有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这些干部和领袖，一不要自私自利，二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四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1939年12月，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要求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都要学习白求恩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

人民的人”。

我们党要造就德才兼备的“最好的干部”，必须实行正确的干部政策。1936年10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着重谈了干部政策问题。他指出：我们的干部政策，第一，是信任干部，对干部用之不疑；第二，对个别干部的错误，不应扩大化，应帮助他彻底解决问题；第三，尊重地方干部，他们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第四，注意对干部进行政治教育。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专门论述了党的干部政策问题，明确提出要善于识别干部，善于使用干部，善于爱护干部。所谓善于识别干部，主要是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所谓善于使用干部，就是推动干部实行党的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在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最主要的是实行“任人唯贤”的路线，“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所谓善于爱护干部，第一，指导他们，让他们放手工作，敢于负责，充分发挥其创造性。第二，提高他们，给以学习的机会，通过教育，使他们在理论上和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第三，检查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第四，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地应采取说服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第五，照顾他们的困难，对有疾病和家庭、生活有困难的干部，必须在可能限度内用心给以照顾。

延安时代，毛泽东以巨大的心血为党培育和造就了整整一代“最好的干部”，使夺取革命胜利有了组织上最可靠的保障。

2. 严格党的纪律和制度

延安时期，鉴于一些干部，特别是一些高级干部和对革命

有突出贡献的干部，产生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重申了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他要求“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他还建议，要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

严格党的纪律，又要扩大党内民主。毛泽东把扩大党内民主，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步骤”。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深刻指出：“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所谓积极性，其中就包括干部和党员“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的监督作用。”“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为了严格党中央的民主集中制领导制度，增强中央的领导效能和权威，1943年3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确定在两次中央全会期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在党的七大党章中，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制度作出了比较完善的规定。

在严格组织纪律中，党中央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枪决了黄克功，端正了党风，教育和挽救了一大批干部。

3. 通过整风统一全党思想

为清除党内存在的各种教条主义思想，把中国共产党真正建设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高度统一、纯洁的政党，毛

泽东坚持走在思想上建党的党的建设的新路子。

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向全党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三大任务，从此一场全党范围内的整风学习运动开始了。

作为为全党整风学习而成立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的总负责人，毛泽东对干部的思想整风抓得最紧。他下决心要“造成一个风气，要造成一河大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水，实行思想革命，用马克思主义的水，彻底改革各部门的工作。”他从领导整个中国革命的高度，要求“这次整顿三风，一定要搞彻底，一点偏风也不让有。每个同志必须明白，这次整顿三风，中心在自己身上，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现在的工作。”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党上下迅速组织起来掀起整风学习的热潮，仅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达到一万人。广大干部在阅读22个整风学习文件的基础上，发扬“脱裤子、割尾巴”的精神，深刻反省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历史，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通过这种激烈的毫不留情又与人为善的思想交锋，经过心灵深处巨大的阵痛，终于卸掉了包袱，解放了思想，挣脱了教条主义锁链，完成了一次伟大的思想飞跃。

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全党终于从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中认识了“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认识到“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共产主义到胜利前途的保证。”从而在党的七大正式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标志着全党的思想达到了空前的统一。

4. 培育党的优良作风

在延安，毛泽东亲手培育了党的优良作风，为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增添了鲜艳夺目的光彩。毛泽东在七大亲自把党的优良作风概括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些后来所称的“延安作风”，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

树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作风，同共产党人随时洗刷自己身上的灰尘是相辅相成的。毛泽东在延安领导全党树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作风的过程，就是一个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进行反对主观主义以及官僚主义的斗争过程。毛泽东在准备发动整风运动时就指出，虽然实行自我批评是一个很难办到的事情，鲁迅也说解剖自己是困难的。但对干部的错误必须正面批评，不能姑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团结全党，但同时必须进行斗争。他在正式发动全党整风时，更加明确地提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当然，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他在领导整风运动的过程中多次强调：我党必须实行公开的自我批评，不怕家丑外扬，隐瞒是不能教育党员的；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没有斗争便不能有进步。有人说我们所进行的党内斗争是不符合中国的习惯的，但我们说我们必须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使党员更提高，更进步；如果党害怕承认自己的缺点，害怕及时地公开地承认和纠正自己的缺点，那么党就不免于灭亡。公开地承认错误，揭露产生

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郑重的党的标志；自我批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气的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政党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最适用的方法。延安整风中，正是在实际上很好地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这些教导，“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才使这个运动发生了毛泽东所说的“很大的效力”，并在全党形成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1943年3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更加明确地提出，中央工作总方针要增加一条，我们的领导要联系群众，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或者说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他要求必须肃清一切脱离群众的作风。毛泽东不只是这样教育全党的，而且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全党。在延安时代，毛泽东无论走到哪里，总是以各种方式同人民群众保持着最亲密的联系，留下了墨笔写不完、颂歌唱不尽的生动事迹。他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最光辉的典范。在毛泽东榜样力量的带动下，经过延安整风的洗礼，广大党员干部写下了党的历史上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最光辉的篇章。在延安时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细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深入人民群众之中解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确确实实是共产党人的行为准则。

第五节 毛泽东率先垂范，精心 培育了伟大的延安精神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同志指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把延安叫革命圣地，‘圣’在什么地方？‘圣’在延

安精神和延安作风。”“什么是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近代中国人民同三大敌人浴血奋战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同三大敌人斗争和胜利经验的总结，是辛亥革命以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延安时期，经过整风，经过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经过党的七大，把六大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作了总结，用马列主义的普通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特别是干部思想，形成了延安精神、延安作风，主要是实事求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批评和自我批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等。我们运用和发展延安精神，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全国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等斗争的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延安精神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彻底结束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奴役，获得了民族独立的伟大精神武器，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根本消灭剥削制度，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伟大精神武器。”

延安是延安精神的发祥地。简单地说，延安精神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培育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写下《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文中第一次提出“自力更生”的概念。他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937年，他完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之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奠定了延安精神的哲学基础。1938年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同学会成立题词，系统地提出：“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

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次年5月他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同年毛泽东在延安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再次讲道：“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共产党历来更提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他把延安精神的另一核心概念“艰苦奋斗”引入了进来，并解决了先进的世界观与民族优良传统结合的关系。在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倡导下，延安所有干部学校普遍形成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校风。延安精神在延安初步体现。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指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944年，毛泽东又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讲话，他着重指出：“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他鲜明地提出了延安精神对人格的要求。

1942年前后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是延安精神形成的最重要阶段。1939年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指出：“自己动手，克服困难”。1941年，他又强调：“自己动手，自给自足”。1942年，他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生产运动中，中共中央提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丰富和发展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内涵。以三五

九旅屯垦南泥湾为象征的大生产运动，就是这种精神的伟大实践。整风运动把中国共产党从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以科学的、理论的思维把延安精神推向新的高峰。毛泽东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科学地阐述了“实事求是”，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943年，他为延安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从而最终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亦当然是延安精神的灵魂。整风精神和南泥湾精神是延安精神形成的主要标志。

1942年，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在他们的思想中、行动中，没有丝毫消极态度，他们完全不怕困难，他们象生龙活虎一般能够征服一切困难。我们看延安同志们对于工作是怎样充满了负责精神的；……在这种精神下，延安同志们没有一件事不是实事求是的。他们对于他们所领导的延安全县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及各种具体情况是充分了解的，他们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他们就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群众的艺术，他们完全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我们希望全边区的同志都有延安同志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工作态度，这样的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也学会领导群众克服困难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使我们的工作无往而不胜。”这样，“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就逐渐凝炼和引申为“延安精

神”。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又再次明确而全面系统地阐述党的三大作风。延安精神随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与发展，日臻完善。

概括地说，延安精神形成于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至1945年党的“七·大”胜利召开期间。主要内容包括：爱国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理想，实事求是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团结友爱精神，自觉遵守纪律精神，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的结晶，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崇高理想与独特品格的生动体现。

延安精神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更是未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维汉指出：“这种延安精神，是我们的传家宝，是永放光芒的灯塔”。1980年，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视察延安时强调：“延安精神没有过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要发扬延安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离不开延安精神。否则，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很难搞成的”。他还为陕西省委机关刊物《共产党人》挥笔题词：“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在历史变幻不定的时空中，延安精神有着永恒的魅力。本世纪80年代末起，延安市成立了延安精神研究会、北京成立了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一些省也成立了省级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委七届四次全委会1989年12月12日通过了《中共陕西省委关于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的决定》，决定从1990年开始，将每年的10月26日（即毛泽东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复电日）定为全省延安精神纪念日。

第四章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重要领导人在延安的活动

第一节 毛泽东

湖南湘潭人。曾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被确立。中央红军在继续北上长征的路上，于四川俄界召开会议，将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为彭德怀，政治委员由毛泽东担任。同时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五人团，进行军事领导。

中央红军到达甘南的哈达铺时，找到一些报纸，上面报道了陕北红军刘志丹的消息。当毛泽东得知陕北还有一块革命根据地时，喜出望外。他当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到陕北去。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当时为陕北根据地赤安县属地）。10月21日，毛泽东亲自指挥了“切尾巴”战斗，彻底打垮了尾追红军进入苏区的敌人，给西北苏区人民送了一份丰厚的见面礼。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找到了落脚点。中央为了巩固和扩大

根据地，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一是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后（由原西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改编），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甘泉的下寺湾召开会议，确定在当月内粉碎敌人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的建制，下辖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并决定军事工作由毛泽东负责，成立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全军五个师又四个团，10000多人。中央机关由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人率领前往瓦窑堡，主要任务是扩充红军，筹集粮食，以及为政治局会议作准备。直罗镇战役有胜利，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二是当得知陕北苏区正在进行所谓的“肃反”，原陕甘根据地包括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在内的一大批军政领导被捕时，毛泽东当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并迅速派刚刚担任中央保卫局局长的王首道等同志组成工作组，前往陕甘晋省委所在地瓦窑堡，调查处理肃反中的错误。后来很快查明事实真相，释放了刘志丹等人，还专门为刘志丹等人召开平反大会。毛泽东及时纠正了陕北错误“肃反”，保护了一大批干部，从内部挽救了西北根据地。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讨论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及军事问题。会议结合当时的形势，解决了长征途中、遵义会议上未能来得及解决的党在政治策略上存在的问题。会议通过了两个决议和会后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完满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毛泽东高举抗日的旗帜，筹划出兵山西和绥远决策。红军在1936年2月20日东渡黄河，历

时75天，转战30多个县，连战连捷，所向无敌，然后胜利班师。此次东征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了物资。接着，以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红军西征命令，指挥西征军到外线作战、扩大和巩固革命根据地。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取慎重态度，经过多次讨论研究，提出和平解决的政策，促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条件，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合作，结束了十年内战，是划时代的转变，新阶段的开始。随着时局的变化，东北军将延安、瓦窑堡移交给红军。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达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毛泽东在延安大展宏图，使中国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进驻延安后，住在城北凤凰山脚下的一个小院里。毛泽东在凤凰山居住期间，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实践论》、《矛盾论》、《反对自由主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许多著名文章。毛泽东在这里清算了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路线，接见了英国记者贝特兰、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美国记者海伦·斯诺等外国友人。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会议明确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开始指挥八路军、新四军进行抗日战争。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会议经过严肃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战线，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领导下，抗战第一年，八路军和新四军迅速在全国开辟了10多个抗日根据地，共产党人领导的人民抗日运动发展到了全国。

1938年11月20日，日军飞机轰炸延安后，毛泽东由城内凤凰山迁到杨家岭。在这里居住期间，正是国民党加紧投降反共活动，国内时局不断逆转，抗日战争处在最艰苦的时期。为了克服困难，正确指导中国革命，毛泽东在这里从事了大量的理论工作，撰写了《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等著作。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伪及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和经济封锁。为了克服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的经济困难，毛泽东在1939年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正式开始了。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延安领导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是全党进一步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的迫切需要；是全党进一步确立党的指导思想的基础和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的需要；是纠正当时存在于党内的几股不正之风，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和组织的需要；是在历史转折的关头，为了战胜当时遇到的严重困难，把革命由挫折推向胜利的需要。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延

“延安整风运动”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起来，经过了全党准备时期、普遍整风时期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期等三个阶段。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坚持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树立起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决纠正了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增强了党性观念，加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正确解决了党内存在的矛盾。

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会议。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担任中共中央的主席。这次会议上所决定的事项，对中国共产党此后的路线和历史直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43年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杨家岭迁往枣园。毛泽东在枣园居住期间，撰写了《学习与时局》、《论联合政府》、《关于重庆谈判》等许多文章。毛泽东在这里居住期间，领导了整风运动和解放区军民的大生产运动，筹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并领导全国人民为争取民主团结、和平建国，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5年4月20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历史决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清算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领导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等方面的错误，对许多重大问题作了结论；同时也对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作了高度评价。“延安整风运动”至此胜利结束。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大会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下了准确、科学的定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

“七大”通过的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中也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七大”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为新民主主义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5年6月19日，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一方面抢夺胜利果实，另一方面假意和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商谈和平建国事宜。为了实现国内和平，毛泽东冒着生命危险，于1945年8月28日亲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最后签订《双十协定》。国民党表面承认党派平等合作，避免内战等原则，并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为了便于指导中央军委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1946年1月，毛泽东由枣园迁往王家坪。这期间正值中国革命处于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战的关键时刻。为了指导中国革命向胜利发展，毛泽东先后撰写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等17篇著作。

1947年3月，蒋介石发动内战，大举进攻陕甘宁地区和

山东解放区。3月1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撤离延安。3月29日至30日，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其他几位书记在陕北清涧县召开会议，在郑重讨论后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精干机关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作战；刘少奇、朱德和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从此，毛泽东踏上了转战陕北的道路。当时为了保密，有人提议领导人都使用化名，得到毛泽东的赞成。毛泽东说：“我们是正义之师，一定会得到胜利，我就叫李得胜。”周恩来说：“我们的事业一定会成功，我就叫胡必成吧。”毛泽东说：“那好，任弼时是司令，就叫史林，陆定一是政委，就叫郑位吧。”此后，这些化名一直使用到全国解放战争前夕。

在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西北野战兵团与国民党军在陕北打起了“蘑菇战”，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山沟里团团转，很快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战役的胜利，后来又取得了陇东、三边战役和榆林、沙家店战役的胜利。尤其是沙家店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1947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佳县神泉堡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为更好地指导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创建新中国，党中央、毛泽东告别了曾经战斗和生活了十三个春秋的陕甘宁边区，于1948年3月23日在陕北吴堡县川口村东渡黄河，前往华北解放区。毛泽东抵达东岸后，走上高高的石砭，依依远眺莽莽起伏的群山，深情地说：“陕北是个好地方！”、“陕北人民为革命做出了伟大贡献！”

第二节 周恩来

江苏淮安人。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等职。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北上长征的路上，周恩来参与由他和毛泽东、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的五人团，进行军事领导。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后，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对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苏维埃西北办事处名义，在粉碎敌人对西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后再公开使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名义。政治局还确定：在党的工作方面，成立组织局，由周恩来负责；军事工作方面，成立军委，由毛泽东任主席，并兼任第一方面军政委，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后方军事，如扩充红军、动员粮食等，由组织局负责。由于毛泽东认为前方需要周恩来，会议最后同意周恩来暂时仍和毛泽东一起到前线去。

直罗镇战役结束后，周恩来率总部人员先行，到达中共中央移驻的陕北安定县瓦窑堡。他一一接见西北根据地在错误肃反中被捕释放的同志，首先找了刘志丹。中共中央很忆分配刘志丹担任后方办事处副主任、二十八军军长、瓦窑堡警备司令。回到瓦窑堡，周恩来还兼任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主任，还负责后方供应、军需工作。

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此次会议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

中，中国共产党所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1936年春，红军东征时，留周恩来、博古、邓发三人组成中央局，周恩来为书记，负责后方工作。在开展一系列工作并取得积极成果后，1936年4月9日晚，周恩来和专程飞赴陕北肤施（今延安）的张学良谈判。延安谈判后，中国共产党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36年12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组织，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7人组成主席团，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等人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处理错综复杂的事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一直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193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等人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中国南方的抗日工作；会议又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外交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周恩来又一次离开延安，前往国统区进行外交斡旋。

1939年7月10日，从国统区返回延安的周恩来，到中央党校作报告。途中，周恩来骑的马受惊，把周恩来摔了下来。他的右臂撞在石崖上，造成粉碎性骨折。由于延安的医疗条件有限，中共中央决定让周恩来到苏联去治疗。8月27日，周恩来在邓颖超的陪同下，离开延安转道新疆赴苏。1940年2

月底，苏联政府派专机送周恩来回国。3月25日，周恩来一行回到延安。第二天下午，中共中央在杨家岭沟外的宽阔草坪上举行盛大的欢迎会，毛泽东等出席了大会。回到延安后，周恩来在延安只停留了一个半月，便踏上征途，前往国民党的“陪都”重庆，继续主持南方局的工作。

1943年初夏，共产国际解散后，蒋介石允许在重庆谈判的周恩来回延安。这是“皖南事变”一年半来，蒋介石第一次答应周恩来回延安。7月16日，经过长途跋涉的周恩来抵达延安。回到阔别3年的延安，稍事休息，周恩来就接连参加各种欢迎活动。这次回到延安，周恩来还参加了正在深入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在此后，周恩来又多次穿梭于延安和重庆之间，谈判国共合作与建立联合政府等事宜。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周恩来在开幕典礼上发表演说，并在4月23日作了系统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经验与教训的长篇发言。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一方面抢夺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内战；另一方面虚情假意地3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共同商讨”“目前各种重要问题”。1945年8月28日，周恩来、王若飞陪同毛泽东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并于10月10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双十协定》签订后，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继续穿梭于延安和重庆之间，与国民党就政治协商和停战进行艰苦的谈判。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周恩来仍在重庆、南京和上海等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积极与国民党方面斡旋。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

共代表团邓颖超、李维汉等 10 多人，结束了一年多的艰难而曲折的谈判，乘美军专机回到延安。

回到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工作后，周恩来兼任了改组的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

蒋介石的全面内战被粉碎后，1947 年春，又发动向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3 月 18 日傍晚，周恩来陪同毛泽东最后撤离延安。从此，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在陕北坚持工作和战斗，历时 1 年零 5 天，行程 2000 余里，先后停留过 12 个县，在 37 个村镇住过，继续指挥着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

在转战陕北期间，周恩来化名胡必成。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还兼任代理总参谋长，负责协助毛泽东指导全国的解放战争。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坚持留在陕北，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仅仅用了一年时间，战争形势迅速扭转，人民解放军从重点防御转入全面进攻。1948 年 3 月 23 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央机关在吴堡县川口村东渡黄河，进入华北解放区。

解放后，周恩来重返延安是 1973 年事了。1973 年 6 月 9 日上午到 10 日上午，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陪同越南外宾来到延安，度过了令人难忘的 24 小时。周恩来从北京插队知青等方面了解到解放后延安经济发展缓慢，人民吃不饱，穿不暖，生活水平低于“延安时期”的时候，他难过地流下了眼泪。

周恩来关切地问：“你们能不能三年农村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

当延安地委的领导告知能实现时，周恩来高兴地说：“拿

茅台来，为三变五番干杯！”然后跟在场的延安同志一一碰杯，并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如果我不犯错误，如果我还活着，延安粮食翻番了，我一定再回来祝贺延安的同志们。”

看到这种场面，随行的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知道拦不住了，看着敬爱的周总理和延安领导碰杯后一饮而尽，他们谁都明白，这杯酒对于一个年愈古稀、积劳成疾、身患重病的老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第三节 朱 德

四川仪陇人。1955 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职。

1936 年 10 月，红一、二、四方面军甘肃会宁会师后，红军总司令朱德换上党中央送来的一套新军装，骑马来到“红都”保安。

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中共中央决定朱德同志出任总指挥，统帅全军。1937 年 7 月 18 日，他离开延安，出发云浮八路军司令部所在地三原。1937 年 9 月 6 日，朱德冒着大雨出发，渡过黄河，乘火车急驰抗日前线……

1938 年 8 月，因参加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朱德于 25 日重返延安。南门外，欢迎的队伍排满了长长的甬道，延安人民为欢迎这位凯旋的英雄统帅而欢腾、喜悦。从朱德一出现，到一直走到台上，像暴风雨一样的掌声久久不能停息。朱德在讲话中说：“我们坚决打击了敌人的进攻，获得了相当大的胜利。这是我们可以告慰于延安民众及全国同胞的。”参

加了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朱德很快又重返晋东南前线

.....

后来，从华北前线回到延安后，朱德直接参与中共中央、中共军委的领导工作。在中共中央、毛泽东和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倡导下，陕甘宁边区军民掀起了热火朝天的生产运动。在倡导大生产运动中，朱德及时地提出了著名的“南泥湾政策”。这一政策是朱德审时度势，根据条件和可能首先提出，经中共中央、毛泽东同意后由他亲自组织力量贯彻执行的。“南泥湾政策”的提出和获得成功，大大地推动了陕甘宁边区以至各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对于开发边区和各根据地的经济资源，实行生产自给，打破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减轻人民负担，改善部队生活，密切军民关系，都有重要的意义。1942年12月，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南泥湾政策’成了屯田政策的佳名，而这个佳名永远与朱总司令的名字连在一起。”

为了加强对军事干部的培养和教育，1941年11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布《关于成立军事教育和会军事学院的决定》。军事教育委员会由朱德负责领导，军事学院以朱德为院长。

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台的上端挂有“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的横幅，横幅上端正中挂着用毛泽东、朱德头像绘成的会徽。在大会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这个报告系统地论述了解放区战场的创造、发展、壮大的历程，总结了全国8年抗战，主要是解放区对日作战的成绩和经验。它是一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著作，是抗日战争经验的重要总结。在七届一中全会上，朱德继续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1945年8月10日、11日，朱德以延安总部总司令名义，连续发布七道命令，命令各解放区抗日武装依照波茨坦宣言的规定，迫使敌伪无条件投降。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15日，朱德即以中国解放区抗日总司令名义，命令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投降。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解放军进入自卫反击、全面开展解放战争的新时期。1947年元旦，朱德在延安向全国同胞、海外侨胞、解放区军民作了《1947年的十大任务》的广播演讲，指出1947年将是中国人民斗争形势转变的一年，并预言：“解放区自卫战争的胜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高涨，这两大潮流的汇合，一定能挽救祖国的危机，取消反动派卖国、内战、独裁政策，实现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

第四节 刘少奇

湖南宁乡人。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担任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第五军团中共中央代表和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1935年1月在贵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1936年春赴华北，任中共中央代表，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对过去中共党的秘密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评，提出了关于白区工作的正确的理论和策略。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坚持党的

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领导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和山西抗日新军的创建工作。1938年1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后，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组织力量深入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1941年皖南事变后，出任新四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同陈毅等一起重建新四军军部，扭转了新四军的困难处境，恢复和发展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扩大了华中抗日根据地。1942年底回到延安。1943年3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45年5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科学地概括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精辟地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个稳定成熟的领导集体。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他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主持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决策。1947年3月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同朱德等转移到华北，负责中央委托的工作。7月，在西柏坡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确定了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基本方针，进一步推动了共产党领导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

第五节 任弼时

任弼时“围剿”，原名二南，湖南湘阴县人。1921年春，任弼时与刘少奇等一同赴苏俄学习，1922年初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秋回国。四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任弼时又到达

湘赣苏区，担任省委书记、军区政治委员。在军事斗争、经济斗争、肃反和党的建设等方面都提出了系统的指导思想和正确的方针政策。1934年7月，为实现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党中央命令任弼时以红六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与萧克、王震率部西征，为长征先遣探路，他们机动灵活、避实就虚、英勇顽强、行动神速，经过87天艰难的斗争，跨越白区几千里，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终于与贺龙的红三军会师贵州。两军会师后，在任弼时同志等人的领导下，创建了拥有百万人口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粉碎了敌人的两次围剿，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中央红军北上之后，作为中国唯一红色根据地的湘、鄂、川、黔根据地，有力地牵制和分散了敌人对中央红军的进攻。

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西康甘孜会合后，任弼时与朱德、刘伯承、贺龙等人一道，为维护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正确路线，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终于推动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实现了一、二、四方面军胜利大会师，这对于全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新高潮的到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芦沟桥的枪声，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1937年4月，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同志和彭怀、朱德同志一道率部奔赴山西抗日前线，参与了平型关战役等抗日战争的重大决策，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1938年2月，任弼时同志由山西前线回到延安，党中央决定派他接替王明赴苏联担任共产国际代表处负责人，因为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给共产国际留下了不良的现象，所以在这段时间里，任弼时同志以他卓有成效的工作，改变了共产国际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而产生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不良看法，为在

中国共产党内进一步确立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0年，任弼时同志回到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从人事安排到谁吃大灶、中灶、小灶都要管。由于处理问题周到，待同志和蔼可亲，被称为“党内的老妈妈”。当时，正值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党中央号召军民开展大生产，任弼时以身作则，并向三五九旅的王震旅长要了一部纺车。他在工作之余，就像村妇一样盘腿而坐，练习纺线，成绩提高很快。1943年，他参加中央机关在杨家岭举行的军民纺线比赛，获得了第一名。不久，党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中央书记处，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任弼时同志组织和发动干部、战士、群众，根据毛泽东同志“自己动手”的方针，在陕甘宁边区开展经济建设和民主建设，不但克服了敌人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而且逐步实现了完全的自给自足。毛泽东同志赞扬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根据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决定，由任弼时同志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央机关的同志说起任弼时，都认为他一向正派公道，在原则上从不让步。一次，江青买了些不该买的东西要求报销，并耍泼大吵大闹。任弼时支持管财务的同志坚决顶住，江青闹到掀翻了桌子，最后由识大体的毛岸英过来收拾了房间。毛泽东得知后，对任弼时的这种态度表示赞同。

1945年春，任弼时同志主持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并且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

1947年3月，蒋介石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三人组成前敌工作委员会，转战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斗争。任弼时拖着病体担任中

央支队司令员。行军每到一处，他都要亲自安排住房，布置警卫，组织物资供应，还参与决策研究。时称他是中央队伍中身体最差的一人，又是最忙的一人。后来，毛泽东回忆那段辉煌岁月说：“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斗争”。

1948年春，中央进入河北西柏坡。任弼时的血压很高，心律又严重不齐，却仍时时支撑着协助周恩来工作，协调各战略区的物资调配和后勤支援。1949年3月，他随中央进入北京，主持召开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赴苏联治疗。1950年4月回国后，他没按医嘱休息，立即投入工作。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第二天，即10月26日晚，他长时间研究战局并思考对策，病情突然恶化，次日去世。叶剑英在追悼他时这样评价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走着漫长的艰苦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

第六节 彭德怀

湖南湘潭人。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曾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等职。1974年被迫害致死。

1935年9月18日，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红军第一、第三军团和中央纵队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在他们的率领下，走过了长征最后的艰苦路程，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会师。至此，红一方面军的主力胜利完成了闻名全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0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国民党马

鸿宾率领的4个骑兵团气势汹汹地赶来。当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了高级军事干部会议，部署战斗。毛泽东在会上讲：“这里已是陕北苏区的边沿，我们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要把‘尾巴’切掉！”会后，彭德怀连夜返回前线指挥作战。10月21日早晨，当敌人一个骑兵团闯进伏击圈时，枪声四起。经过数小时激战，全歼这个骑兵团，同时击溃3个骑兵团，追击四五十里，缴获数百匹战马和大量枪支弹药，迫使敌军停止追击，远离了陕北苏区。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十分激动，诗性大发，写下了赞扬彭德怀的诗句：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来到毛泽东住地，看到桌子上放着毛泽东写的这首诗。当他读到最后一句时，脱口而出：“不妥！不妥！”随即拿起笔来，把“唯我彭大将军”改为“唯我英勇红军”。但毛泽东不同意。后来，全军将士几乎人人都熟知这首诗。

1936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实行东征，由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下辖：红一军团，林彪为军团长，聂荣臻为政委；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红二十八军，刘志丹为军长，宋任穷为政委。红二十九军和陕北的一些地方武装统一由周恩来、博古指挥，留守陕北。毛泽东、彭德怀亲自指挥的东征战役，历时75天，扩大8000红军，筹款30万元，在山西二十几个县的广大农民中组织和发动了群众，推动了华北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红一方面军刚回师陕北，蒋介石就向陕甘苏区发动新的

“围剿”。1936年5月18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西征命令，组成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晓为政治部主任。

八年抗战，彭德怀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亲率八路军挺进华北抗日前线。指挥过震惊中外、威震敌胆的“百团大战”等，为中华民族立下不朽功勋，也使他更加成熟，从英勇善战的指挥员，成为中国人民军队里杰出的帅才，我党的优秀领导人之一。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彭德怀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随后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抗战胜利后，彭德怀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军委总参谋长。

1947年，蒋介石向解放区进攻近一年之后，又以25万兵力向仅有26000武装的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企图占领延安，消灭在陕北的党中央。彭德怀临危受命，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西北野战军与十倍于己的敌人进行坚苦卓绝的斗争。仅仅一年，在他的指挥下，连续进行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陇东、沙家店等战役，粉碎了胡宗南24个旅及10个杂牌旅的猖狂进攻，被我歼灭或受歼灭性打击的敌军有11个旅。1948年2月，彭德怀又指挥了宜川、瓦子街战役，全歼敌人一个整编军部，两个师部，5个旅28000人，并乘胜解放了黄龙山区大片土地和城镇。不久，彭德怀又指挥了西府战役，攻克敌重要基地宝鸡，迫使延安守敌狼狈溃逃。当时延安撤退时，毛泽东曾提出3年收复延安，而只过了一年又一个月，延安就回到人民的手中。

1958年彭德怀重返延安，在延安只停留了一天，便回京了。1959年7月，“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直言直谏，对当时党的领导工作的“左”倾思潮提出了诚挚的批评。然而，

等待他的是一场震撼历史的错案冤案。为此，忧国忧民的彭德怀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第七节 林伯渠

湖南临澧人。曾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林伯渠先后担任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财政部部长、主席。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随后出现了合作抗日的新局面。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中共中央于1937年9月6日将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并任命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不久又任命他为中共驻西安代表。从此，林伯渠经常往返于西安与延安之间，兼顾两地的工作。

1940年11月，林伯渠从西安回到延安。从此，他以主要的精力领导陕甘宁根据地的建设。他努力贯彻边区施政纲领，把边区的政权建设、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推向前进。1941年林伯渠通过边区政府发布了关于彻底实行“三三制”选举的指示，详细分析了边区内部的阶级关系，阐述了边区实行“三三制”的必要，规定了选举的重要事项。随后领导进行了普选，使县级“三三制”政权普遍地建立起来。1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通过了著名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选举了边区政府委员和正、副主席，林伯渠连任主席。

在大生产运动中，林伯渠不仅领导边区生产，而且带头参加生产。

在边区政府和林伯渠等的组织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的农业、工业生产都出现了蒸蒸日上的形势。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林伯渠很注意发展边区的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陕甘宁边区成绩卓著，成为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楷模。

1945年“七大”时，林伯渠以全票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还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当他60寿辰时，中共中央给他致送祝词，称赞他“是我国革命的老战士”，说他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给新民主主义的各种制度立定了规模”，号召党员和干部向他学习。他生日的那天，中央办公厅在杨家岭礼堂为他祝寿毛泽东、朱德及中央委员会西北局、边区政府的负责同志都亲临祝贺。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4月，在边区参议会第三届；一次会议上，林伯渠再度荣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在此期间，他领导开展了减租和生产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林伯渠通过边区政府发布动员令，动员边区人民支援解放战争。1947年3月，胡宗南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撤出延安。中央为了照顾林伯渠，让他东渡黄河去华北。但他觉得自己是边区政府主席，坚持留下来，同边区人民一道战斗。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林伯渠领导边区政府积极组织人民群众参军参战，支援前线。

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延安。5月11日，林伯渠率领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回到阔别一年多、已是满目疮痍的延安，立即投一了领导边区人民发展生产、恢复建设、迅速医治战争创伤的战斗。他向记者谈话时说：当初敌人占领延安的那股乌云，没有埋没共产党人的伟大气概，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边区人民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度过灾荒，创造了解放大西北的光明局面。今后，一定会更快地把蒋介石的反动

统治最后送到坟墓里去。

1948年12月，中共中央调林伯渠担任新的工作。林伯渠告别了生活与战斗了十三个春秋的陕甘宁边区，前往新的工作岗位……

第八节 秦邦宪

曾用名博古，江苏省无锡县人，出生于1906年。1925年在苏州上中学，任学联主席。同年，进上海大学学习，并于秋季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赶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任教于该校。1930年5月回到上海，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干事。1931年1月，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同年4月任团中央书记；同年9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补选秦邦宪为中央委员，并任临时中央常委，成为事实上的总书记。1933年1月，秦邦宪进入中央苏区，继续主持中共中央领导工作。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总书记。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秦邦宪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批判。秦邦宪在会上作了检查，但不深刻，会后在行军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时，决定由张闻天代替秦邦宪负总的责任，秦邦宪仍任政治局常委。1935年10月，秦邦宪随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1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在下寺湾成立，任主席。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1936年1月26日，又兼任新成立的西北办事处外交部部长。1936年6月21日，他随中共中央机关离开瓦窑堡，于7月上旬到达保安；同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秦邦宪作为

中共代表团成员，随周恩来前往西安，对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贡献。

1937年2月，秦邦宪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同年6月，参加国共两党庐山谈判，后任中共驻南京代表。1938年后，历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长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长。1940年底，回到延安。1941年后，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兼解放日报社社长，并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1945年4月至6月，秦邦宪参加了中共“七大”会议，并于5月3日在大会上作了《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我所起的作用与应负的责任》的发言，对自己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的错误作了认真地自我批评和检查认识，会议选举他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46年2月，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到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同年4月8日，在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与王若飞、叶挺、邓发等在山西兴县黑茶山不幸遇难，时年仅40岁。

第九节 王 明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领导人。原名陈绍禹。安徽金寨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得到校长米夫的赏识。在米夫的支持下，他逐步成为教条主义宗派的首脑人物，1929~1930年间王明和其他一些教条主义者陆续从苏联回国。12月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身份来华。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迫使中共中央于1931年1月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同年10月去苏联，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1931年到1934年间王明等人掌握了中共中央领导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推行

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到严重危害。1935年1月遵义会议批评了这种错误，结束了他们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王明在1937年11月回国，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主张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使他所领导地区的革命事业又受到严重损失。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免去他的书记职务。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他受到了严厉批评。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时王明给全会写信对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但已去苏联就医，从此拒不回国。60年代及70年代他写了许多文章和小册子，攻击中国共产党。1974年3月27日在莫斯科病逝。

第十节 张国焘

又名张特立。江西省萍乡县人。出生于1897年11月26日。1910年10月考入北京大学理学院预科，参加了五四运动。并在北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1920年7月从北京大学毕业。1921年7月，出席了中共“一大”会议，并当选为中央委员、组织主任。1922年1月，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出席了在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各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同年7月，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会议，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23年6月，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会议。1924年1月，出席了在上海

召开的中共“四大”会议，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中央工农部主任。北伐战争期间，曾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1927年4月29日至5月9日，出席了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五大”会议，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同年7月，任改组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南昌起义前夕，张国焘曾一度动摇，极力阻止起义的发动。他的意见被周恩来等否决，南昌起义于8月1日爆发。在中共“八七”紧急会议上，张国焘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11月9日至10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开除了张国焘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1928年，张国焘赴莫斯科出席了6月18日至7月11日召开的中共“六大”会议，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1931年1月下旬，张国焘回到上海。同年4月，被派赴鄂豫皖苏区，任中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1932年10月，率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进入川陕地区。1933年，创建了川陕苏区。

1935年6月，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张国焘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反对中共中央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方针，依仗人多、枪多，妄图以武力威胁党中央。毛泽东等及时发觉了张国焘的阴谋，率部队继续北上。而张国焘则于9月下旬率部队南下，重过草地。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非法作出《关于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公开打出了反党的旗号，成立了所谓的“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自封为主席。12月5日，张国焘致电党中央，狂妄地宣称：（1）此

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2）你们应称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中央的名义；（3）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4）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报来，以便批准。至此，张国焘反党、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他立即取消非法自立的伪中央，放弃反党立场，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并决定向全党公布1935年9月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做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以教育全党，特别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6月6日，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了伪中央。同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12月7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命令，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副主席。

1937年3月2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了扩大会议（史称“延安会议”），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张国焘也写了《我的错误》，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检讨。31日，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会后，中共中央仍任命张国焘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重要职务，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8月22日至25日，张国焘出席了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

1938年4月4日，张国焘借到中部县（今黄陵县）祭黄帝陵的机会，私自转往西安，后又到武汉。4月17日，张国焘在武汉声明脱离中共。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张国焘叛变后，任国民党军统特种问题研究室负责人。1939年后，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反共设计委员

会委员。1940年，被国民党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解放战争时期，曾在上海创办反共刊物《创造》周刊。1948年底逃往台湾。1949年冬转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1979年12月3日凌晨，张国焘冻死在多伦多老人病院，时年82岁。

第五章 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的 组织机构

第一节 遵义会议确定的“三人 军事指挥小组”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的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

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

常委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因来负责军事。

（注）在行军途中于1935、3、11，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红军行动的指挥工作。

附：出席遵义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党政军负责人，当时的职务：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张闻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朱 德——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

周恩来——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委；

秦邦宪——中央政治局主要负责人；（一说中共中央总书记）；

刘少奇——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

陈 云——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党团书记；

王稼祥——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 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何克全——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

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

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

林 彪——红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

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

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

第二节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中共中央组织机构

中央政治局委员（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

毛泽东 朱 德 周恩来 王 明 张闻天 项 英

博 古 王稼祥 彭德怀 刘少奇 陈 云 康 生

中央委员

关向应 张 浩 杨尚昆 李富春 李维汉

书 记：毛泽东 张闻天 陈 云 康 生 陈绍禹以后
任弼时 朱 德 刘少奇 周恩来先后担任

中央委员：关向应 张 浩 杨尚昆 李富春 李维汉

秘 书：胡乔木

中央组织部

部 长：秦邦宪，以后由陈云、彭真（1943.3）、康生（1945.10）先后担任

副部长：李富春 王鹤寿（1943.3） 习仲勋（1945.5）
安子文（1945.8）

秘书长：武竞天（1941年）

中央宣传部

部 长：张闻天 凯 丰（1941年） 陆定一（1943.3）

副部长：凯丰，以后由杨松、陈昌浩、吴亮平、徐特立、
李维汉、赵毅敏担任

中央党务委员会

主 任：周恩来，后由李维汉担任

副主任：张 浩

中央财政经济部

部 长：李富春

副部长：李六如 曹菊如（1941年） 董必武（1947.3）

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

书 记：凯 丰 陈 云（1938.11，兼） 冯文彬
（1943.3）

副书记：冯文彬 以后由廖承志、蒋南翔担任

委 员：宋一平 蒋南翔 高朗山

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

主 任：帅孟奇（兼） 以后为陈绍禹（兼）、蔡畅
（1941.6）

副主任：邓颖超

常 委：帅孟奇 蔡 畅 李坚贞 孟庆树 张琴秋

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

主任：周扬

秘书长：艾思奇

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

主任：张闻天（兼）

秘书长：李维汉（兼）

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

主任：王稼祥（兼）

秘书长：王若飞

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

主任：陈绍禹（兼）

中央审查委员会

书记：董必武

中央党校委员会

主任：秦邦宪

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

主任：王观澜

秘书长：李沐英

中央城市工作部

部长：彭真（兼）

副部长：刘 晓

西北财经办事处

主任：贺 龙

副主任：陈 云

秘书长：曹菊如

中央交通局局长：吴德峰

中央管理局局长：方仲如 易秀湘（1943.3）

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傅连璋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 周恩来

中央办公厅

主 任：李富春

中共中央秘书长

张文林 王首道（1939 年） 王若飞（1940 年）

任弼时（1940.7）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

书 记：曾固（1941 年）

中央党务研究室

主 任：王若飞（1941 年）

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

部 长：陈绍禹

副部长：柯庆施 南汉宸（1943.3）

中央出版发行部

部 长：李富春（兼）

副部长：王 林

中央干部教育部

部 长：张闻天（兼）

副部长：李维汉

中央宣传部

部 长：张闻天

副部长：凯 丰 李维汉

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

主 任：康 生（兼）

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

书 记：康生 刘少奇（1939.4）

邓 发（1940 年初） 刘宁（1946.5）先后担任

副书记：张浩，后由崔田夫担任

中央民众运动委员会

书 记：邓发

中央研究局

局 长：刘少奇（兼）

新华通讯社

社 长：秦邦宪

总编辑：余光生

第三节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943.3） 确定增设的中共中央机关

中央社会部（1939年10月成立）

部 长：康 生

副部长：李克农 潘汉军

保卫部

部 长：许建国

下设四个室：

一室（搞机要）主任：冯××；副主任：罗青长

二室（搞人事工作）主任：陈 刚

三室（搞敌内情报）主任：许光达

四室（搞敌公开情报）主任：萍 桥

中央情报部

部 长：康生（兼）

中央机要科

科 长：叶子龙

中央总务处

处 长：师 哲

第四节 “洛川会议”确定的中共中央 军事委员及组织机构

中共中央革命军委员会（“洛川会议”改组成员）

主 席（书记）：毛泽东

副主席（副书记）：朱德、周恩来，以后担任的有：王稼
祥（1938.11）、刘少奇（1943.补）、
彭德怀（1945年）

委 员：毛泽东 朱 德 周恩来 彭德怀 任弼时
叶剑英 林 彪 贺 龙 刘伯承 张 浩
徐向前

军委参谋长：萧劲光，以后担任的有：滕代远（1938.11）、
叶剑英（1941.2）、伍云甫（1941年）、
杨尚昆（1943年）、彭德怀（1945.4）

军委副参谋长：叶剑英（1945年）

军委秘书厅

秘书长：李 涛（1940年） 陶 铸（1940年）
杨尚昆（1943年）

副秘书长：赵平山（1940年） 黄欧东（1943年）

军委总参谋部

部长：聂鹤亭 陈奇涵（1938.11）

军委下设四个局

一局局长：何长工，以后担任的有郭天长、郭化若、边章

伍、李涛、伍修权、钟人仿、童陆生

二局局长：罗舜初，以后由曾希圣、曹祥仁先后担任

三局局长：王 诤

四局局长：黄春甫（江华），以后宋裕和、陈奇涵先后担任

军委外事组组长：杨尚昆

军委总政治部

主 任：任弼时（1937.10） 毛泽东（1938.2—8，兼）

刘少奇（1945年，兼） 王稼祥（1938.9）

副主任：由傅钟（1937.10）、谭政（1938.2）、傅钟（1940.5）、程子华（1945年）、邓小平、王稼祥先后担任

组织部部长：谭政，以后由周恒、胡耀邦先后担任

宣传部部长：陈正人，以后由萧向荣、舒同担任

除奸部部长：吴概之

总政秘书长：萧向荣 彭加伦（1938年）

陶 铸（1941年）

部政治部党务委员会

主 席：王稼祥（1938年底）

副主席：谭 政

敌军工作部

部 长：王学文（1940.6）

副部长：李初黎（1940.6）

联络部部长：王若飞（1938年冬）

军委总后勤部

部长兼政治委员：叶季壮

副部长：张令彬，以后由杨立三担任

军委供给部

部长：叶季壮，以后由张之春、易秀湘担任

副部长：邱会作，以后由张令彬担任

军委教育委员会

主任：朱德

委员：朱德 叶剑英 萧劲光 谭

政 许光远 郭化若 叶季壮 王 斌 王 诤

八路军总指挥部（十八集团军）

总指挥（总司令）：朱德

副总指挥（副总司令）：彭德怀

参谋长：叶剑英

副参谋长：左 权 王若飞（1938 年底）

总政治部

主任：任弼时 王稼祥（1938.8）

副主任：邓小平 谭 政（1938.2） 傅 钟（1938.1）

野战政治部主任：傅 钟（1938.8）

总部秘书长：舒 同 朱 光（1938.11）

总兵站部部长：杨立三

总供给部部长：张之寿，以后由赵尔陆、邓典桃先后担任

总卫生部部长：姜齐贤，以后由孙毅之、苏井观先后担任

副部长：饶正锡

政 委：易秀湘

第五节 转战陕北时中共中央领导机构

（1947 年 3 月）

中共中央委员会（留陕北）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

彭德怀（随西北野战军）

林伯渠（随陕甘宁边区政府）

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去西柏坡）

书 记：刘少奇

副书记：朱 德

常 委：董必武 彭 真 康 生

秘书长：伍云甫

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去晋绥）

书 记：叶剑英

成 员：杨尚昆、李维汉、邓颖超

第六节 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西北局） 组织情况

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西北局）组织情况（1937年5月至1948年底）：

书记：郭洪涛（后为高岗、彭德怀、习仲勋）

副书记：王观澜、谢觉哉（后为习仲勋、马明方）

组织部长：王达成（后为陈正人、马文瑞）

副部长：张邦英（后为崔田夫）

宣传部长：吴亮平（后为王若飞、李卓然、张仲实）

副部长：刘澜涛

统战部长：王涛（后为贾拓夫、张德生）

社会部部长：张邦英

秘书长：高克林（后为崔曙光、欧阳钦、任作民、范子文、杨清、张德生）

青委书记：高朗山

调查研究局局长：贾拓夫（兼夫）

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朱理治

（1949年夏西北局改组后，第一书记彭德怀，第二书记贺龙，第三书记习仲勋）。

边区中央局下属五个分区党委领导：

中共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后为张秀山）

关中专员公署专员：习仲勋（兼任）

中共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后为段德彰）

陈东专员公署专员：王震（兼任）

中共三边地委书记：王世泰

三边专员公署专员：罗成德

中共延属地委书记：李景膺

1947年3月中央西北局撤离延安，1948年4月回到延安迁至王家坪，1949年迁往西安。

第六章 中共在延安行政组织机构

第一节 清涧起义组织机构

(1927年10月—1928年1月)

陕西军事委员会

书记：康 澍

委员：李象九、谢子长、白乐亭、闫揆要、白自强
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1927年12月成立)

总指挥：康 澍

副总指挥：谢子长

参谋长：闫揆要

第二节 渭华起义组织机构

(1928年5月)

一、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 (1928年4月成立)

书记：刘继曾

委员：刘继曾、彭明、王林、李大章、徐振化

二、陕东赤卫队 (1928年4月成立)

大队长：李大德

副大队长：薛自爽

党支部书记：冯养浩

第一中队队长：

第二中队队长：张绪昌

第三中队队长：徐汉儒

第四中队队长：

大刀队队长：蔡树藩

三、西北工农革命军

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

总司令：唐 澍

政 委：刘继曾

军事总顾问：许权中

军党委书记：吴浩然

参谋长：王泰吉

政治部主任：廉益民（乐少亭）

经济委员会主任：杨晓初

经济部主任：刘庆兰

卫生部主任：邢运堂

司令部赤卫队队长：张汉泉

第一大队队长：赵雅生

第二大队队长：武培谟

第三大队队长：谢子长

第四大队队长：雷天祥

司令部赤卫队骑兵分队队长：许权中（兼）

第三节 旬邑起义组织机构

(1928年5月)

一、中共旬邑县中心支部

书记：吕佑乾

主席：许才升

秘书主任：吕凤岐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程永盛

土地分配委员会委员长：程百印

经济委员会委员长：蒲允升

交通委员会委员长：程国柱

宣传委员会委员长：王浪波

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王日省

革命裁判委员会委员长：程雨顺

二、苏维埃红军渭北支队

总指挥：程永盛

第一连连长：程永延

第二连连长：程双印

第三连连长：程子英

第四节 中共陕甘边特委历任书记名单

1. 金里科 (1933.3—1933.5)
2. 秦午山 (1933.5—1933.11)
3. 张秀山 (1934.6—1934.8)
4. 惠子俊 (1934.9—1935.4)

5. 李生华 (1935.4—1935.5)

6. 李景林 (1935.6—1935.11)

注：1933年3月，中共陕甘边特委成立。1935年11月，中共陕甘省委成立，陕甘边特委撤销。

第五节 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组织机构

(1934年11月)

主席：习仲勋

副主席：贾生秀、牛永清

秘书长：张文华

土地委员长：李生华

劳动委员长：张钦贤

财政委员长：杨玉亭

粮食委员长：呼志禄

肃反委员长：郝文明

文化委员长：蔡子伟

工农检查委员长：惠子俊

第六节 中共陕北特委成员名单

书记：崔田夫

委员：马明方、马文瑞、张达志、崔逢运、王兆卿、

毕维舟、鲁学曾、高长久、崔田民、常学恭

注：1928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成立。1935年2月西北工委成立后，陕北特委撤销。

第七节 陕西省工农民主政府组织机构

(1935 年 1 月)

主 席：马明方

副 主 席：崔田民、霍维德

秘 书 长：惠子民

土地部长：辛兰亭

粮食部长：高旭光

劳动部长：齐民珍

财政部长：艾楚南

经济部长：惠子民（兼）

文教部长：陈蓬飞

保卫部长：刘子义

贸易部长：白树标

第八节 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

(1937 年—1942 年)

司令员：高 岗

政 委：高 岗（兼）

副司令员：周 兴、王世泰（后）

政治部主任：吕振球、陈仁祺（后）

参谋长：谭希林、黄罗斌（后）

第九节 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

(1942年5月)

司令员：贺 龙

政 委：关向应

副司令员：徐向前、肖劲光

副政委：高 岗、谭 政

政治部主任：谭 政（兼）

政治部副主任：傅 钟、甘泗淇

参谋长：张经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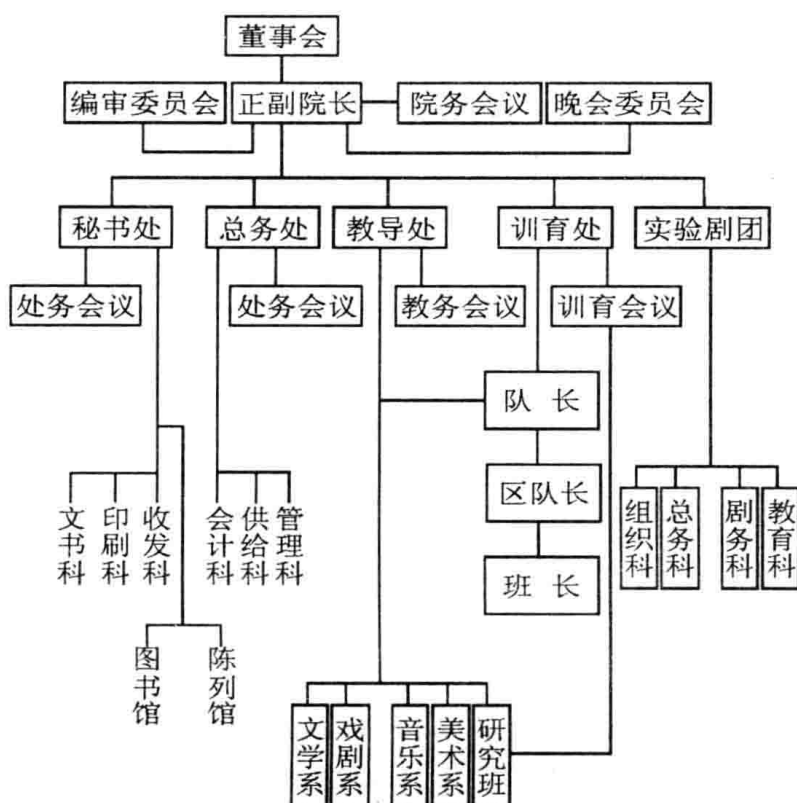
第十节 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机构

(1937年—195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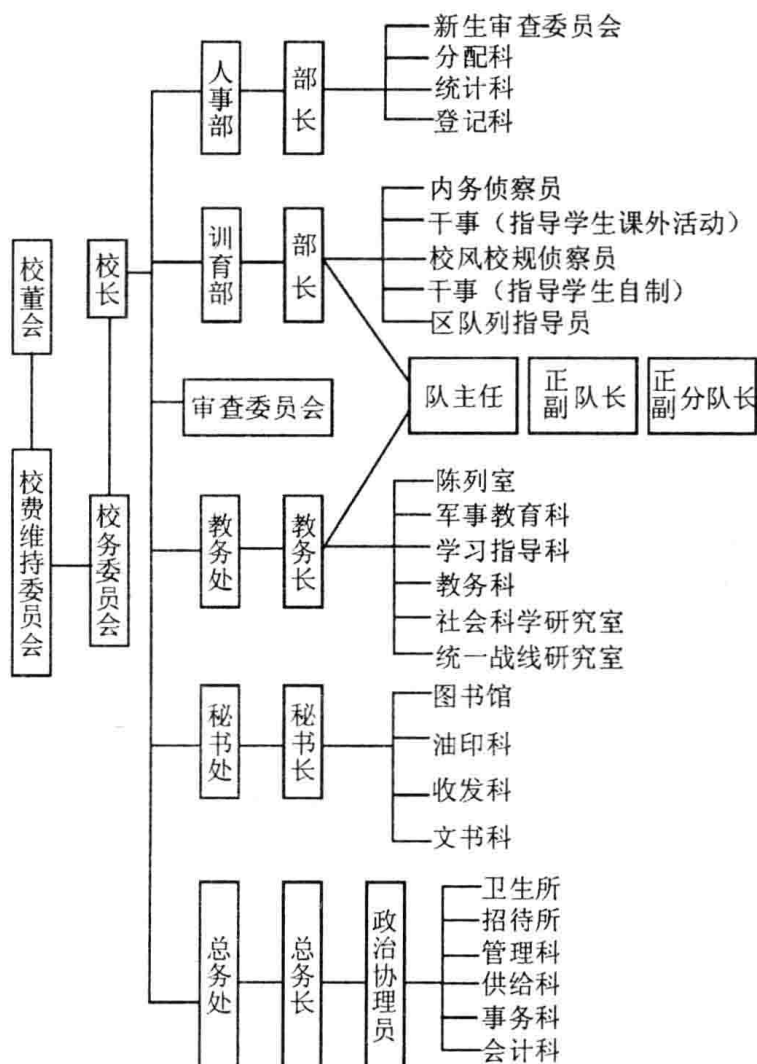
单 位	职 务	姓 名	任 职 时 间
办公厅 (秘书处)	秘书长	伍修权	1937. 9—1938. 1
		曹力如	1938. 1—1940. 10
		谢觉哉	1940. 10—1941
		周 文	1941—1942. 5
		高自立	1942. 6—1943. 2
		李维汉	1943. 4—1945. 10
		白如冰	1945. 10—1946. 4
		王子宜	1946. 4—1949. 2
		王达成	1949. 2—1950. 1
民政厅	厅 长	马明方	1937. 10—1938. 10

单 位	职 务	姓 名	任 职 时 间
		李景林	1938. 10—1939. 2
		高自立	1939. 2—1940. 10
		刘景范	1940. 10—1947
		王子宜	1947. 8—1950. 1
建设厅	厅 长	刘景范	1938—1940. 10
		高自立	1940. 10—1945
		霍子乐	1945—1948
保安处	处 长	周 兴	1937. 9—1950. 1
财政厅	厅 长	林伯渠	1937. 9—1938. 9
		曹菊如	1938. 9—1939. 4
		张慕尧	1939. 4—1939. 6
		曹菊如	1939. 6—1939. 12
		霍维德	1939. 12—1941
		南汉宸	1941—1945
		霍维德	1945—1947. 10
		范子文	1947. 10—1948. 7
		白如冰	1948. 7—1950. 1
教育厅	厅 长	徐特立	1937. 10—1939. 2
		周 扬	1939. 2—1941
		周 文	1941—1941. 5
		柳 湜	1941. 5—1946
		贺连成	1946—1950. 1
交通厅	厅 长	高士一	1949. 2—1950. 1
农业厅	厅 长	霍子乐	1949. 2—1950. 1
企业厅	厅 长	蒋崇璟	1949. 2—1950. 1
工商厅	厅 长	喻 杰	1949. 2—1950.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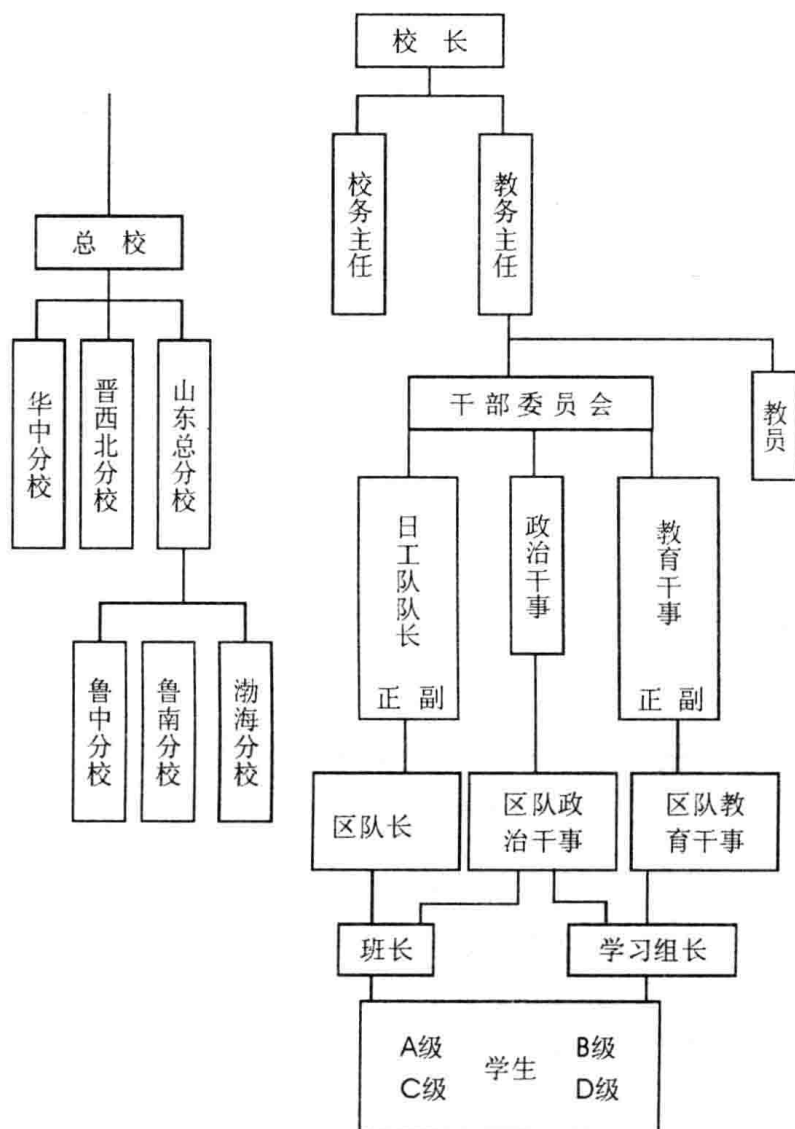
第十一节 鲁迅艺术学院组织机构



第十二节 陕北公学组织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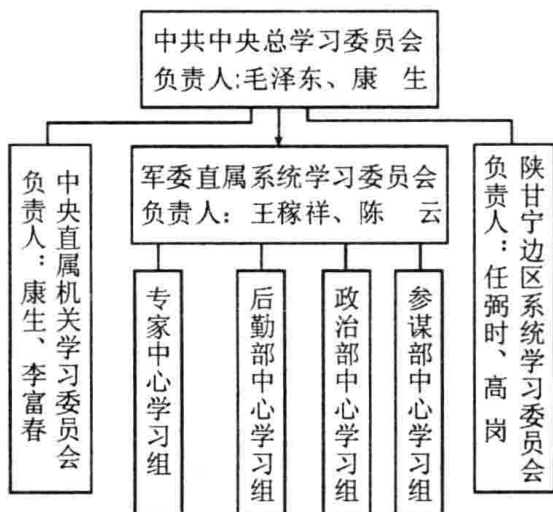


第十三节 延安日本工（劳）农学校组织机构



第十四节 延安整风学习组织机构

1942年6月



注: 1. 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共 10098 人。

2. 延安各机关学校高级、中级、普通干部分别成立甲、乙、丙三类学习组。

第十五节 中央党校学员编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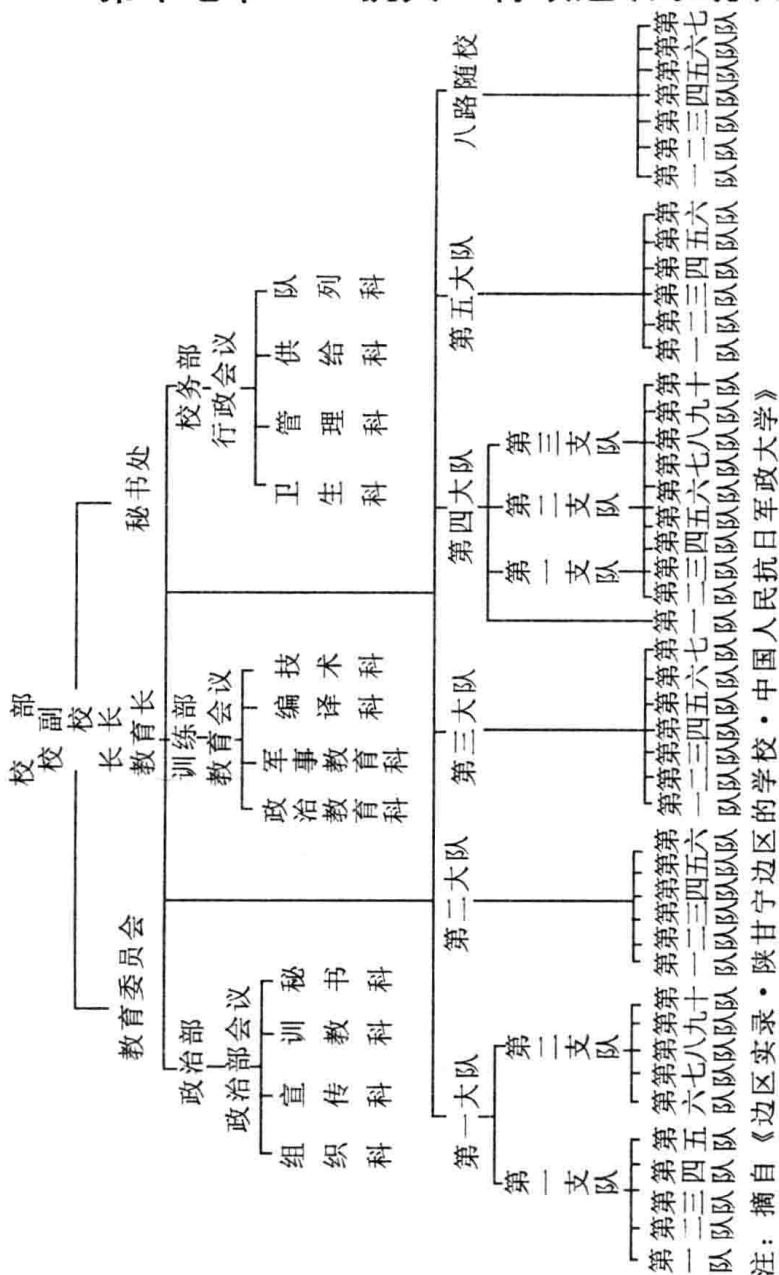
(1943 年 3 月)

名称	住 址	负 责 人	对 象
一部	小沟坪	古大存、刘芝明	地委、旅级以上干部
二部	王家坪	张鼎丞、安子文	县、团级干部
三部	兰家坪	郭述申、张如心	知识分子和文化工作者
四部	大砭沟	张启龙、程世才	工农出身的老干部
五部	七里铺	白栋才、强晓初	陕甘宁边区县团级干部
六部	马家湾	马国瑞、谷云亭	从敌后和国统区来延的党员干部

第十六节 延安主要文艺社团组织

社 团 名 称	成立时间	主要负责人
中国文艺协会	1936. 11	丁 玲
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	1937. 11	艾思奇、柯仲平
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联合会	1938. 9	艾思奇
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	1938. 1	冼星海、吕驥
陕甘宁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	1939. 2	江丰
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	1939. 2	沙可夫、塞克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	1939. 5	周扬、萧三、丁玲
延安文化俱乐部	1940. 3	萧三
战歌社	1937. 12	柯仲平
边区诗歌总会	1938. 9	田 间
鲁迅文艺工作团	1939. 3	陈荒煤
鲁迅研究会	1941. 1	艾思奇、萧三、周文
怀安诗社	1941. 9	李木庵
延安诗会	1941. 12	艾青、萧三
抗战剧团	1936. 1	危拱之、杨醉乡
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	1938. 7	柯仲平、马健翎
鲁迅实验剧团	1938. 8	王震之、田方、钟敬之
烽火剧团	1938. 10	蔺子安、高波
鲁艺平剧团	1940. 4	阿 甲
延安杂技团	1941. 2	宗 池
青年艺术剧院	1941. 9	塞克、王真、吴雪
西北文艺工作团	1940. 9	苏一平
延安评剧院	1942. 10	张 庚
延安合唱团	1940. 5	金紫光、时乐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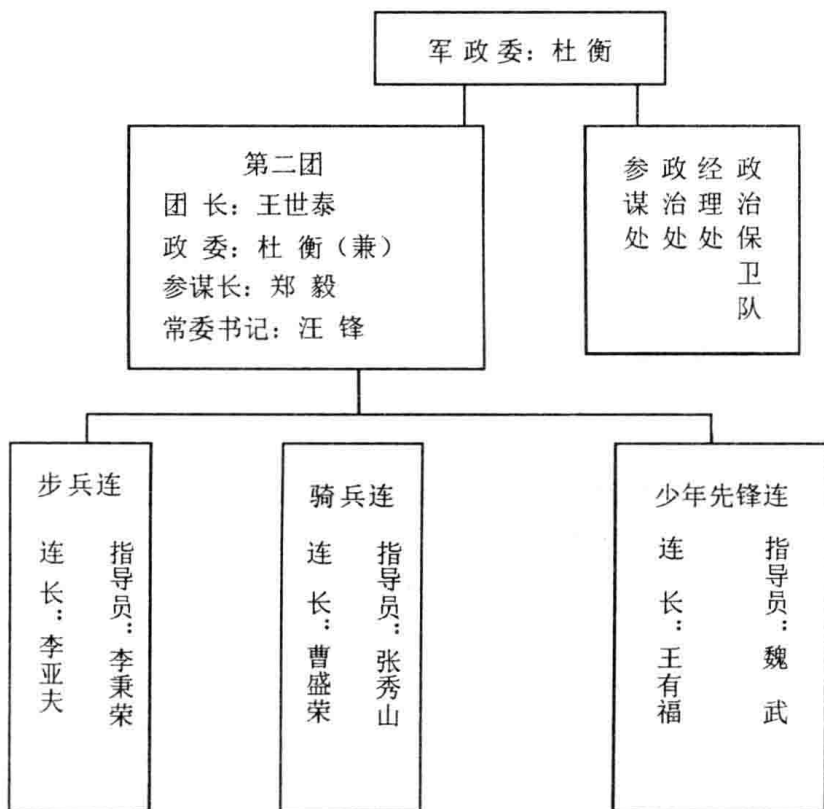
第十七节 “抗大”行政组织系统表



第七章 中共在延安部队 序列组织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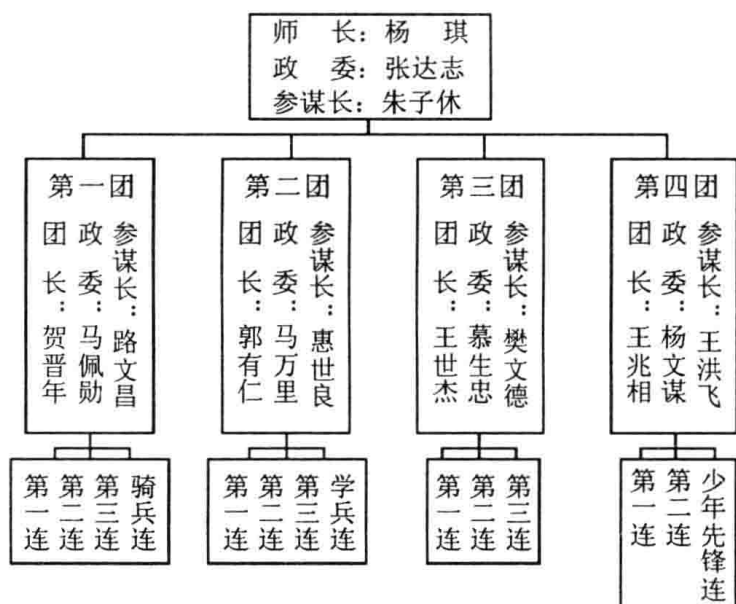
第一节 西北红二十六军序列

(1932年12月)



第二节 西北红军八十四师序列

(1935年1月)



第三节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序列

(1935年9月)

司令员: 彭德怀 副司令员: 林彪

政委: 毛泽东

参谋长: 叶剑英 副参谋长: 张云逸

政治部主任: 王稼祥 政治部副主任: 杨尚昆

第一纵队 (由一军团组成)

司令员: 林彪

政委: 聂荣臻

参谋长: 左权

政治部主任：朱 瑞

第二纵队（由三军团组成）

司令员：彭雪枫

副司令员：刘亚楼

政 委：李富春

参谋长：肖劲光

政治部主任：罗瑞卿

第三纵队（由军委纵队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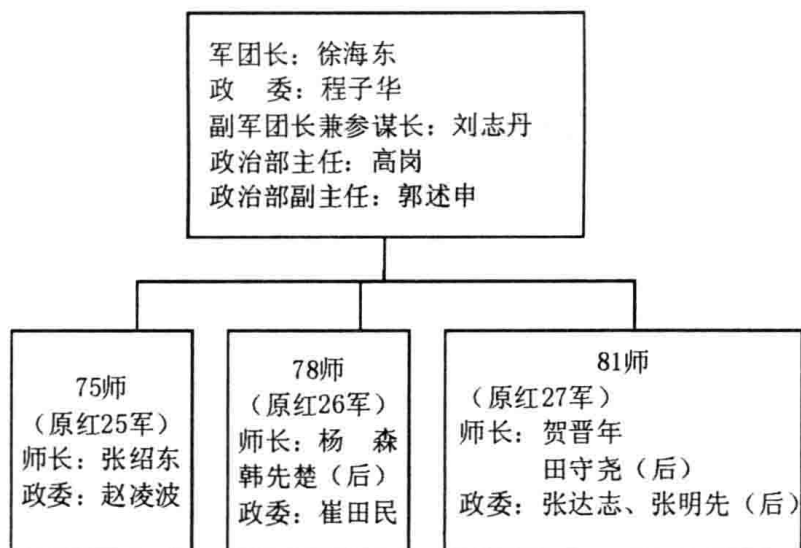
司令员：叶剑英

政 委：邓 发

参谋长：张经武

政治部主任：蔡树藩

第四节 红十五军团序列



第五节 中国红军抗日先锋队序列

(1936年2月)

总司令:彭德怀 总政委:毛泽东
参谋长:叶剑英 副参谋长:张云逸
政治部主任:杨尚昆

南路总指挥部 (红十五军团)	中路总指挥部 (红一军团)	北路总指挥部 (红二十八军)
军团长:徐海东	军团长:林彪	军长:刘志丹
政委:程子华	政委:聂荣臻	政委:宋任穷
参谋长:周士第	参谋长:左权	参谋长:唐延杰
政治部主任:郭述申	政治部主任:朱瑞	政治部主任:伍晋南
├── 第 第 第 ├── 八 七 七 ├── 十 十 十 ├── 一 八 五 └── 师 师 师	├── 第 第 第 ├── 四 二 一 └── 师 师 师	├── 第 第 第 ├── 三 二 一 └── 团 团 团

第六节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亦称十八集团军) 战斗序列

(1937年10月)

总司令:朱德
副总司令:彭德怀
参谋长:叶剑英
副参谋长:左权
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1938年8月王稼祥接任)
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1938年2月谭政接任)
第一一五师 师长:林彪

政治委员：聂荣臻

参 谋 长：周 昆

政治部主任：罗荣桓

政治部副主任：肖 华

第三四三旅 旅 长：陈 光

政治委员：周建屏

副 旅 长：李天佑

参 谋 长：陈士榘

政治部主任：邓 华

第三四四旅 旅 长：徐海东

政治委员：黄克诚

副 旅 长：杨得志

参 谋 长：卢绍武

政治部主任：崔田民

政治部副主任：谭甫仁

第一二〇师 师 长：贺 龙

政治委员：关向应

副 师 长：肖 克

参 谋 长：周士第

政治部主任：甘泗淇

第三五八旅 旅 长：张宗逊

政治委员：李井泉

参 谋 长：姚 喆

政治部主任：张平化

第三五九旅 旅 长：陈伯钧

政治委员：王 震

参 谋 长：郭 鹏

政治部主任：袁任远

第一二九师 师 长：刘伯承

政治委员：张 浩

(1938 年 1 月邓小平接任)

副 师 长：徐向前

参 谋 长：倪志亮

政治部主任：宋任穷

政治部副主任：蔡树藩

第三八五旅 旅 长：王宏坤

政治委员：王维舟

参 谋 长：耿 飏

政治部主任：苏精诚

第三八六旅 旅 长：陈 赓

政治委员：陈再道

参 谋 长：李聚奎

政治部主任：王新亭

第七节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战斗序列（一）

(1938 年 2 月)

军 长：叶 挺

副 军 长：项 英

参 谋 长：张云逸

副参谋长：周子昆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

第一支队 司 令 员：陈 毅

副司令员：傅秋涛

参 谋 长：胡发坚

政治部主任：刘 炎

第二支队 司 令 员：张鼎丞

副司令员：粟 裕

参 谋 长：罗忠毅

政治部主任：王集成

第三支队 司 令 员：张云逸（兼）

副司令员：谭震林

参 谋 长：赵凌波

政治部主任：胡 荣

第四支队 司 令 员：高敬亭

参 谋 长：林维先

政治部主任：肖望东

军直教导队 队 长：周子昆（兼）

教 育 长：冯达飞

政治部主任：余立金

第八节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战斗序列（二）

（1941年3月）

代 军 长：陈 毅

政治委员：刘少奇

副 军 长：张云逸

参 谋 长：赖传珠

政治部主任：邓子恢

第一师 师 长：粟 裕

政治委员：刘 炎

政治部主任：钟期光

第二师 师 长：张云逸（兼）

政治委员：郑位三

副 师 长：罗炳辉

参 谋 长：周骏鸣

政治部主任：郭述申

政治部副主任：张劲夫

第三师 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

参 谋 长：彭 雄

政 治 部 主 任：吴法宪

第四师 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

参 谋 长：张 震

政 治 部 主 任：肖望东

第五师 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

参 谋 长：刘少卿

政 治 部 主 任：任质斌

第六师 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

参 谋 长：罗忠毅

第七师 师 长：张鼎丞

政治委员：曾希圣

参 谋 长：李志高

政治部主任：何 伟

军 直

独立旅 旅 长：梁兴初

政治委员：罗华生

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

校 长：陈 毅（兼）

副校长：赖传珠（兼）

副校长：冯 定

第九节 八路军后方留守处部队序列

(1937 年 8 月)

番 号		负责人	组 成
留守处 主任： 肖劲光 共约 9000 余人	东地区 留守处 主任： 陈伯钧 副主任： 陈先瑞	炮兵营	115 师留下原 74 师改编
		辎重营	115 师留下原 74 师改编
		特务营	120 师留下原独一师 独一团改编
		工兵营	120 师留下原独二师 王兆相部改编
		炮兵营	120 师留下原红 27 军改编
		辎重营	120 师留下原红 27 军改编
	西地区 留守处 主任： 王宏坤 副主任： 王维舟	718 团	120 师 359 旅留下
		特务营	129 师留下原红 29 军改编
		工兵营	120 师留下原陕甘宁一二四 团改编
		炮兵营	129 师留下原红 30 军改编
		辎重营	129 师留下原陕甘宁 三团之二、三连及 关中警卫营改编
		770 团	129 师留下

说明：陕甘宁地方部队自卫军、保安队由边区保安司令部管辖指挥。

第十节 八路军留守兵团序列

(1937年10月)

司令员：肖劲光
政委：高岗
参谋长：毕占云
曹里怀（后）
政治部主任：莫文骅

385旅旅部 旅长：王维舟
副旅长：耿飚

770团 团长：张才千
副团长：胡奇才

警备一团 团长：贺晋年
副团长：李祥

警备二团 团长：周球保
政委：甘渭汉

警备三团 团长：闫红彦
副团长：杜平

警备四团 团长：陈先瑞
政委：罗志敏

警备五团 团长：白志文
政委：李宗贵

警备六团 团长：王兆相

警备七团 团长：尹国赤

警备八团 团长：文年生
政委：师荣

第十一节 八路军南下支队序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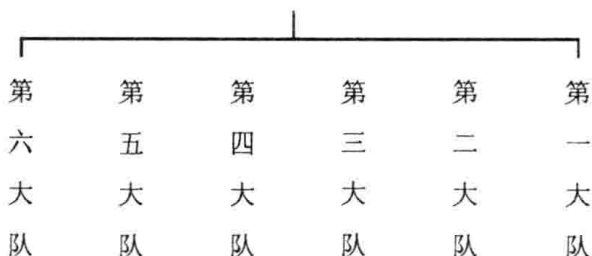
(1944 年 11 月—1945 年 8 月)

司令员：王 震 副司令员：郭 鹏

政 委：王首道 副 政 委：王恩茂

参谋长：朱早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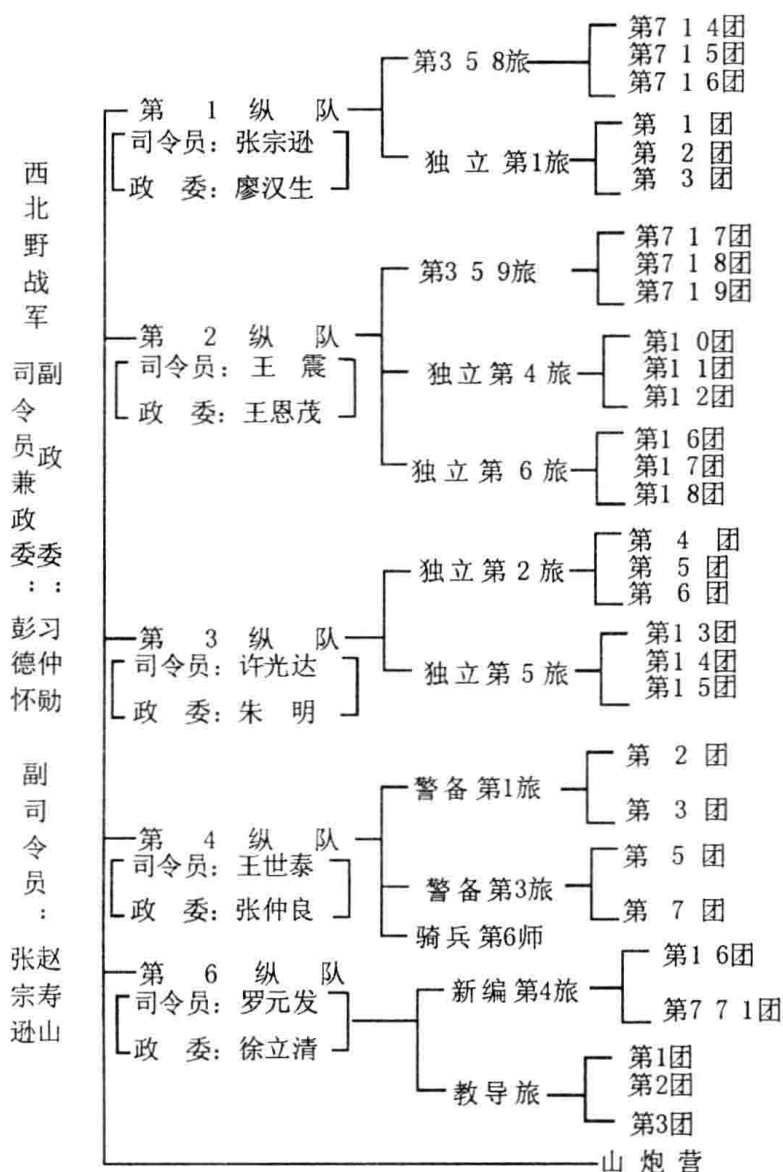
政治部主任：刘 型



(注：南下支队以三五九旅为主组成，共 5000 余人)

第十二节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序列

(1948年1月)



第八章 中共中央在延安 十三年主要驻地

中共中央在延安 13 年中，党中央和中央领导人，曾在陕北的 15 个县市，数 10 个村镇、县城居住，时间较长的地方是吴起、子长、志丹、安塞、延安、米脂、佳县等地的 10 余处地方。根据历史的进程，13 年可分为三段：从 1935 年 10 月 19 日到吴起镇，止 1937 年 1 月 13 日进驻延安为第一阶段；至 1937 年 1 月 13 日进驻延安到 1947 年 3 月 18 日撤离延安为第二阶段；从 1947 年 3 月 18 日撤离延安到 1948 年 3 月 23 日，渡河离开陕北为第三阶段。

下面分别将党中央在延安、在陕北革命活动的主要驻地作以介绍。

第一节 吴起镇

吴起镇，即现吴起县城。位于延安北部，洛河上游的头道川、二道川、宁赛川与洛河交汇处。原属靖边县，现归延安地区管辖。

1935 年 10 月 19 日，中共中央率领北上先遣支队，即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吴起镇。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秦邦宪、刘少奇和李德来到吴起。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住在镇北山坡上的新窑院，刘少奇住在宗湾

子，杨尚昆、徐特立住前街油房院，林伯渠住黄地台，彭德怀住在彭沟门村。

党中央在吴起期间胜利地指挥了“切尾巴”战斗，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1935年10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登上吴旗平台山，组织指挥即将开始的“切尾巴”战斗。早上7时，战斗首先在塔尔湾一带打响，激战两小时，歼敌一个团，击溃3个团，取得了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第一个胜仗。从此，吴旗即将平台山改为胜利山。

1935年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了扩大会议。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刘少奇、彭德怀、凯丰、邓发、叶剑英、李富春、贾拓夫等参加了会议。毛泽东作了“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决定建立西北根据地，领导全国大革命。

党中央在吴起还接见了地方党组织和地方游击队以及红二十六军骑兵团负责人，听取了陕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情况，决定制止错误肃反，命令“停止捕人，刀下留人”。

第二节 下寺湾

下寺湾，属甘泉县管辖，位于甘泉县城西北方向，距城35公里的洛河北岸。这里曾经是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党中央1935年10月28日来到下寺湾。11月初，召开中央常委会议，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等人关于苏区、红军、肃反及劳山、榆林桥战役情况的汇报，决定撤销中共西北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撤销西北军委，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

事处。决定张闻天、博古、刘少奇、李维汉、王首道、董必武等先到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解决错误肃反问题，开展中央工作。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与红十五军团会师，部署直罗镇战役。

第三节 瓦窑堡

瓦窑堡即今子长县城，位于延安以北 95 公里的延榆公路和秀延河畔，原为安定县辖的一个镇，是陕北根据地创始人之一谢子长的故乡。也曾是中共陕西省委和陕北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中共中央机关在张闻天、刘少奇、博古等率领下于 1935 年 1 月 7 日来到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在组织指挥直罗镇战役后于 12 月 13 日也来到瓦窑堡。

党中央在瓦窑堡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组织指挥了红军东征。

1935 年 12 月 17 日至 25 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城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 23 人参加，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制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1936 年 1 月 19 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同志在瓦窑堡发布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26 日，毛泽东、彭德怀离开瓦窑堡，率部东征。

党中央在瓦窑堡还解决了陕北错误肃反问题，释放了在错误肃反中错捕的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人。复刊了《红色中华》报，创建了中国抗日红军军政大学。

中共中央于1936年6月21日离开瓦窑堡，迁往保安县。

第四节 保安

保安即今志丹县城，位于延安西北延定公路92公里的周河东岸，这里是陕甘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刘志丹同志的故乡。1936年7月3日，中共中央进驻保安。

中共中央在保安期间，调整了党的斗争策略，发出了《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制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毛泽东会见了美国记者斯诺和马海德医生。

中共中央从1937年1月13日进驻延安，到1947年3月18日主动撤出，先后在延安住了10年又两个月零5天。党中央机关在延安期间，先后住过的地方是：

第五节 凤凰山

凤凰山驻地处于延安城内西北角凤凰山下。

1937年1月13日，党中央机关到达延安，毛泽东同志先在李建堂旧窑院住，后又迁至吴洪恩的4孔石窑里居住。在这里住了1年零10个月。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在凤凰山居住期间先后召开过五次重大会议，并接见了白求恩大夫。

1. 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洛甫、朱德等56人参加。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中央政治局于31日作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

2. 1937年5月2日至14日，党中央在延安城内二道街（现延安市蔬菜公司院）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同志向大会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刘少奇同志作了《争取全国民主统一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发言。这次会议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在政治上、组织上作了准备。

3.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党中央在洛川县永乡冯家村一所小学校内，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决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增加为11人，选举毛泽东同志为军委书记，朱德、周恩来同志为副书记。中央军委于8月25日发布了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并公布了任职命令。这次会议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4.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了由周恩来、博古、项英等同志组织长江局，领导我国南方工作。

5.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中央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出席会议的共55人，其中有政治局委员12人，中央委员5人，各地区各部门负责人38人。这是从六大以来，参加会议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同志作的《论新阶段》报告，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也在大会作了报告。会议作出了《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和《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划与纪律的决定》。这次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

和南方局，分别由刘少奇和周恩来同志担任书记。

党中央在凤凰山期间，毛泽东同志于1938年3月30日接见了加拿大国际友人白求恩大夫，并同他进行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谈话。

第六节 杨家岭

杨家岭位于延安城北2公里处延河东岸的一个山沟小村。中共中央从1938年11月20日至1943年初，迁住到这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先后在这里住了4年之久。中共中央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农工部、政治研究室、农村工委、职工工委、财委、妇女工委、青年工委等中央机关和部门则一直住到1947年3月18日中央撤出延安时为止。

党中央在杨家岭期间，组织领导了我八路军、新四军、地方武装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抗击了日寇和伪军的侵华战争，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三次反共高潮，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通过整风运动在全党树立了实事求是的作风，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党的七大召开和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党中央在杨家岭曾先后召开过三次重要会议，统一了全党思想，加强了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

1. 1943年3月20日，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调整了中央书记处，成立了中央宣传委员会和中央组织委员会。会议选举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等同志组成中央书记处，毛泽东任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兼中央宣传委

员会书记和中央党校校长等职。规定了书记处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就是从组织上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会议还决定了刘少奇兼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和中央研究局局长，参加军委，任军委副主席，并分管华中的全面工作。从此，刘少奇同志成为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和毛泽东同志的得力助手。

2.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在杨家岭召开了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会议讨论通过了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七大准备工作。这次会议先后历时11个月，共举行过8次全体会议，使这项《决议》对党在历史上的若干问题和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阐明了在全党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为党的七大召开和抗日战略反攻作了准备。

3.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同志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和《两个中国之命运》开幕词，《愚公移山》闭幕词。刘少奇同志作修改党章报告，朱德同志作《论解放区战场》军事报告，周恩来同志作《论统一战线》的讲话。大会选举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等职。七大标志着全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此外，1942年5月2日至23日，党中央在杨家岭还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议。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针对性地深刻地阐明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回答了文艺工作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

1946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杨家岭还接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发表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坚定信念。

第七节 枣 园

枣园，位于延安城西北，距城区约七八公里的西川河畔。党中央从保安迁来延安后，中央社会部曾住在这里。1940年杨家岭开始搞基建，加之日寇飞机轰炸等原因，中央决定从1943年起，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朱德等中央领导迁住枣园办公。

中央领导在枣园期间，领导了全党的整风运动和解放区军民的大生产运动，筹备了党的七大，决定了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和建立东北根据地以及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等重大问题。

1945年8月25日，党中央发表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去重庆谈判。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飞机离开延安去重庆举行国共和谈。在此期间，中央决定刘少奇同志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主持中央工作。

1945年9月15日，党中央决定建立东北局，19日发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的指示，向东北调遣了两万多名干部，13万部队，建立了东北根据地。

1945年末，中央发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和《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的指示，各解放区掀起了以战备为中心的练兵、减租、发展生产和土地改革运

动。组织起解放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第八节 王家坪

王家坪位于延安城郊延河北岸的山脚下。1938年11月20日，中央军委和八路军司令部（后为解放军总部）迁到这里。朱德同志从1941年5月到1945年8月，一直住在这里，期间还在枣园住过一段。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在撤离延安前，也曾在这里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于1947年3月从这里撤离延安。

中共中央从1947年3月18日撤出延安，到1948年3月23日在吴堡县川口村的园则塔渡口过黄河，前往华北，历时1年零5天转战陕北，曾住过许多地方，主要介绍以下7个地方：

第九节 任家山

任家山属子长县管辖。位于子长县以东30余公里处黄家川与丹头沟之间的山沟小村。1947年3月18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中共中央机关撤出延安于19日晨到达延川县永坪镇的刘家渠。当晚离开，3月24日晚到达任家山。同已到此地的朱德、任弼时会合。研究部署青化砭战役。3月25日青化砭一战，仅用1小时47分，歼灭敌三十一旅旅部和1个团，共3000余人，活捉了敌旅长李纪云。

第十节 枣林沟

枣林沟属于清涧县石嘴驿乡。1947年3月2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率中央机关离开任家山，向东进发，寅夜到达清涧县西北面的石咀驿附近的山庄枣林沟。在此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也叫枣林沟会议。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叶剑英、杨尚昆等出席了会议。

会议决定，为了适应战争需要，中央分为前委、工委和后委。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主持中央工作，简称前委，领导和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同志组成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负责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由叶剑英、杨尚昆等同志组成后方委员会，转移到晋西北临县双塔村。

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按军事编制，编为4个大队，成立了司令部，番号叫三支队，任弼时为司令，陆定一为政委，叶子龙为参谋长，汪东兴为副参谋长，廖志高为政治部主任。中央警卫团改番号为九团。

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为每个领导起了新的代号。毛泽东说：“我们一定得胜利，我就叫李得胜”。周恩来说：“革命的事业必定成功，我叫胡必成”。毛泽东对任弼时和陆定一说：“你是支队司令，就叫史林；定一同志是政委，就叫郑位吧！”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的革命斗志和必胜信心。

第十一节 王家湾

王家湾属安塞县王家湾乡，位于安塞县北，距县城 60 余公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前委于 1947 年 3 月 28 日离开枣林沟，经绥德县田庄，于 4 月 13 日到达王家湾，至 6 月 7 日，共住 56 天。中央前委在此部署了羊马河战役和蟠龙战役。羊马河战役全歼敌一三五旅 4700 余人，俘敌代旅长麦宗禹。蟠龙战役全歼守敌一六七旅及 1 个团 6700 余人，俘敌旅长李昆岗，缴获山炮 6 门，军衣 4 万多套，面粉 1.2 万袋，骡马千余匹，击落敌机 1 架。

4 月 15 日毛泽东在王家湾作出了《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的指示，电告彭德怀等同志“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他在这里为中央起草文电 114 件，周恩来也为新华社写了《新筹安会——评蒋政府改组》社论等。

第十二节 小河村

小河村属靖边县，位于县城东南的绥靖公路上。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前委从 6 月 7 日至 8 月 1 日，先后两次进驻小河村，共住 48 天。

中央前委于 7 月 21 日至 28 日在小河村召开了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彭德怀、习仲勋、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王震、贺龙、张经武、陈赓等同志参加。会议研究了我军战略进攻开始后，各解放区的配合作战问题。

第十三节 朱官寨

朱官寨属佳县（即葭县），位于佳县西北、五女河畔。1947年8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前委机关离开小河村，沿大理河向东出发。行军开始后将部队番号三支队改称九支队，九团改称三团。8月21日，中央前委到达佳县的东亢村。毛泽东向在东亢村召开的西北野战军高干会议的全体同志讲了话。8月24日，中央前委机关到达佳县的朱官寨，在这里住了一个月。

在朱官寨，中共中央任命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兼中央军委代理总参谋长。并于9月1日发出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规定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大反攻，将人民解放军主力打到外线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

第十四节 神泉堡

神泉堡属佳县管辖，位于佳县城西南10公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央前委于1947年9月23日，来到佳县神泉堡，在神泉堡住了57天。

在神泉堡，中央军委先后命令组建了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和第六纵队。四纵队由警一旅、警三旅和骑兵第六师组成；六纵队由新四旅、教导旅组成。9月28日周恩来同志给中央前委机关干部作了时局问题的报告。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解放军总部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明确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第十五节 杨家沟

杨家沟属米脂县管辖，位于米脂县城以东 25 公里小河沟上游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前委于 1947 年 11 月 22 日到达这里，先后住了 4 个月。1948 年 3 月 21 日离开，经绥德县吉镇和佳县刘家坪，于 3 月 23 日，来到吴堡县川口村园则塔渡口乘船渡过黄河，前往华北，结束了 1 年零 5 天的转战陕北的戎马征程。

中共中央在杨家沟举行了著名的“十二月会议”。会议于 1947 年 12 月 25 日至 28 日召开。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以及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的主要负责人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彭德怀、贺龙、林伯渠、张宗逊、习仲勋、马明方、张德生、甘泗琪、王维舟、李井泉、赵林、王明、谢觉哉、李维汉、李涛等 19 人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号召全党同志夺取全国的胜利：“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与会同志一致认为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重大贡献。

这次会议，是在中国革命伟大转折关头召开的。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次会议及时地纠正了党在工作中出现的偏向，保证了全党工作的顺利开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全国的胜利，在政治、思想和一系列政策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第九章 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 召开的重要会议

第一节 瓦窑堡会议

时 间：1935 年 12 月 23 日至 25 日

地 点：陕北瓦窑堡

出席者：张闻天 毛泽东 周恩来 刘少奇 秦邦宪
王稼祥 邓 发 张 浩 杨尚昆 李维汉
何克全 郭洪涛

会议内容：制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和《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时 间：1937 年 5 月 2 日至 5 月 14 日

地 点：延安

出席代表：正式代表 226 人，列席 74 人

会议内容：张闻天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
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等。会议批准了党中央自1935年以来的新的政治路线。

第三节 洛川会议

时 间：1937年8月22日至25日

地 点：陕北洛川冯家村

出席者：张闻天 毛泽东 周恩来 博古 凯丰
彭德怀 朱德 任弼时 关向应 贺龙
刘伯承 张国焘 张浩 林彪 聂荣臻
罗瑞卿 张文彬 肖劲光 周建屏 林伯渠
徐向前 傅钟 周昆

会议内容：讨论抗日战争战略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

第四节 六届六中全会（扩大）

时 间：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

地 点：延安桥儿沟

出席者：

政治局委员：毛泽东 朱德 周恩来 王明 张闻天
博古 王稼祥 彭德怀 刘少奇 陈云
康生

中央委员：关向应 张浩 杨尚昆 李富春 李维汉

各地领导干部：

贺龙 邓小平 罗荣桓 彭真 潘汉年 曾山

吴玉章	张文彬	朱理治	贾拓夫	林伯渠	谢觉哉
冯文彬	李 昌	林 彪	罗瑞卿	滕代远	肖劲光
谭 政	郭述申	高自立	高 岗	成仿吾	高文华
柯庆施	孟庆树	曹轶欧	肖 克	杜理卿	徐海东
宋一平	谭余保	涂振农	李六如	程子华	陈 刚
杨 松					

主要议程：开幕词——张闻天

政治报告（论新阶段）——毛泽东

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王稼祥

组织问题报告——张闻天

八路军工作报告——朱 德

新四军工作报告——项 英

统一战线工作报告——周恩来

北方局工作报告——刘少奇

中共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王明

青年工作报告——秦邦宪

职工运动工作报告——张 浩

组织工作结论——刘少奇

总结论——毛泽东

闭幕词——王稼祥

全会通过了《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决议》；《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告全国同胞全体将士和国共两党同志书》及各种宣言、通电等。

全会新选了中央委员，决定成立南方局、中原局，撤销了长江局，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批准了以毛泽

东为代表的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正确路线。

第五节 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

时 间：1941年9月—10月22日

地 点：延安

出席者：毛泽东 任弼时 王 明 洛 甫 王稼祥
陈 云 凯 丰 杨 松 邓 发 朱 德
康 生 杨尚昆 李富春 林伯渠 高 岗
叶剑英 王首道 胡乔木 罗 迈

内 容：讨论党在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
路线问题及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问题。

第六节 六届七中全会（扩大）

时 间：1944年5月21日—1945年4月20日

地 点：延安

出席者：

主席团成员：毛泽东 朱 德 刘少奇 任弼时 周恩来
中央委员：康 生 彭德怀 洛 甫 邓 发 陈 云
博 古 李富春 吴玉章 杨尚昆 孔 原
陈 郁 罗 迈

病假四人：王稼祥 王 明 凯 丰 关向应

外出二人：林伯渠 董必武

参加者：彭 真 高 岗 贺 龙 林 彪 叶剑英
刘伯承 陈 毅 聂荣臻 朱 瑞 徐向前
谭 政

主要内容：在继续讨论总结党的历史的基础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泽东的工作报告和朱德总司令的军事报告、提出“七大”议事日程、“七大”主席团名单、代表审查及会场规则等。

附：七大主席团名单：

毛泽东 朱 德 刘少奇 周恩来 林伯渠 彭德怀
康 生 陈 云 陈 毅 贺 龙 徐向前 高 岗
张闻天 彭 真 任弼时
秘书长：任弼时 副秘书长：李富春

第七节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 间：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

地 点：延安杨家岭

出席代表：正式 547 人；候补 208 人。

主要议程：制定党的政治路线；讨论修改党章；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

选出中央委员（44 人）

毛泽东 朱 德 刘少奇 任弼时 林伯渠 林 彪
董 必武 陈 云 徐向前 关向应 陈潭秋 高 岗
李富春 饶漱石 李立三 罗荣桓 康 生 彭 真
王若飞 张云逸 贺 龙 陈 毅 周恩来 刘伯承
郑位三 张闻天 蔡 畅 邓小平 陆定一 曾 山
叶剑英 聂荣臻 彭德怀 邓子恢 吴玉章 林 枫
滕代远 张鼎丞 李先念 徐特立 谭震林 薄一波
陈绍禹（王 明） 秦邦宪（博 古）

选出候补中央委员（33 人）

廖承志	王稼祥	陈伯达	黄克诚	王首道	黎 玉
邓颖超	陈少敏	刘 晓	谭 政	程子华	刘长胜
粟 裕	王 震	宋任穷	张际春	云 泽	（乌兰夫）
赵振声	（李葆华）	王维舟	万 毅	古大存	曾镜冰
陈 郁	马明方	吕正操	罗瑞卿	刘子久	张宗逊
陈 赓	王从吾	习仲勋	肖劲光	刘澜涛	

第八节 陕甘宁边区第一、二、三届参议会

届次	时 间	地 址	参议员人数			会议议程	议长		主席		政府委员	高等法院院长
			正式	候补	合计		正	副	正	副		
第一届	一九三九·一— 一九四二·四	延安			一四五	政府施政报告； 政府各厅、院、处关于各该部门的工作 报告； 通过各种提案和法规；选举。	高 岗	张邦英	林伯渠	高自立	十五人	雷经天
第二届	一九四一·十一— 一九四二·廿二	边区参议会礼堂	二〇一	十八	二一九	政府工作报告；民主建设报告； 参议会常驻会工作报告；说明施政纲领； 军事工作报告；讨论并通过提案； 财政工作报告；选举； 经济建设报告。	高 岗	谢觉哉 安文钦	林伯渠	李鼎铭	十八人	雷经天
第三届	一九四六·四— 一九四七·廿七	同上	一三五	三五	一七〇	政府工作报告；司法工作报告； 选举工作报告；干部工作报告；财 政工作报告；军事工作报告；经济建 设方案报告；讨论通过各种提案；文教建 设方案报告；选举。	高 岗	安文钦 谢觉哉	林伯渠	李鼎铭 刘景范	十九人	马锡五

第九节 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

时 间：1947 年 7 月 21 日
地 点：陕北靖边县小河村
内 容：研究部署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进攻问题。
出 席 者：毛泽东 周恩来 任弼时 陆定一 杨尚昆
习仲勋 彭德怀 马明方 贾拓夫 张宗逊
王 震 贺 龙 张经武 陈 赓

第十节 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

时 间：1947 年 12 月 23 日至 28 日
地 点：米脂县杨家沟
内 容：讨论研究在历史转折新形势下党的任务。
参 加 人：毛泽东 周恩来 任弼时 陆定一 彭德怀
贺 龙 林伯渠 张宗逊 习仲勋 马明方
张德生 甘泗淇 王维舟 李井泉 赵 林
陈绍禹 谢觉哉 李维汉 李 涛

第十一节 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

时 间：1942 年 5 月 2 日—23 日
地 点：延安杨家岭办公厅楼
参 加 者：除中央有关领导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王稼祥、
博古、凯丰、徐特立、康生外，各部门负责人及文
艺工作者有：刘伯羽、罗烽、草明、田方、张悟

真、陈波儿、丁玲、李伯钊、瞿维、力群、白朗、塞克、周文、胡绩伟、李卓然、天 蓝、江丰、李雷、艾思奇、欧阳山、姚时晓、王震之、袁文殊、王曼硕、刘岷、石泊夫、郑文、于黑丁、陈企霞、吕骥、丁浩川、郁文、陈伯达、傅钟、肖向荣、何思敬、陈学昭、张 庚、罗工柳、王 滨、干学伟、曹葆华、欧阳山尊、胡 采、马 加、曾克、周立波、高 阳、张 仃、刘雪苇、蔡若虹、胡 蛮、金紫光、伊 明、周 杨、艾 青、钟敬之、李丽莲、潘 奇、康荣枚、许 珂、张水华、任 虹、魏东明、宋侃夫、纪 明、公 木、范文澜、杜矢甲、阿 甲、张季纯、张贞馥、张 望、于 敏、张 桂、严文井、陈荒煤、何其芳、张铁夫、佟天林、华君武、杨 赉、李又然、李元庆、向 隅、肖 军、柯仲平、林默涵、古 元、王朝闻、郭小川、石 鲁、马健羽、张寒辉等。

议 程：5月2日开幕，凯丰主持，毛泽东作了“引言”的讲话，然后讨论；

5月16日，进行大会讨论；

5月23日，讨论结束后，毛泽东作了“结论”的讲话。

第十章 陕甘宁边区专员县长名录

(1937—1950)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各分区专员

三边分区 (1937 年 10 月成立)

专 员：王子宜 1937. 11. 9—1939. 2. 25

强晓初 1939. 2. 25—1941. 2. 23

罗成德 1941. 2. 23—1946. 5. 15

吴志渊 1946. 5. 15—1949. 5. 20

陈思恭 1949. 8. 15

副专员：吴志渊 1945. 10. 20—1946. 5. 15

陈思恭 1947. 10. 3—1949. 8. 15

关中分区 (1937 年 7 月成立, 1949 年 5 月改为三原分区。)

专 员：霍维德 1937. 7. 10—1939. 11. 21

习仲勋 1939. 12. 21—1942. 12. 27

张仲良 1942. 12. 27—1943. 9. 30

张鹏图 1945. 5. 5—1946. 5. 15

杨玉亭 1946. 5. 15—1949

副专员：张鹏图 1941. 4. 16—1945. 5. 5

杨玉亭 1945. 5. 5—1946. 5. 15

张凤岐 1948. 8. 20—1949. 12. 31

陇东分区（1940年4月成立，1949年7月28日改为庆阳分

专 员：马锡五 1937. 9—1946. 5. 15

王维舟 1940. 2. 10—1942. 12. 27

朱开铨 1946. 5. 15—1947. 6. 17

张仲良 1947. 6. 17—1948. 2. 16

李丕福 1948. 2. 16—1949. 7. 28

李生华 1949. 7. 28 任

副专员：朱开铨 1940. 2. 10—1940. 7. 11

马锡五 1940. 7. 1—1942. 12. 17

朱 敏 1942. 12. 27—1944. 8

朱开铨 1945. 8. 28—1946. 5. 15

李丕福 1946. 12. 24—1947. 6. 17

1947. 6. 17—1948. 2. 16（第二副专员）

谢怀德 1947. 6. 17—1948. 2. 16（第一副专员）

王治邦 1943. 3. 18—1949. 8. 13

绥德分区（1940年2月成立）

专 员：王 震 1940. 2—1942. 12. 27（兼）

袁任远 1942. 12. 17—1945. 8. 28

杨玉亭 1945. 8. 28—1949. 8. 15

霍祝三 1949. 8. 15 任

副专员：张秀山 1940. 3（代）—1940. 5

李景波 1940. 5—1940. 7

马豫章 1940. 8—1941. 7. 29

曹力如 1941. 7. 29—1942. 12. 27

杨和亭 1942. 12. 27—1945. 8. 28

王恩惠 1945. 8. 28—1946. 12. 24

马定邦 1947. 8. 11—1948. 3. 10

霍祝三 1948. 3. 10—1949. 8. 15

曹 扶 1949. 8. 25—1950. 1. 19

延属分区 (1942 年 12 月成立)

专 员: 曹力如 1942. 11. 30 — 1946. 5. 15

李景林 1946. 5. 15—1949. 5. 5

副专员: 李景林 1942. 12. 27—1943. 2. 6

马豫章 1943. 2. 6—1944. 11

谭生彬 1944. 12. 27—1945. 10. 20

张育民 1945. 11. 4—1948. 8. 20

杨彩彬 1948. 8. 20 — 1949. 4. 2

曹 扶 1949. 4. 2—1950. 1. 19

黄龙分区 (1948 年 4 月前成立)

专 员: 黑志德 1948. 5. 3—1949 (仍任)

副专员: 王恩惠 1948. 5. 3—1949. 3. 7

郭景龙 1949. 7. 22 任

西府分区 (1948 年 4 月成立, 1949 年 5 月改为彬县分区)

专 员: 杨伯伦 1948. 4. 26—1948. 8. 20

赵伯劲 1948. 8. 20 (兼)

副专员: 赵锦峰 1948. 4. 26—1949. 10. 8

严崇师 1949. 12. 31 (任)

榆林分区 (1949 年 1 月成立)

专 员: 白志明 1949. 1. 15 任
朱侠夫 1949. 3. 18 兼

大荔分区 (1949 年 3 月成立)

专 员: 王恩惠 1949. 3. 7 — 1949. 10. 13
刘文蔚 1949. 3. 7 任
副专员: 史 青 1949. 3. 7 任

宝鸡分区 (1949 年 5 月成立)

专 员: 张育民 1949. 5. 20 任
副专员: 郭存倍 1949. 5. 20 任

咸阳分区 (1949 年 5 月成立)

专 员: 吴志渊 1949. 5. 20—1949. 10. 8
鹿 鸣 1949. 10. 8 任

渭南分区 (1949 年 5 月成立)

专 员: 谢怀德 1949. 5. 20—1949. 10. 8
张俊贤 1949. 10. 8 任

西安市 (1949 年 5 月成立)

市 长: 贾拓夫 1949. 5. 20 任
第一副市长: 方仲如 1949. 5. 20 任
第二市长: 张锋伯 1949. 5. 20 任

平凉分区 (1949 年 7 月成立)

专 员: 王治邦 1949. 8. 13 任

副专员: 王子厚 1949. 8. 13 任

会宁分区 (1949 年 7 月成立, 9 月 2 日改为定西分区)

专 员: 白炳忻 1949. 8. 15 任

副专员: 陆为公 1949. 8. 15 任

临夏分区 (1949 年 7 月成立)

专 员: 马尔沙 1949. 8. 15 任

岷县分区 (1949 年 7 月成立)

专 员: 刘仁达 1949. 8. 15 任

副专员: 赵玉文 1949. 8. 15 任

武都分区 (1949 年 7 月成立)

专 员: 赵希敏 1949. 8. 15 任

副专员: 吴治国 1949. 8. 15 任

天水分区 (1949 年 7 月成立)

专 员: 安 振 1949. 8. 15 任

副专员: 潘光亚 1949. 8. 15 任

武威分区 (1949 年 7 月成立)

副专员: 刘永培 1949. 8. 15 任

酒泉分区 (1949 年 7 月成立)

专 员: 周仁山 1949. 8. 15 任

兰州市 (1949 年 7 月成立)

市 长: 吴鸿宾 1949. 9. 5 (兼)

副市长: 孙剑峰 1949. 9. 5 任

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各县县长

延安市

市 长: 高朗亭 1940. 2. 10 免

高述先 1940. 2. 10—1941. 11. 30

李景林 1941. 30 任 1942. 12. 27 (兼) —1943. 2. 6

曹力如 1943. 2. 6 (兼) —1944. 12. 30

马豫章 1943. 2. 6 (兼) 1944. 12. 30—1945. 10. 20

谢怀德 1946. 5. 15—1947. 6. 17

姚安吉 1945. 10. 20 (代) —1949. 3. 7

副市长: 马豫章 1944. 3. 28 (兼) —1944. 12. 20

姚安吉 1946. 5. 15 任

刘秉温 1948. 9. 1—1949. 3. 7

延安县

县 长: 谭生彬 1940. 6. 7 免

刘秉温 1941. 10. 31 (兼) —1943. 9. 30

徐天培 1943. 9. 30 (代) —1944. 10. 31

曹 扶 1944. 10. 31 (代)

1946. 5. 15—1948. 3. 7

胡起林 1948. 3. 7 (代) —1948. 6. 29

张忠明 1948. 6. 29 (代) —1949. 3. 7

赵子康 1949. 3. 7—1949. 8. 5

史纪金 1949. 8. 5 任

副县长: 卜吉甫 1948. 10. 21 任

富 县

县 长: 罗成德 1940. 2. 13—1941. 2. 23

谢怀德 1941. 2. 23—1943. 9. 30

高象贤 1942. 9. 14 任

张育民 1943. 9. 30 (代) —1945. 11. 4

王占山 1945. 11. 4—1945. 12. 14

郭景龙 1946. 5. 15—1948. 3. 7

苏耀亮 1948. 3. 7—1949. 3. 4

史正刚 1949. 3. 4 任

副县长: 李正荣 1945. 10. 25 任

王复成 1946. 5. 15—1947. 12. 2

宋居义 1948. 6. 21 任

高振东 1950. 1. 17 任

甘泉县

县 长: 王明远 1940. 4. 20 免

路思温 1940. 4. 20—1941. 8. 4

白世杰 1941. 8. 4 (代)

1941. 10. 21 (兼) —1943. 11. 24

惠居良 1943. 11. 24—1947. 10. 20 (撤)

惠光弟 1947. 9. 5 任

化登朝 1948. 4 任

副县长: 惠居良 1946. 5. 15—1947. 9. 5

惠光弟 1946. 5. 15—1947. 9. 5

王尚义 1948. 6. 21—1949. 5. 11

固临县 (1948 年 7 月 11 日取消)

县 长: 赵建国 1942. 1. 28 (兼) -- 1943. 2. 6 (病免)

曹九德 1943. 2. 6 代

冯德厚 1946. 5. 15—1947. 10. 21

刘齐家 1947. 10. 21—1948. 7. 17

副县长: 郝显德 1946. 5. 15—1947. 12. 2

临镇县 (1949 年 1 月取消)

县 长: 刘齐家 1948. 7. 17 (代) —1949. 3. 4

副县长: 张 振 1948. 7. 17—1949. 3. 4

延长县

县 长: 谭生成 1940. 6. 17 任

白世杰 1940. 6. 17 (代) —1941. 8. 4

焦生炳 1941. 8. 4 (代)

1942. 1. 28—1944. 10. 31

刘志模 1943. 6 任

呼思恭 1944. 10. 31 (代) —1946. 12. 24

董耀卿 1946. 12. 24 (代) —1947. 7. 10 (撤)

谭生成 1947. 7. 10 (代) —1948. 4. 8

白云亭 1948. 4. 8 (代) —1948. 10. 11

王治国 1948. 10. 11 (代) —1949. 5. 11

郭志清 1949. 5. 11 代

副县长: 白云亭 1946. 5. 15—1948. 4. 8

李国选 1948. 4. 8—1948. 6. 29

郭志清 1948. 6. 29 任

延川县

县长：常德义 1940.1 任

辛兰亭 1940.1 代

1942.1.28（兼）—1943.6.29

陆 铨 1943.6.29（代）—1943.9.30

刘志模 1943.11.24—1946.5.15

刘璞臣 1946.12.24（代）—1948.10.11

花丰艳 1948.10.11（代）1949.3.4

贺正明 1949.3.4 任

麻绍宗 1949.8.11 任

副县长：刘璞臣 1946.5.15—1947.7.15

王儒珍 1947.7.15—1948.6.21

花丰艳 1948.6.21—1948.10.11

贺正明 1948.10.21—1949.3.4

麻绍宗 1949.3.4 任

安塞县

县长：石子珍 1941.4.17（免）

邵青华 1941.4.16（代）

1942.1.27（兼）—1943.9.30（因学习免）

贺兴旺 1943.9.30（代）

1946.5.15—1947.10.21（因参军免）

许福财 1947.10.21（代）—1949.3.4

宋殿贤 1949.3.4—1949.8.17

樊和亭 1949.8.17（任）

副县长：宋殿贤 1948.6.21—1949.3.4

樊和亭 1949.3.4—1949.8.17

郭子龙 1949.8.17 任

安定县 (1942 年 2 月 28 日改为子长县)

县 长: 薛兰斌 1941. 4. 16 免

黄静波 1941. 4. 17 (代)

黄聚俊 1941. 7. 28 (代)

1941. 11. 30 (兼) —1944. 10. 31

李子厚 1944. 10. 31 任

苏耀亮 1946. 5. 15—1948. 3. 7

鹿 鸣 1948. 3. 7 代

白光明 1949. 3. 9—1949. 5. 21

樊志杰 1949. 11. 19 任

副县长: 魏明选 1946. 5. 15—1948. 6. 21

白光明 1948. 6. 21—1949. 3. 9

樊志杰 1949. 3. 9—1949. 11. 19

志丹县

县 长: 赵耀先 1940. 6. 7 免

赵玉文 1940. 6. 7 (代) —1942. 6. 20

李 超 1942. 6. 20 (代) —1943. 9. 30 (因学习免)

李生华 1943. 9. 30 (代)

赵玉文 1946. 5. 15—1947. 10. 21 (因参军免)

胡占元 1947. 10. 21 (代) —1948. 3. 10

王海清 1948. 3. 10 (代) —1949. 5. 11

刘世金 1949. 5. 21 (代)

副县长: 刘世金 1948. 6. 21 (代)

绥德县

县 长: 马豫章 1941. 7. 29 免

曹力如 1941. 7. 29 (兼) —1942. 7. 23

霍祝三 1946. 5. 15—1948. 3. 10

乔兴和 1948. 3. 10 (代) —1948. 6. 23 (因救灾不力撤)

史纪金 1948. 6. 23 (代) —1949. 5. 20

吴辅功 1949. 5. 9—1949. 10. 15

杨岐山 1949. 10. 15 任

副县长: 乔兴和 1947. 6. 17—1948. 3. 10

吴辅功 1948. 4. 8—1949. 5. 9

霍居贵 1949. 8. 7 任

米脂县

县长: 马继堂 1942. 5. 20 任

1944. 1. 1—1946. 11. 24

姬伯雄 1946. 11. 24 (代) —1947. 12. 2

乔备果 1947. 12. 2 (代) —1948. 4. 8

李身修 1948. 4. 8 (代) —1949. 8. 17

高鹏贵 1949. 8. 17 任

副县长: 魏 伯 1942. 5. 20—1943. 1. 15

贺秉章 1943. 1. 15

1944. 1. 1—1944. 5. 18

宋常华 1947. 6. 17—1947. 8. 1 (因参军免)

白耀明 1947. 8. 1—1947. 12. 2

高崇维 1948. 4. 8—1949. 5. 21

高庆昌 1949. 8. 17 任

佳 县

县长: 倪 伟 1942. 5. 20—1943. 9. 30

马 义 1943. 9. 30 任

1944. 1. 1—1944. 5. 18

魏希文 1944. 5. 18 任

杜嗣克 1946. 5. 15—1947. 12. 2

黑长荣 1947. 12. 2（代）—1949. 3. 26

张耀文 1949. 5. 21 代

李身修 1949. 8. 17 代

副县长：黑长荣 1947. 6. 17 任

李德玉 1948. 4. 8—1949. 5. 21

张耀文 1949. 10. 15 任

吴堡县

县长：张鹏图 1941. 4. 6 免

刘汉鼎 1941. 4. 17（代）—1941. 7. 28

王恩惠 1941. 7. 23 代

1941. 10. 31（兼）—1943. 9. 30

李向良 1943. 8. 31（代）—1946 初（因学习免）

折永年 1943. 11. 24—1945. 5. 17

魏希文 1946. 5. 15—1948. 4. 8

王锦荣 1948. 4. 8（代）—1949. 12（仍任）

副县长：李培仁 1948. 5. 27—1949. 3. 26

清涧县

县长：黄聚俊 1941. 4. 16（代）—1941. 7. 23（调志丹县）

黄静波 1941. 7. 23—1943. 12（调粮食局）

任秀明 1943. 12（代）—1944. 10

贺秉章 1944. 5. 18—1945. 10. 20

王士荣 1945. 10. 20—1947. 7. 10（撤）

史文秀 1947. 7. 10（代）—1948. 4. 8

王尚业 1948. 4. 8（代）—1949. 5. 5

韩兆登 1949. 5. 5（代）

白云胜 1949. 8. 17 任

副县长：黄 凯 1948.4.8—1949.3.26

韩兆登 1949.3.26—1949.5.5

神府县

县 长：乔钟灵 1940.6.7 因病修养

刘海珠 1940.6.7（代）—1941.8.8（因学习免）

毛凤翔 1941.8.8（代）

副县长：1941.10.21（兼）

刘朝功 1949.9.25 任

马能元 1949.9.25 任

副县长：齐正学 1949.5.25 任

镇川县

县 长：史文秀 1946.12—1947.7.7

王恩惠 1947.7.2—1948.4.8

王庆海 1948.4.8（代）

贺治国 1949.9.25 任

副县长：王庆海 1948.2.16—1948.4.8

贺治国 1948.6.29—1949.9.25

横山县

县 长：李坤润 1946.12—1947.9.30

赵生仁 1947.9.30（代）—1949.3.26

高俊德 1949.6.11 任

副县长：赵生仁 1947.8.4—1947.9.30

李坤润 1947.12.2（免）

李东国 1947.12.2（免）

杜秉德 1948.4.8—1949.5.9

郭文荣 1949.9.25 任

子洲县①

县长：折永年 1943. 9. 30 — 1943. 11. 24

谢怀德 1943. 11. 24 任

王占山 1946. 5. 25—1946. 11. 24 (病免)

李身修 1946. 11. 24 (代) — 1948. 4. 8

高浩富 1948. 4. 8—1949. 5. 21

刘直卿 1949. 5. 21 代

冯祖烈 1949. 8. 17 任

副县长：薛程 1948. 5. 27—1948. 12. 25

定边县

县长：王子宜 1939. 2. 25 (兼)

强晓初 1939. 2. 25 (兼) — 1941. 2. 23

罗成德 1941. 2. 23 (兼) — 1943. 1. 17

吴志渊 1943. 1. 17—1943. 11. 24

1944. 11. 10 (代) — 1945. 10. 20

孙润华 1943. 11. 24—1944. 11. 10

丁子齐 1945. 10. 20 任

1948. 4. 8—1949. 10. 15

杨存富 1948. 2. 16 (代) — 1948. 4. 8

蔺文奎 1949. 10. 15 任

副县长：丁子齐 1944. 5. 18—1945. 10. 20

韩孝忠 1948. 10. 11—1949. 5. 9

马凤来 1949. 8. 2—1949. 9. 14

郭子龙 1949. 10. 15 任

吴旗县

县长：王明远 1942. 6. 5—1944. 11. 10

杨存富 1944. 11. 10 (代) — 1946 初

白国民 1946. 5. 15 任

齐德庵 1949. 8. 2 任

副县长：齐德庵 1948. 12. 25 任

安边县

县长：刘文卿 1946. 6. 15—1947. 7. 6（撤）

刘汉鼎 1947. 9. 30（代）—1949. 10. 29

副县长：邓清辉 1945. 12. 14 任

张文辉 1946. 5. 15—1947. 9. 30

张 文 1949. 9. 30 免

靖边县

县长：王治邦 1941. 9. 16 免

王士俊 1941. 9. 16（代）—1941. 10. 21

王治邦 1942. 10 — 1942. 11. 5（撤）

孙润华 1942. 6. 12 任

1942. 11. 5（代）—1943. 2. 6

马万里 1943. 2. 6（代）—1943. 11. 24

陈思恭 1943. 11. 24—1944. 11. 10

李坤润 1944. 11. 10—1946. 12

1947. 9. 30（代）

曹九德 1946. 5. 15 任

李克忠 1948. 8. 4—1949. 8

陈世芳 1949. 10. 15 任

副县长：李克忠 1947. 9. 5—1948. 8. 4

王 冰 1948. 8. 4—1949. 8. 26

盐池县

县长：阎志遵 1941. 10. 31（兼）—1942. 8. 22

孙 璞 1942. 8. 22（代）

1946. 5. 15—1949. 5. 9

韩孝忠 1949. 5. 9 任

聂秉和 1949. 8. 2 任

副县长：聂秉和 1947. 9. 5 任

庆阳县

县长：朱开铨 1940. 2. 10（兼）—1940. 7. 11

马锡五 1940. 7. 11 任

1948. 10. 21（代）

陆为公 1941. 5. 20（代）—1942. 6. 1（因学习免）

冯治国 1942. 6. 1（代）—1943. 1. 15

苏耀亮 1943. 1. 15（代）—1944. 11. 10

杨福祥 1944. 11. 10（代）

1946. 5. 15—1947. 6. 17（因伤免）

1948 年初—1948. 10. 11

白生彩 1947. 6. 17（代）

蔡德旺 1948. 10. 11—1949. 10

曲子县

县长：马锡五 1940. 7. 11（免）

逯同喜 1940. 10. 12（代）

1942. 1. 27（兼）——1943. 11. 24

赵耀先 1943. 11. 24—1944. 11. 10

李正林 1944. 11. 10 代

1946. 5. 15—1948. 5. 27

冯克微 1948. 5. 27（代）—1948. 8. 17（病逝）

胡礼新 1948. 8. 17（代）

副县长：胡礼新 1948. 2. 16（代）—1948. 8. 17

镇原县

- 县长：康子文 1941. 5. 20（代）
王治国 1941. 6. 15（因学习免）
王子厚 1946. 5. 15—1948. 2. 16
贾联瑞 1948. 2. 16（代）—1949. 8. 13
张彦儒 1949. 8. 13（代）
副县长：杜洪源 1946. 5. 15—1947. 7. 6（撤）
张彦儒 1949. 4. 18—1949. 8. 13

合水县

- 县长：高朗亭 1940. 2. 10—1941. 10. 21
1942. 1. 28—1942. 3. 19
王仕俊 1941. 10. 21（代）—1944. 11. 10
李正廷 1944. 11. 10（代）—1945. 12. 5
高伯祥 1945. 12. 5 任
张云山 1946. 5. 15—1948. 2. 16
胡宗彦 1948. 2. 16（代）

环 县

- 县长：陈玉山 1940. 10. 12（代）
1941. 11. 30（兼）
陈聚奎 1946. 5. 15—1948. 2. 16
赵彦杰 1948. 2. 16 任
副县长：王生弟 1946. 11. 24—1947. 9. 5
谢占儒 1948. 5. 27 任

华池县

- 县长：李丕福 1942. 1. 28（兼）—1943. 9. 30（因学习免）
白国民 1943. 9. 30（代）
李生华 1946. 5. 15—1948. 2. 16

张建堂 1948. 2. 16 (代) — 1949. 10. 10

王生弟 1949. 10. 10 任

副县长: 袁开诚 1949. 10. 10 任

旬邑县

县长: 马志昭 1948. 8. 4

文晋华 1948. 8. 4 (代) — 1948. 10. 21

李德录 1948. 10. 21 (代) — 1948. 7. 17

张效良 1949. 10. 10 任

副县长: 文晋华 1948. 6. 29 (免)

杜颜英 1948. 6. 29 任

赤水县

县长: 王振喜 1942. 1. 28 (兼) — 1947. 9. 1

白天民 1947. 9. 5 — 1948. 3. 10

田静枕 1948. 3. 10 (代) — 1949. 3. 7

副县长: 白天民 1947. 9. 5 免

潘生玺 1948. 3. 10 — 1949. 3. 9

新宁县

县长: 杨伯伦 1940. 10. 12 (兼) — 1941. 3. 14

李积成 1941. 3. 14 (代) — 1943. 11. 24

刘永培 1943. 11. 24 — 1945. 10. 20

郭进廷 1945. 10. 20 (代)

王立成 1946. 5. 15 — 1948. 6. 29

罗金财 1948. 6. 29 (代)

副县长: 王和贵 1948. 6. 29 任

淳耀县

县长: 郭存信 1940. 2. 18 以前任

封占保 1940. 2. 18 — 1943. 9. 30 (因学习免)

1945. 10. 20 (代) —1948. 4. 1

刘永培 1943. 1. 15 (代) —1943. 11. 24

李积成 1943. 11. 24 任

房文礼 1948. 4. 1 (代)

副县长: 房文礼 1944. 8. 31—1948. 4. 1

林忠保 1947. 9. 6 任

白兴武 1948. 4. 1 任

耀 县

副县长: 林忠保 1949. 11. 26 任

新正县

县 长: 郭进廷 1942. 1. 28 任

郭存信 1942. 1. 28 (代) —1944. 11. 10

郭廷藩 1944. 10. 11 (代)

1946. 5. 15—1948. 6. 29

李德录 1947. 9. 6 任

王立成 1948. 6. 29 (代)

副县长: 郭进廷 1948. 9 免

任兴田 1948. 6. 29—1949. 5. 18

中宜县 (1948 年 5 月 20 日撤销)

县 长: 李德录 1947. 9. 30 (代)

刘德政 1947. 9. 30 (代)

副县长: 刘德政 1948. 7. 17 免

三原县

县 长: 县 长: 孙一君 1948. 4. 1 (代)

白水县

县 长: 王仕俊 1941. 10. 21 (代)

薛和爽 1948. 4. 1 (代) —1949. 10. 28

高禄弟 1948. 12. 21 任

白世杰 1949. 10. 28 任

副县长：杨 震 1948. 6. 23 任

中心区（1949 年 5 月 19 日改为马栏县，9 月撤销）

县 长：刘德政 1948. 8. 17 任

副县长：张积家 1948. 8. 17 任

黄龙县

县 长：景志红 1948. 3. 7（代）——1949. 5. 20

卫青山 1949. 5. 20 任

副县长：卫青山 1949. 4. 18 任

李锦熙 1950. 2. 1 任

韩城县

县 长：段 洁 1948. 3. 7（代）——1949. 3. 7

吴沙浪 1949. 3. 7 任

副县长：孙 耀 1948. 6. 27—1949. 8. 27

合阳县

县 长：李 荣 1948. 3. 7（代）

封管书 1949. 7. 22 任

管建勋 1949. 7. 22（免）

澄城县

县 长：孟树林 1948. 3. 7（代）——1949. 3. 9

雷振东 1949. 3. 7 任

副县长：雷振东 1948. 6. 23—1949. 3. 7

吴卜亭 1949. 4. 18 任

宜川县

县 长：白彦博 1948. 3. 7（代）——1949. 5. 20

薛明斋 1949. 5. 20（代）

副县长：冯俊德 1948.6.23 任

薛明斋 1949.3.7 任

洛川县

县长：郭景龙 1948.3.7（代）—1949.5.20

李占江 1949.5.20 任

副县长：白 璋 1949.3.9 任

薛天敏 1949.11.19 任

中部县（1948年5月21日改为黄陵县）

县长：岳 嵩 1948.3.7（代）—1949.3.7

刘克荣 1949.3.7 任

副县长：刘德政 1949.9.25 任

宜君县

县长：冯德厚 1948.3.7（代）—1949.3.7

孟树林 1949.3.9 任

副县长：雷振东 1948.3.7（代）—1948.6.23

王永禄 1949.4.18 任

彬 县

县长：张效良 1947.9.30（代）

刘 岗 1949.5.20 任

于仲连 1949.10.10 任

长武县

县长：郝仲升 1948.4.26（代）

副县长：张 仁 1949.8.5 任

永寿县

县长：魏希文 1948.4.26（代）

副县长：吉长荣 1948.4.26 任

乾 县

县长：苏直 1948.4.26 任

礼泉县

县长：康子安 1948.4.26（代）

副县长：任登朝 1948.4.26—1949.9.5

麟游县

县长：王志强 1948.4.26（代）

副县长：万普安 1948.3.26（代） 1948.4.26 任

灵台县

县长：谭生成 1948.4.26（代）

神木县

县长：王殿威 1949.5.9（免）

李志科 1949.5.9 任

副县长：李向槐 1949.6.11 任

府谷县

县长：李登秀 1949.9.25 任

副县长：冯太春 1949.9.25（免）

大荔县

县长：姚一微 1949.3.7 任

副县长：刘蒲辰 1949.3.7 任

蒲城县

县长：刘国华 1949.3.7 任

朝邑县

县长：刘仲偕 1949.3.7 任

副县长：张振之 1949.3.7 任

平民县（现大荔县）

县长：冯德厚 1949.3.7 任

宝鸡县

县 长：张毅忱 1949. 5. 20—1949. 8. 16

岳 蒿 1949. 5. 20 任

副县长：江 洪 1949. 5. 20 任

萧 蓼 1949. 8. 16 任

凤翔县

县 长：史文秀 1948. 4. 26（代）—1949. 7. 28

牛履仁 1949. 10. 28 任

扶风县

县 长：高述先 1948. 4. 26（代）—1949. 5. 20

姚鹏飞 1949. 5. 20 任

副县长：姚鹏飞 1948. 4. 26—1949. 5. 20

刘治洲 1950. 1. 17 任

岐山县

县 长：张云锦 1948. 4. 26—1949. 5. 20

白元兴 1949. 5. 20 任

副县长：陈洪涛 1949. 5. 20 任

千阳县

县 长：魏建鳌 1949. 8. 15 任

陇 县

县 长：刘章天 1949. 5. 20 任

凤 县

县 长：王 笃 1949. 5. 20 任

眉 县

县 长：黑长荣 1949. 5. 20 任

渭南县

县 长：魏光波 1949. 5. 20 任

吕向晨 1949. 8. 15 免

副县长：贺修之 1949. 8. 16 免

贾景钰 1949. 11. 9 任

潼关县

县 长：屈计君 1948. 4. 1（代）

霍士杰 1949. 9. 20 任

副县长：刘仲英 1949. 8. 5 任

临潼县

县 长：吕向晨 1949. 5. 20—1949. 8. 15

白兴武 1949. 8. 26（代）

副县长：白兴武 1949. 5. 20 任

华 县

县 长：李连壁 1949. 5. 20 任

副县长：白雪亭 1949. 8. 5 任

华阴县

县 长：李 纪 1949. 5. 20 任

兰田县

县 长：梁 浮 1949. 5. 20 任

副县长：陈治安 1949. 8. 5 任

咸阳县

县 长：任庭辉 1949. 5. 20 任

张光天 1950. 1（代）

长安县

县 长：曹 扶 1946. 5. 15 任

鹿 鸣 1949. 5. 20—1949. 10. 8

张方海 1949. 10. 13 任

副县长：张一平 1950. 1. 17 任

兴平县

县 长：田静枕 1949. 5. 20 任

副县长：黄巨金 1949. 10. 13 任

武功县

县 长：张世杰 1949. 7. 22 任

副县长：马伯援 1949. 7. 22 任

周至县

县 长：张光天 1949. 5. 20 任

任庭辉 1950. 1 (代)

副县长：白维玉 1949. 10. 13 任

户 县

县 长：曾希文 1949. 5. 20 任

王国枢 1950. 1 (代)

副县长：张 振 1949. 5. 20 任

铜川县

县 长：屈计君 1949. 10. 28 (免)

潘生玺 1949. 10. 28 任

富平县

县 长：雷 荣 1949. 3. 7 任

淳化县

县 长：潘生玺 1949. 3. 7—1949. 10. 28

王金榜 1949. 10. 28 任

副县长：王金榜 1949. 3. 7—1949. 10. 28

米世英 1949. 10. 28 任

高陵县

县 长：邢子舟 1949. 6. 11—1949. 11. 26

霍如官 1949. 11. 26 任

泾阳县

县 长：花丰艳 1949. 5. 20—1949. 10. 29

屈计君 1949. 10. 28 任

副县长：王耿介 1949. 6. 11—1950. 1. 17

吕世玉 1950. 1. 17 任

同宜耀县（1941 年成立办事处，1943 年 12 月后撤销）

县 长：郭进亭 1941. 3. 14 免

霍如官 1941. 3. 14—1943. 9. 30（因学习免）

副县长：杨安仁 1941. 6. 14 任

注：①子洲县前身是绥西办事处，1944 年 1 月改为子洲县。折永年同志为绥西办事处主任，谢怀德同志先任绥西办事处主任，1944 年 1 月 1 日改任子洲县县长。

原载《历史研究》1991 年第一期

第十一章 陕甘宁边区时期政务举要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

(1939年4月4日边区政府公布)

陕甘宁边区在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领导下，本着拥护团结、坚持抗战、争取最后战胜日寇的方针，本着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的原则，根据陕甘宁边区的环境与条件，特制定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作为边区一切工作之准绳。

民族主义

一、坚持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边区人民与党派，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中国、收复一切失地而战。

二、高度的发扬边区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反对一切悲观失望、妥协投降的倾向。

三、厉行锄奸工作，提高边区人民的警觉性，彻底消灭汉奸、敌探、土匪的活动，以巩固抗日后方。

四、实现蒙、回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与汉族的平等权利，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联合蒙、回民族共同抗日。

五、尊重蒙、回民族之信仰、宗教、文化、风俗、习惯，

并扶助其文化的发展。

六、在不损害边区主权的原則下，保护一切同情中国抗战国家的人民、工商业者、教民，在边区生产、经营与文化事业方面的活动。

民权主义

七、发扬民主政治，采用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政治机构，增强人民之自治能力。

八、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与通信之自由，扶助人民抗日团体与民众武装之发展，提高人民抗战的积极性。

九、充实抗日地方武装力量，发展与健全人民抗日自卫军、抗日少先队，加紧其政治、军事、文化上的教育与训练。

十、以政治工作与组织力量的配合，实行兵役与参战的动员。

十一、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铲除鸦片赌博。

十二、实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地位，实行自愿的婚姻制度，禁止买卖婚姻与童养媳。

十三、建立便利人民的司法制度，保障人民有检举与告发任何工作人员的罪行之自由。

十四、建立工作检查制度，发扬自我批评，以增进工作的效能。

十五、实行普及免费的儿童教育，以民族精神与生活知识教育儿童，造就中华民族的优秀后代。

十六、发展民众教育，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民之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

十七、实行干部教育，培养抗战人材。

民生主义

十八、确定私人财产所有权，保护边区人民由土地改革所得之利益。

十九、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改良耕种，增加农业生产，组织春耕秋收运动。

二十、发展手工业及其他可能开办之工业，奖励商人投资，提高工业生产。

二十一、实行统一累进税，废除苛捐杂税。

二十二、保护商人自由营业，发展边区商业。

二十三、厉行有效的开源节流办法，在各机关、学校、部队中，提倡生产运动与节约运动，增加收入，减少支出，以解决战时财政经济之困难。

二十四、确定八小时工作制度，改善劳动待遇，保护工人利益，同时提高劳动热忱，增加生产效能。

二十五、优待抗日军人与工作人员家属，使抗战军人安心作战，工作人员安心工作。

二十六、废止高利贷，政府举办低利借贷，奖励合作社之发展。

二十七、保育儿童，禁止对于儿童的虐待。

二十八、抚恤老弱孤寡，救济难民灾民，不使流离失所。

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1941年5月1日中共边区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

为着进一步巩固边区，发展抗日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

达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之目的起见，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特于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举行选举之际，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总理遗嘱及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向我边区二百万人民提出如下之施政纲领，如共产党员当选为行政人员时，即将照此纲领坚决实施之。

（一）团结边区内部各社会阶级，各抗日党派，发挥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为保卫边区，保卫中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战。

（二）坚持与边区境外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的团结，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行为。

（三）提高边区武装部队战斗力，保障其物质供给，改善兵役制度及其他后方勤务的动员制度，增进军队与人民的亲密团结。

（四）加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工作，彻底实施优抗条例，务使八路军及一切友军在边区的家庭得到物质上保障与精神上安慰。

（五）本党愿与各党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六）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信仰、结社、居住、迁徙之自由权，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而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

(七) 改进司法制度，坚决废止肉刑，囊血据不重口供。对于汉奸分子，除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外，不问其过去行为女一椅，一律实行宽大政策，争取感化转变，给以政治上与生活上之出路，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对于一切阴谋破坏边区分子，例如叛徒分子、反共分子等，其处置办法仿此。

(八) 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需的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

(九) 发展农业生产，实行春耕秋收的群众动员，解决贫苦农民耕牛农具肥料种子的困难，今年开荒六十万亩，增加粮食产量四十万担，奖励外来移民。

(十) 在土地已经分配区域，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例如绥德、郃县、庆阳），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惟须减低佃农租额及债务利息，佃农则向地主缴纳一定的租额，债务人须向债主缴纳一定的利息，政府对租务关系及债务关系加以合理的调整。

(十一) 发展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保证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垄断统制，同时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扶助手工业的发展。

(十二) 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增强劳动生产率，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

(十三) 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居民中除极贫者应予免税外，均须按照财产等第或所得多寡，实施程度不同的累进税制，使大多数人民均能负担抗日常费，同时健全财政机构，调整金融关系，维护法币，巩固边币，以利经济发展与财政之充裕。

(十四) 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改善小学教员生活，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加强干部教育，推广通俗书报，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保护流亡学生与失学青年，允许在校学生以民主自治权利，实施公务人员的两小时学习制。

(十五) 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药设备，欢迎医务人材，以达减轻人民疾病之目的，同时实行救济外来的灾民难民。

(十六) 依据男女平等原则，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提高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发挥妇女在经济上的积极性，保护女工、产妇、儿童，坚持自愿的一夫一妻婚姻制。

(十七) 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十八) 欢迎海外华侨来边区求学，参加抗日工作，或兴办事业。

(十九) 给社会游民分子以耕种土地，取得职业与参加教育的机会，纠正公务人员及各业人民中对游民分子加以歧视的不良习惯，对会道门组织实行争取与团结教育的政策。

(二十) 对于在战斗中被俘之敌军及伪军官兵，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实行宽大政策，其愿参加抗战者，收容并优待之，不愿者释放之。一律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其有在释放之后又连续被俘者，不问被俘者之次数多少，一律照此办理。国内如有对八路军、新四军及任何抗日部队进行攻击者，其处置办法仿此。

(二十一) 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

化与宗教的活动。其有因革命行动被外国政府压迫而来边区者，不问其是宗主国人民或殖民地人民，边区政府当一律予以恳切的保护。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 公署组织暂行条例

(1941年11月边区二届参议会通过，1942年1月公布)

第一条 为发扬民主政治，提高行政效率起见，边区政府得划定所属二个以上的县份为一行政分区，设置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督促及指导该分区各县行政事宜。

第二条 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以下简称专员公署）之设置与命名，须经边区政府委员会议决，由边区政府以命令行之。

第三条 专员公署设专员一人，承边区政府及各厅处之命，办理下列事宜：（一）随时考察及督导所属各县地方行政规划与创办分区内各县应兴应革之事项。

（二）巩固分区地方治安，部署分区抗战工作。

（三）督察所属各县经费之收支情形。

（四）召集分区行政会议。

（五）关于所属各级公务人员之考核。

（六）关于所属各县争议及有关事项之处理。

（七）推行边区现行法令。

第四条 专员公署于必要时得设副专员一人，帮助专员办理前条所列事项。

第五条 分区行政专员及副专员，由边区政府派任，或令驻本分区军事长官兼任，或令本分区县长一人兼任。

第六条 专员公署设秘书室、民政科、财政科、教育科、建设科、粮食科、保安科，秉承正副专员之命，分别执掌各项工作。

（一）秘书室设主任秘书一人，秘书、文书、庶务、收发各一人，干事若干人，秉承主任秘书之意，分别处理各项事务。

（二）民政科、财政科、教育科、建设科、粮食科，各设科长一人，保安科长一人，干事若干人，承科长之命，分别处理各项事务。

第七条 专员公署和中心县政府在一地的，专员得兼县长，专员公署和县政府合署办公，但职权与文件，应明确划分，不得混淆。

第八条 合署办公之县政府一、二、三、四、五科，合并于专员公署民政科、财政科、教育科、建设科、粮食科，除须办理本县事务外，并秉承正副专员之命，办理公署各该管事宜。

第九条 合署办公之民选县长与派任专员如不是一人时，专员得另设秘书一人，署员二人，其他仍如上条办理。

第十条 为绥靖地方配合正规军抗战，专员有权调遣本区内保安队及地方自卫军，必要时得请调正规军协助。

第十一条 专员召开分区行政会议，得邀请该分区保安司令、县议长及驻军代表、群众代表参加。

第十二条 前条会议决议案，应呈报边区政府核准施行。

第十三条 专员应亲自轮流巡视各县，将巡视结果列入工作月报，呈报边区政府及主管机关备查。

第十四条 专员出巡时期之职务，由副专员代理，无副专员者，由公署主任秘书代理。专员或副专员出巡时，其兼任县长职权，由县秘书或科长代理。

第十五条 专员对所属各县所为之命令或处分，如认为违

法或不当时，得撤销或纠正之，但须呈报边区政府备查。

第十六条 专员公署之经费，每半年造具预决算，呈报财政厅支拨，其兼任县政府之经费，得加入公署经费内，一并计算支领。

第十七条 专员公署之关防，由边区政府制发。

第十八条 边区政府及各厅、处与分区各县，互相间之行文，以经过该管专署转达为原则，遇有紧急事情，得直接行文。

第十九条 边区政府选派巡视员，往各县巡视，不受本条例之限制。

第二十条 本条例自边区政府公布之日施行，如有未尽事宜，由边区政府核准修改之。

第二十一条 本条例由边区参议会通过，边区政府公布之。

第四节 陕甘宁边区县政府组织暂行条例

(1942年1月公布)

第一条 本条例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政治，健全县政机构，加强区乡行政领导，依据国民政府县政府组织法及适应边区实际而制定之。

第二条 边区各县政府由县参议会选举县长一人（必要时加选副县长一人），委员六人至十人，组织县政府委员会，呈请边区政府加委之。

第三条 县长、县政府委员任期二年，连选得连任，在未届期满而升调或失职者，由县参议会改选之，在县参议会休会期间，由边区政府委人代理。

第四条 县政府受边区政府之领导、县参议会之监督，综理全县行政事宜，分区各县分受各专署之领导。

第五条 县政府在县长领导下，设秘书室、一、二、三、四、五、保安六科，审计员及保安大队部；在地方法院未成立之县，设司法处，分管各项行政司法工作。

在未设五科之县，其职务由二科兼任之。

设地方法院之县，其法院组织条例另定之。

第六条 各县政府在不抵触边区政府法规下，得颁发单行法规，但须呈边区政府核准。

第七条 下列事项须经各县政府委员会决议行之。

(一) 县政府各部门的工作计划。

(二) 边区政府及主管机关令行各事项。

(三) 县参议会决议事项。

(四) 县财政收支及县财政经费预算决算等事项。

(五) 任免所属政务人员事项。

(六) 决定县单行法规事项。

(七) 全县应兴应革之重要事项。

(八) 其他县政府委员会认为应讨论事项。

第八条 县政府委员会每二周开会一次，有必要时得开临时会议，县政府开会，以县长为主席。

第九条 为着执行决议，督促与检查工作，县长每周至少须召集各科长、处长会议一次。

第十条 县长出巡或请假时，由科长（或副县长）代理职务，并须呈边区政府。

第十一条 县政府各科室会之职权如下：

(一) 秘书室掌理拟缮文件，印信、档案、会计、庶务、收发及不属各科事项。

(二) 第一科掌理选举、抗战动员、干部管理、土地行政、劳资、租佃、卫生行政、儿童保护、户籍区划，优抗救济、破

除迷信、改革陋习及其他民政事项。

(三) 第二科掌理财政退以、地方税收、公产及其他事项。

(四) 第三科掌理教育行政、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民教馆、图书馆、公园、古迹、编修县志及其他文化建设事项。

(五) 第四科掌理农、牧、工、矿、水利、森林、道路、合作社、生产运动、社会经济调查及其他经济建设事项。

(六) 第五科掌理粮食之收支、仓库管理、调查民食等事项。

(七) 审计员专司审核县区征粮及金库收支，公产收入及县经费预算等事项。

(八) 保安科掌理锄奸、缉匪、检查站、放哨、维持公共安宁秩序之警务事项。

(九) 保安大队部受县长领导、保安司令部指挥，掌理绥靖地方及自卫军、少先队之编制领导事项。

(十) 司法处受理各项民刑案件，在县长领导下进行审判。

第十二条 县政府得依边区政府及主管机关之命令及工作需要，设立各种性质之委员会。

第十三条 县政府设秘书、科长、审计员、司法处处长各一人，必要时得设立助理秘书及副科长，须报告各主管机关提请边区政府任免，或由各主管机关提请边区政府任免之。

第十四条 县政府秘书设文书、收发一人至三人，各科设科员一人至五人，司法处设审判员兼检查员一人，书记员一人或二人，看守所所长一人，均由县政府决定，呈报民政厅及主管厅处备案。

第十五条 县政府得召集区乡长联席会议，讨论本县行政事宜。

第十六条 县政府各种委员会，视其任务及其性质，必要

时得聘请当地党军及民众团体士绅参加之。

第十七条 县政府按月向边区政府及各厅处做报告一次。

第十八条 县政府应每半年向财政厅做行政经费开支及财政收支报告各一次。

第十九条 县政府之印信，由边区政府制发。

第二十条 县政府各项办事细则另定之。

第二十一条 本条例适用于等于县之市。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经边区参议会通过，由边区政府公布施行之。

第五节 陕甘宁边区各县区公署组织暂时行条例

(1942年1月公布)

第一条 本条例为增强县政机构而制定之。

第二条 各县视县境形势及需要，得划分为若干区，各区应就区内适中或交通便利之地点定为区公署所在地。

第三条 各区所辖面积至多不得超过纵横百里，辖乡至少三乡，至多五乡。

第四条 区公署名称应冠以数字或方位字样，由县政府呈请民政厅刊发铃记。

第五条 区公署设区长一人，承县长及一、二、三、四、五、保安等科及司法处、保安大队长之命，办理下列事项：

(一) 关于传达上级指示、命令、法令及反映政情等事项。

(二) 关于计划督导所墨守成规各乡民政、财政、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及应兴应革事项。

(三) 关于组织训练自卫军，进行全区锄奸保安事项。

第六条 区公署得设区助理员三人至五人，承区长之命，

呈请民政厅核准任命之。

第七条 区长之任用由县长遴选，经县政府委员会通过，呈请民政厅核准任命之。

第八条 区助理员由县长任命之，呈请民政厅备案。

第九条 区设自卫军营长一人，由县长与保安大队长遴选，经县政府委员会通过，呈请边区保安司令部核准任命之，但自卫军营长应受县保安大队长之指挥，区长之领导。

第十条 区长除综理全区政务外，须经常巡视各乡市行政工作，出巡时其职务由区长指定一助理员代理之。

第十一条 区助理员应经常分工，经常分赴各乡帮助各乡市工作。

第十二条 区公署应组织署务会议，讨论本署及各乡市工作。

第十三条 署务会议应由区长、助理员及自卫军营长组织之。人数可三人至五人，区长为当然主席，必要时请各群众团体负责人参加。

第十四条 署务会议半月召开一次，必要时可以临时召开。

第十五条 区公署认为必要时，得召集该区乡市联席会议，讨论全区工作之进行，并得视会议之性质，召集各乡市委员会主任及民众团体代表参加。

第十六条 区公署应建立本身经常工作，并按月向县政府作工作报告。

第十七条 区公署办事细则另定之。

第十八条 本条例由边区参议会通过，边区政府公布施行。

第六节 陕甘宁边区各乡市政府组织暂行条例

(1942年1月公布)

第一条 本条例为健全边区乡市（等于乡或等于区的市，下同）机构，奠定民主政治基础而制定之。

第二条 乡市政府区域规定如下：

（一）甲等乡纵横不逾十里，人口至多不得逾一千五百人。

（二）乙等乡纵横不逾二十里，人口至多不得逾一千人。

（三）丙等乡纵横不逾三十里，人口至多不得逾一千人。

第三条 乡市政府应选择本乡市适中地点设立之。

第四条 乡市议会为乡市政权最高机关，乡市议会休会时，乡市政府委员会为乡市政权最高机关。乡市长、乡市政府委员由乡市议会选举之。

第五条 乡市议会一年改选一次，乡市长及政府委员同时改选，但连选得连任（乡市长当选后须呈请县政府委任之）。

第六条 在末届改选期间，乡市长及政府各委员如违法失职，乡市议会随时可以将其罢免，或县政府将其撤免，令行该乡市议会改选。

第七条 乡市政府之印信，由县政府统一制发。

第八条 乡市议会开会，乡市长应准备议案报告工作，乡市政府委员会每半月应开会一次。

第九条 乡市政府除乡市长一人、文书一人脱离生产外，其他都不脱离生产，但议会开会、政府委员会开会吃饭费用，得设法筹集之，但须在议会通过，并报告上级政府备查。

第十条 乡市政府管辖下设行政村（或南关，北关……），行政村下设自然村（或坊、甲），行政村（或南关，北关……）

设村主任一人，自然村（或坊、甲）设村长（或坊长、甲长）一人，均由选民大会选举之。

第十一条 行政村（或南关、北关……）主任，自然村（或坊、甲）村长（或坊长，甲长）每半年改选一次。

第十二条 乡市政府为工作需要，设有下列各会。

（一）优待救济委员会。

（二）文化促进委员会。

（三）经济建设委员会。

（四）锄奸委员会。

（五）卫生保育委员会。

（六）人民仲裁委员会。

第十三条 乡市政府必要时，得设其他各种性质之临时委员会。

第十四条 各委员会由三人至五人组织之，委员与主任委员，均由乡市政府聘任之。

第十五条 乡市政府之各委员会及自卫军、少先队、儿童团等组织条例另行制定。

第十六条 乡市政府工作细则另定之。

第十七条 本条例经边区参议会通过，由边区政府公布施行之。

第七节 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纲领（草案）

（1942年9月1日边府政务会议通过）

一、统一，少而精，提高效率，是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的全部意义。

必须把边区范围内的行政、地方武装、财政等完全统一于

边区政府的领导，才能保证思想行动之更能一致与有效。必须组织简单，脱离生产的成员减少，才能保证不甚富庶的边区能够供给长期抗战以人力物力而不致匮乏。必须人尽其力，物尽其用，提高每个政军人员的战斗力与工作力，不使有任何物质的浪费，才能充实力量，准备反攻。

边区政府对于精兵简政的整编已进行了两次，一次有一次的进步，然而应该承认离客观需要之精和简还远。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对精兵简政和巩固根据地准备反攻之不可分离的意义认识与宣传不够；和精简不相容的本位主义、太平观念、粗枝大叶工作方式没有完全克服；只强调缩编，没提出精简工作的全部纲领。因此，特提出下列决定。

二、脱离生产的部队应不超过全边区人民总数百分之二，脱离生产的政民工作人员，应不超过全边区人民总数百分之一。

三、关于精兵：

（一）淘汰老弱。

（二）确定枪兵比例。

（三）统一与充实编制——领导机关统一，减少团营番号，充实团营人数，减少直属单位。

（四）加强作战教育。

（五）加强政治教育——发扬官兵一致、兵民一致、严守纪律的优良传统；尊重政权，遵守法令，帮助民众，做民众的模范。

（六）军队供给，政府暂时至少保证十分之七，军队从事工农业自给十分之三，要逐渐做到全部由政府供给。

精兵的详细办法已经整军委员会拟定与执行，政府须帮助促其实现。

四、关于简政：

（一）精干上层，充实下层。上层领导多于实做，人不在多，在能掌握政策与领导下层去做，下层实做多于领导，人员应提高也应充实（足够的意思不是多余）。

（二）紧缩机构，精选人员。由大化小，如局改科等。同性质的机关、学校合并，一地或一系统下不应有类似的组织；不必要的机关裁撤；不够格的机关、学校及学生，或合并或清洗，一个人能做的事，不许用二人；相反，要提倡一人能做几人的事；要每人有事做，有足够的事做。

（三）确定职责，建立制度。专署、县政府、区乡政府的职权与责任，边府各厅处院的职权与责任，他们的上下间彼此间的关系，都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给以明文规定。现在有的因职权不定因而推诿或不负责，有的又越权——瞒上不瞒下；有的相互间发生不满，这都是妨碍工作创造与推行的现象，必须终止。

（四）办事迅速，减少文牍。边府各厅处合署办公，专署县府合室办公，区乡政府要有办公地点，经常有人办公。一天能做完的，不许拖到两天，主管人员要经常考核。少发文件，一件工作不是文件一发就了事，而要注意工作的实际做好。乱发命令，不顾实际，检查很少，有头无尾的作风，要一扫干净。

（五）学习业务，工作专门。政权工作是细密的，我们必须有具备新的政治常识、新的政权经验而能胜任愉快的人才，这样的人才不是现成有而需要创造，我们已创造了一些，但异常不够。应该厉行做什么学什么的作风，不轻易调动干部，俾能专精其业。干部配备要适宜，不要用非所学。边府既已开始这样做，应即成为定规，一革从前不调查研究，切断历史，以感想当政策的毛病。

应该把培养和配备干部看做是政权的基本任务。

(六) 养成法治，厉行民治。法令不轻颁布，一经颁布，必严格遵守，不要朝令夕改，不要自己忘记。尊重议会，时时听取人民呼声，养成民主作风，各阶级各党派人士融成一片。

(七) 军事第一，对军负责。筹措军费是第一等事；优待抗属，须深入检查做出新的决定；优待残废，给工作，给抚恤，给教育，帮助生产，使各得其所；尊重军人，尊敬和保障军队；厉行兵役，归队运动，扩兵运动。政府实际负责，加强民兵，平时战时均能与正规军配合。各级政府不把军队看做自己的事，忽视帮助军队的，应受到批评与责罚。

(八) 统筹统支，经营一致。财政经济的分散经营，是不得已的办法，现必厉行统一，必避免浪费和其他弊端。各部分实行预决算制度，不得浮报，自营收入须实报出来。除自营工业、农业外，公营商业要统一。又，凡从事生产人员的生活不得开支公款。

(九) 负担合理，节省开支，从速制定农业累进税以代替救国公粮的临时办法，改良动员法，化零的负担为整的负担。制定粮食、被服、马匹、建筑、什支各项节省办法，组织各级节省委员会，务求无微不入。

(十) 实行奖惩，俸以养廉。不执行命令，违反民意，消极怠工，有过的必罚；能完成任务，关心民疾，创出办法，有功的必赏。要经常检查，发现各级人员的功和过。同时要保证各级人员的个人与家庭的最低生活，逐渐由供给制进到薪俸制。

五、政府、军队、民众团体的关系须有明文规定。

军队是政权的一部分，他和政权须保持正确的关系。民众团体要建立真实的民众基础，在不违反政府法令下独立进行工作，其经费由政府给以补助。

六、编整委员会不能包括全部精简工作，应另设整政整军

以至整财等等委员会，分别进行工作。

各委员会的实际办事机关，编委会为民政厅，整政会为边府秘书处，其他类推。

各分区县市的政府系统，各司令部师旅团的军事系统，均应设立整编或整军的委员会，使精简工作做到上下一致。

七、边府要把精兵简政意义和实施办法，经过报纸，经过各级政军的宣传机关，经过各种会议，广为解释宣传，使大众懂得，起来拥护，然后精简才能彻底。

精兵简政不是一次能完全做好的，要从实践中和不断研究中改进。现只是精兵简政工作的突击，不能以暂时做做就完事。

八、编余人员应好好安插、救济或帮助其从事生产，反对不管的恶习。

九、边区参议会议员小组代表会以前，努力进行精简工作，即整政整军整财……等工作。议员小组代表会议开会时，即检查精简工作，并选出点验委员会点验军队。

第八节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功臣油矿” ——延长油矿

1904年10月，陕西巡抚曹鸿勋奏请试办“延长石油官厂”，获清政府批准。随后清政府拨白银8.1万两为开办费，并指定后补知县洪寅为“总办”，于1905年筹办“延长石油官厂”。洪寅订购机器，找日本技师阿部正治郎到陕北延长烟雾沟等地勘查油苗，发现人工开凿产油井与油苗多处，并取油样送到汉口进行化验，证明油质“胜于东洋，能敌美产”。乃于日本订立合同，采购日本钻采机械设备，聘请日本技师、工匠开采延长油矿。

1907年2月，日本技师佐藤弥市郎一行七人及第一批机器到达延长。佐藤在延长县城西门外勘定延1井—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6月5日（农历4月25日）开钻，至9月6日，钻达68.89米见油，日产油150~200公斤。接着又加深至81米处完钻，初期日产油1~1.5吨。此延长石油官厂第一口油井成功。

延1井出油后，用小铜釜试验提炼，每日可得灯油25斤，经试用“烟微光白，不逊外油”。9月20日，炼油房竣工，当月装灯油14箱，运往省城，是为延长油矿油品外销之始。10年后，延1井日产仍保持1.25吨，至1934年，累计产原油2550吨。

1911年“延长石油官厂”又陆续开凿3口井，其中2号井日产油105公斤，3号井见少量原油，4号井是干井。延长石油官厂期间共钻井4口，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中华民国成立，延长石油官厂的“厂事”也就无人过问了。但延1井的钻探成功，却是中国近代石油史上的重大事件。

1923—1933年当时农商部所属地质调查所的王竹泉、潘钟祥等人，先后五次赴陕北进行石油地质调查。新发现陕北石油地质为侏罗系上统，同时，对延长等油田的储油层进行划分，定为延长、永坪、肤施三个主要储油层段；得出了永坪油田前景较好以及在延长油田可多钻浅井，进行小规模开采的结论。地质调查所还派颜惠敏到陕北测绘了1:30000的陕北油矿区地形图，其范围北自苏家河，南迄朱家腰，西到张家渠、黑家铺、金沙镇，东至张家滩、延水两岸，均绘入图内。王竹泉和潘钟祥几次调查陕北油田，在工作中，他们还完成了新测延长附近1:500的钻井分布图一幅。写成《陕北油田地质》一文，刊于《地质汇报》第20号（1933年出版）。

1934年，陕北油矿探勘处成立，先后共钻井七口。这些井

的井位，大都是根据王竹泉、潘钟祥等所提供的地质资料确定的。这七口井有四口井在延长，井号分别为 101、102、103、104。101 井井深 101 米处遇旺油，初期日产油 1.5 吨，后减为 105 公斤。102 井井深 149 米，103 井井深 117 米，104 井井深 88 米，每日产油二、三十公斤至五十公斤不等。另三口井在永坪，井号为 201、202、203。201 井井深 104 米，初期日产油三千公斤，202 井有油气显示，203 井井深 113 米，每日可产油五十公斤。永坪地下有油，由此得到证实。

1935 年，中国工农红军解放了延长油矿，迎来了新的发展。

1938 年 2 月，陈振夏、胡华钦、王凯来延长油矿了解生产情况，收集设备器材，健全机构组织，勘测地形井位，制定开采计划，积极恢复和扩大生产。1938 年在永坪加深了一口井，日产原油 200 ~ 250 公斤。又在延长烟雾沟加深延 18 井，由于出水大而未成。1940 年春，开始钻延 19 井，完井后，日产油 1.6 吨。

1940 年冬，中央军委后勤部军工局派汪鹏到延长油矿进行地质勘查工作。汪鹏又名汪家宝，安徽怀宁人，1937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地学系地质组，“七·七”事变后，为了抗日救亡，毅然到了延安。他被派到延长油矿后，由于资料缺乏，便走访老工人，召开座谈会，搜集和了解延长周围 20 多口老井的情况，并到野外进行实地调查。当时他所用的工具，只有一卷皮尺、一块罗盘，一个手持水准仪，一张质量粗劣的 1:50000 的地形图。汪鹏靠着皮尺和手持水准仪，一边测制地形图，一边利用罗盘，在有基岩出露的黄土沟里量岩层的产状，有时在一条沟里就要量几百个甚至上千个点，并把这些岩层产状准确地表示在地形图上。

通过地质测量，认识到延长一带是一个向西倾斜的单斜构

造。它的倾角非常平缓，一般不过二、三度。在这个平缓单斜构造上，过去已钻了不少井。由于过去钻井开采工艺技术落后，油井管理不善，油层和水层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因此，油井出油甚微。汪鹏在勘查范围内，终于在延长西南七里村一带找到了一个新的储油构造，这个构造位于七里村河沟两侧，岩层的倾斜角一般为五、六度，有的达七、八度，为一鼻状构造，是一个没有钻井过的“处女地”。估计地下油、水关系还保持着相对平衡状态，有产旺油的可能。于是，汪鹏在七里村定了5个井位。其中在鼻状构造北翼定的第一口探井一七-1井于1941年秋，在井深35.35米和79.46米分别钻遇油层，原油自井底喷出地面。1943年7月，用套管封水，加深钻至86.3米发生井喷，初日产油量达96.3吨，创历史最高纪录，连喷9日，一个月后日抽油仍达15.9吨。以后又陆续钻七-2、七-3、七-4、七-5井。其中1943年5月钻成，1944年加深的七-3井，也是一口自喷井，初日产油11.6吨。

由于新井出油，延长石油厂的原油产量增加了好几倍。1943年产油1279吨，相当于1935年以前14年石油产量的总和。由于石油产量的增加，炼油量也由过去三天炼一锅改为一天炼一锅，月炼油产量由2700小桶提高到15000小桶。

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里，延长石油厂共生产原油3155吨，经加工生产汽油163.94吨、煤油1512.33吨、蜡烛5760箱，以及擦枪油、凡士林、油墨、黄油等。党中央、边区政府各机关、学校、部队、团体的照明用油，军委的电台用油和八路军后方兵站的运输用油，都得到了充分的保证，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因此，延长油矿被誉为“功臣油矿”。毛泽东主席于1944年5月，为获得边区特等劳动模范的油矿矿长陈振夏题词“埋头苦干”予以鼓励。汪鹏调回军工局后，佟诚任油厂七

里村分厂副主任。佟诚于1945年5~9月对延河及小拐沟长约10公里、烟雾沟长约20余公里地区进行了测绘。写出了《延长石油地质概论》、《对于延长附近旧井位置的评论》和《确定井口位置的说明》，为延长油田的开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佟诚所定的七11井、七12井、七14井和延20井、延21井、延22井等井位，除延20井有数层稠油难生产以外，其余各井均产旺油或有较好的油流。

1947年3月，国民党军占领延安，延长石油厂暂时停产。

1948年4月，恢复生产，完成了七14井，新打成七16井、七17井、七18井、七19井，加深了七13井。首次试用盐酸处理七11井，增产1.5倍；使用炸药爆炸七17井、七3井、七13井、七11井，增产1~4倍，开创了全国油层改造措施之先河。1949年，全年产油820吨。

自1907年钻成第一口油井，至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的42年间，石油勘探与开采活动，主要集中在陕北“三延”地区，共钻井52口，进尺12994米，发现了延长油田（1907）和永坪油田（1934），计算地质储量169万吨，累计产油6155吨。

新中国成立后，延长油矿为玉门、新疆、大庆、长庆等油田输送了1200多名管理和技术人才，有力地支援了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延长油矿摸索出一套适应陕北油田特点的开采方法，使油矿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一方面，实施了以延安为轴心的东扩、西进、南下、北上的大勘探战略，每年新增地质储量都在5000万吨以上，先后发现了12个油田，探明地质储量在全国排名上升到第10位。另一方面，依靠科技攻关，推广应用注水开发、物化探、定向斜井、水平井等先进技术，使油田采收率由10%提高到26%以上，破解了特低渗油田开采

的世界级难题。到 2004 年底，延长油矿建矿 100 周年，共建成生产油井 22700 余口，年生产原油 720 万吨，实现销售收入 320 亿元，上缴税费 43.7 亿元，实现利润 56.5 亿元，成为黄土高原上耀眼的“明珠”。

目前延长石油在陕西、内蒙古、甘肃、宁夏等 10 个省区登记油气勘查资源面积 10.76 万平方公里。截至 2004 年底，原延长油矿管理局本部累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 5.88 亿吨，排名全国油田拥有储量第 10 位，油田开发迈上大台阶。2005 年 9 月，省委、省政府按照股份制改造的方向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决定将省延长石油工业集团公司与延安、榆林两市的 14 个钻采公司进行紧密型重组和整合，组建了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延长油矿管理局），标志着陕北石油资源开发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重组后的延长石油，总资产近 400 亿元，从业人员 5 万余人，年税利将达百亿元，成为国内具有石油勘探开发资质的 4 家大型国有石油企业之一。

第十二章 中共中央在延安 十三年大事记

(一九三五年十月——一九四八年三月)

第一节 一九三五年

10月19日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起县）。

10月21日 红军在吴起镇消灭尾追的国民党军队一个骑兵团，击溃了三个团。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切尾巴”的一仗。

10月下旬 中共中央在甘泉县下寺湾纠正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因受王明“左”倾错误影响所进行的错误“肃反”。随后释放了刘志丹等一大批被迫害而遭拒捕的党政军干部。

10月13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号召全国一切愿意抗日的政党、武装部队等联合起来，进行抗日反蒋斗争。

10月21日——23日 直罗镇战役，歼灭东北军一个师又一个团，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给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0月25日 《红色中华》报复刊。副刊号刊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对红中社记者的谈话，题为《毛泽东同志斥蒋介石荒唐无耻的卖国辩》，揭露蒋介石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上的所谓对外方针的演说，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辩护。

11月28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抗日救国宣言》，提出了十大纲领，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抗日反蒋斗争。

11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成立，博古（秦邦宪）任主席。西北办事处有内务部、外交部、土地部、国民经济部、财政部、劳动部、粮食部、教育部、司法部、工农检查局和政治保卫局等机构。

12月处 中共中央移驻瓦窑堡（今子长县）。

12月6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

12月8日 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联合发表《告陕甘苏区劳苦群众书》。

12月2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12月25日 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12月27日 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从理论上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作了深刻的论述，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

第二节 一九三六年

1月15日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发布《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锡山的命令》。

1月17日 刘少奇离开瓦窑堡，经临潼去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

1月下旬 中共中央成立以周恩来、张浩为正副书记的白区工作委员会，加强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

1月25日 毛泽东、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等红军将领发出致东北军将士书，愿同东北军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2月20日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从延水关至河口一线渡过黄河，进行东征。4月9日 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就联合抗日问题进行会谈。5月5日 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停战议和一致》看给的通电。5月14日 红军在延川太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东征，部署西征。

6月处 红军西进甘肃、宁夏，解放了陕甘宁三省交界的十多个县的广大地区，巩固和扩大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6月21日 中共中央离开瓦窑堡，7月3日进驻保安（今志丹县）。7月16日 毛泽东在保安接见美国记者斯诺，对未来的中日战争形势和中共的抗日方针、政策等问题发表了谈话。8月3日 中共中央、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发表《关于土地政策几个问题的答复》。对土地政策中的六个具体问题作了规定。

8月13日 毛泽东致信杨虎城、杜斌丞，并派张文彬前往协商建立联合战线的问题。

8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建立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坚固的统一战线。这个文件是毛泽东起草的。

9月1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决定放弃“抗日反蒋”的口号，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

9月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为了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决定将“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

10月5日 毛泽东、周恩来写信给张学良，提出只要国民党军队不向红军进攻，“我们首先停止对国民党军队的攻击”。并请张学良转告蒋介石即速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

10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出《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11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决定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进行根本改造，共青团员参加到合法的和公开的青年群众组织中去，并大批地吸收共青团员加入中国共产党。

12月7日 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组成统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中革军委主席。抗日战争开始后，改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

12月12日 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应张学良、杨虎城电邀，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去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周恩来、博古等于15日离开保安，17日经延安乘飞机到达西安。18日，红军进驻延安城。

12月19日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发出对西安事变的通电。同日，中共中央对党内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12月24日——27日24日 经过我党及张杨与蒋方代表的谈判，使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

25日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2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

12月 毛泽东在红军大学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人民战争的思想和战略方面的诸问题。

第三节 一九三七年

1月13日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城。从此，延安成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指导中心和总后方。

1月29日 《红色中华报》改为《新中华报》，社长为向仲华。

2月10日 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12日，以此为原则，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就国共合作的具体问题进行谈判。3月中旬周恩来回延安向中央汇报谈判情况。

3月下旬 周恩来离开延安去杭州与蒋介石直接进行谈判；

4月2日 周恩来乘飞机返回延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彭德怀、林伯渠、肖劲光等前往延安机场迎接。

3月27日—31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错误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为进行批评。

31日 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5月2日—14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苏区代表会议，毛泽东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刘少奇作了《争取全国民主统一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发言。接着，还召开了党的白区代表会议。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张闻天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

5月25日 周恩来、林伯渠携带中共方面起草的《国共合作抗日救国共同纲领草案》离延安去洛阳同蒋介石进行谈判。在此之前，周恩来与张云逸、孔石泉等同志去西安时，曾在延安以南的劳山（鸠燕山）遭到武装匪徒的袭击。

5月 国共谈判期间，国民党派中央考察团（又名西安考察团）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进行考察。考察团到延安后，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的接见，中共中央派叶剑英、陈赓陪同考察。

6月16日 周恩来由庐山返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谈判情况。

25日 中共中央重新拟定与国民党谈判方案。

7月8日 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芦沟桥发表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紧急动员起来，抵抗日寇的侵略。

7月15日 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宣言提出了团结抗日、实行政治民主为国共合作的基本纲领。

7月17日 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到庐山与蒋介石、邵力子、张冲继续谈判。

7月—8月 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哲学课，撰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其中的两节。

8月9日 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南京出席国民党召开的国防会议。在此期间，继续同蒋介石谈判红军改编问题。

19日 蒋介石被迫同意中共方面关于红军改编的意见。此后周恩来、朱德返回陕北。

8月22日——25日 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作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8月25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共三万多人，编为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9月，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

8月底9月初 八路军自渭北出发，开赴抗日前线。

9月6日 根据国共协议，中共中央将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

9月21日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作《关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

9月25日 毛泽东给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发出电报，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张闻天在延安党韵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教训

与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的结论。王明（陈绍禹）、康生等由苏联乘飞机经由新疆回到延安。12月9日—14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会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反对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未能形成决议。

第四节 一九三八年

2月2日 毛泽东答《新中华报》记者问，批驳所谓“一党专政”的谬论。

2月27日—3月1日 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抗战形势与军事战略问题。会上，王明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会后，王明去武汉，任弼时去莫斯科。王明到武汉后违犯党的组织原则，将自己的讲话以《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为题公开发表，把右倾投降主义冒充中央的路线而大肆宣传。

3月15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

4月初 毛泽东在凤凰山麓接见白求恩大夫。

4月18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4月20日 毛泽东给彭真、聂荣臻等发出关于巩固和扩大晋察冀根据地的指示电。

4月21日 毛泽东等给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等发出关于平原游击战的指示电。

5月4日 毛泽东给项英发出关于新四军进行游击战的指示电。

5月14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新四军的行动方针给长江

局，东南局及项英发出指示电。

5月15日 毛泽东主持起草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留守处布告》正式公布。

5月22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

5月 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

9月14日 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认为抗战以来，中共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在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

9月29日——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桥儿沟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批准了中央政治局的路线，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文件。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这次会议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

第五节 一九三九年

中共中央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出席大会并发表讲话，提出“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口号。李富春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动员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河北等地摩擦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延安青年集会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毛泽东在会上作《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电。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投降问题的报告。6月18日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

7月7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渔口号。

7月 刘少奇应张同天的邀请，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讲演。讲稿经过整理后在延安《解放》周刊上发表。

7月 周恩采由杨家岭去中央党校礼堂参加会议时，因坐骑受惊，摔伤右臂，后去苏联医治。

8月7日 中央军委致电八路军总部和一二〇师：为巩固陕甘宁边区和加强河防，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我之戒备兵力应有必要的调动。根据此命令，王震率三五九旅由恒山地区返回陕北，驻防绥德警备区。

8月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为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整顿，巩固党的工作制定了方针政策。

10月4日 毛泽东为党内刊物《共产党人》写发刊词，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

12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

12月22日 就国民党军队进犯边区宁县、镇原等县，肖劲光致电蒋介石等。朱德、彭德怀等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从12月至1940年3月，解放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顽固

第六节 一九四〇年

1月4日—12日 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

会，毛泽东亲临大会并作了《新民主主义论》的讲演。这个讲演最先发表在《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上。

2月1日 延安民众举行讨汪大会，毛泽东到会作了《团结一切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讲演。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的通电。

3月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指出抗日民主政权必须实行“三三制”的原则。

3月11日 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阐述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和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方针和原则。

3月26日 周恩来、任弼时等从莫斯科回到延安。

5月4日 中共中央给东南局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

5月中旬 周恩来离开延安去重庆，途经西安时会见了从抗日前线回来的朱德总司令。

5月26日 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茅盾等也同车到延安。

7月7日 抗战三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7月24日 周恩来由重庆返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国民党提交的《中央提示案》问题。8月25日又由延安飞往重庆，就我党提出的调整游击区域及游击队等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7月 任弼时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

9月26日 《新中华报》发表朱德的《扩张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从

8月20日到12月5日 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

了百团大战 10 月 13 日《新中华报》发表朱德写的《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的代论，提出了开展纺毛运动的号召。这年秋。他还亲自踏勘南泥湾，提出了“屯垦政策”。

12 月 25 日 中共中央对党内发出《论政策》的指示。

12 月 30 日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首次播音。

第七节 一九四一年

1 月 8 日 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发表谈话。18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20 日，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3 月 18 日 中共中央发出《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的指示。

5 月 1 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5 月 8 日 延安《新中华报》发表陈云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

5 月 16 日 《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

5 月 19 日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

7 月 1 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8 月 1 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9 月 10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和总结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

9 月 26 日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历史经验，克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错误

思想。中央学习组是8月间成立的，其成员以中央委员为范围，组长毛泽东，副组长王稼祥11月21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发表演说。

11月底 刘少奇从苏北阜宁回到延安。

12月9日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宣言》。

12月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中央党校计划》的决定。中央党校进行改组，对学员条件，学习时间和内容进行改革。

12月 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六大以来》正式出版。此书收入1928年6月至1941年11月党的重要历史文献557篇。

第八节 一九四二年

1月26日 张闻天等出发到绥德、米脂、神府及晋西北进行农村调查。1943年3月3日返回延安。并向中央写了《出发归来记》的报告。

1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

2月1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会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

2月8日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

2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与《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决定》。

3月31日 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集座谈会，座谈《解放日报》改版问题。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宣布从即日起，报纸版面彻底改革。使之“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

机关报”。

4月3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

5月2日——23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毛泽东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6月2日为指导整风运动的开展，中共中央成立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总学习委员会。在此前后，延安各系统、各单位也建立了学习委员会。

6月8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整风运动在全党开展。

9月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

10月9日 刘少奇《论党内斗争》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在按语中指出：“刘少奇同志1941年7月2日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作的这个演讲，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

10月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辑的《六大以前》出版。此书收入1921年3月至1928年6月党的历史文献197篇。

10月19日—1943年1月14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和总结西北党和红军的历史问题；对边区政府工作存在的主要倾向以及经济建设等问题也进行了讨论。会议期间，毛泽东、任弼时等在会上作了报告。

第九节 一九四三年

2月2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

3月20日 中共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整风学习总结计

划》。

3月20日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增补刘少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4月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提出进行一次普遍的审干运动。

5月26日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

6月1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

6月28日 周恩来等一百多人乘五辆汽车离开重庆，于7月中旬抵达延安。

7月8日 《解放日报》发表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第一次明确提出和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

7月9日 延安各界群众举行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12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了《质问国民党》的社论。在解放区人民强烈抗议和全国进步人士及国际舆论的反对下，国民党顽固派被迫停止第三次反共高潮。

8月15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了审干的九条方针，纠正了“逼、供、信”和反特扩大化的错误。

9月 毛泽东、任弼时、彭德怀等到南泥湾视察三五九旅屯垦情况，高度赞扬指战员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

10月10日 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整风运动进入总结提高阶段。

11月 中央党校大礼堂落成。礼堂建筑期间毛泽东写了

“实事求是”的题字，镌刻在礼堂正面的墙上。

11月29日 中共中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招待出席边区劳动英雄大会的全体代表。毛泽东在招待会上作了《组织起来》的讲话。

第十节 一九四四年

3月3日—4日 周恩来在中央党校作《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

4月12日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的报告。报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关于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应采取何种态度等几个问题的结论。

6月12日 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小舞厅接见中外记者参观团，并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

6月22日 叶剑英在王家坪军委礼堂对中外记者参观团作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

7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8月8日 新华社英文广播开始试播。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新华社成立了英文广播部。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指示，帮助新华社进行英播部的创建工作。

10月10日 周恩来在延安双十节庆祝大会上作题为《如何解决》的讲演，阐述了中共中央对抗战形势、国共关系等问题的主张。

11日 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评蒋介石双十节的演说》的评论。11月初 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组成南下支队，以王震为司令员，首道为政委，向豫鄂湘粤敌后挺进，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11月8日—9日 毛泽东同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在枣园进行了会谈，签署了关于同国民党成立联合政府等五点协议草案。

10日 周恩来同赫尔利一起离延安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中共的五点建议被蒋介石无理拒绝。

11月 陈毅、聂荣臻、刘伯承等先后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

12月4日 陕甘宁边区二届二次参议会开幕。会上，毛泽东作了《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讲话。12月8日毛泽东在枣园会见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原则立场。会见时周恩来在座。周恩来同包瑞德是12月7日由重庆乘机回到延安的。

12月8日 毛泽东在枣园会见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原则立场。会见时周恩来在座。周恩来同包瑞德是12月7日由重庆乘机回到延安的。

第十一节 一九四五年

1月10日 毛泽东在边区劳模会上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讲话。

1月24日 周恩来离延安去重庆，继续谈判成立联合政府问题。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谈判无结果，于2月16日返回延安。

4月20日 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是从1944年5月21日开始举行的。

4月23日—6月11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延安举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分别向大会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制定了党的路线，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6月19日 中共中央举行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

8月10日—11日 延安总部发表一至七号反攻命令。命令是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以朱德总司令名义发布的。

8月13日 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坚决拒绝其错误命令。同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

8月15日 日本裕仁天皇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胜利结束。

8月25日 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方针。

8月26日 党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8月28日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离开延安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在毛泽东离延期间，中共中央决定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职务。

9月15日 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建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央东北局，并决定组织派遣二万名干部和十万主力部队挺进东北，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16日，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等离开延安去东北。

9月19日 中共中央发出刘少奇起草的《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的指示。

10月10日 国共两党在重庆经过四十三天的谈判，谈判结果双方代表签订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十二条。

10月11日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后回到延安，周恩来、王若飞留在重庆继续谈判。

10月17日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

11月4日 朱德向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发出抗议书，抗议美军参加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武装干涉中国内政。

11月15日 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国民党进攻的真相》的谈话。

11月20日 中共中央发出刘少奇起草的关于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根据地给东北局的电报。

11月25日 周恩来由重庆回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

11月30日 朱德会见来延安访问的美法记者，阐明中共对东北问题的态度。

12月16日 周恩来、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离延安去重庆，准备出席政治协商会议。

12月28日 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给东北局的电报。电报指示把东北的工作重心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乡村，“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第十二节 一九四六年

1月5日 国共达成停战协定。10日，双方分别向所属部队颁发了停战命令。同日，发布了执行停战协定的通告。

1月27日 周恩来、陆定一返回延安，向中央报告政治协商会议情况，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到机场迎接。29日，周恩来又飞往重庆。

2月10日 中共代表董必武、王若飞返回延安汇报工作。13日又飞赴重庆。博古亦随机同行，他是作为中共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去重庆的。

3月4日 周恩来与军事三人小组马歇尔、张治中及军调部叶剑英、郑介民、罗伯逊等由归绥到延安视察。5日，周恩来，马歇尔、张治中一行又飞往汉口。

4月8日 中共代表王若飞、博古以及邓发、叶挺等在返回延安途中因天气恶劣，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遇难。

4月19日 李维汉、刘宁一离开延安去重庆，参加中共代表团工作。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刘少奇起草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把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

6月22日 毛泽东发表声明，反对美国“军事援华法案”。

6月29日 延安总部举行晚会，欢迎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三十五中队上尉机长刘善本等驾机起义，毛泽东、朱德出席了晚会。刘善本等是26日自成都驾驶B24式飞机到延安机场降落的。

7月20日 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

8月 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9月16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毛泽东起草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

9月17日 王震率三五九旅由中原突围后回到延安。

11月11日 中共中央召开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干部动员大会。朱德、彭德怀、刘少奇、杨尚昆、林伯渠等到会并讲了话，号召边区军民加强战备，准备彻底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11月19日 中共代表团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等从南京回到延安。

11月30日 中共中央和延安各界热烈祝贺朱德总司令六十诞辰。

12月18日 周恩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一年来国共谈判情况的报告。

12月24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练兵与训练干部的指示》。

第十三节 一九四七年

1月1日 毛泽东发表《新年祝词》。朱德发表《一九四七年十大任务》。1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纪念政协会议一周年大会上发表《评马歇尔离华声明》的演说。

2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

2月10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命令：以第一纵队（三五八旅、独一旅）、教导旅、新四旅、警一旅、警三旅组成陕甘宁边区野战集团军，张宗逊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阎揆要任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

2月28日 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指示》。

3月5日 边区野战集团军主力于陇东西华池战斗中，击毙敌四十八旅旅长何奇。

3月8日 延安各界举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的群众动员大会。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等出席大会并发表讲话。

3月10日—11日 彭德怀到边区南线视察防务并传达中央军委作战指示。

3月16日 中共中央决定以第一纵队（辖三五八旅、独一旅）、第二纵队（辖三五九旅、独四旅）、教导队、新四旅组成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兼任司令员、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

3月17日 王震率第二纵队由山西返回延川。

5月18日 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转战陕北。

3月19日 我军经过七天七夜保卫战后主动撤离延安。

3月20日 西北野战军指挥机关在延安县梁村正式组成，张文舟任参谋长，王政柱任副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刘景范任后勤司令。

3月25日 西北野战军在青化砭歼敌三十一旅三千余人。3月下旬中共中央在清涧县枣林沟举行会议，决定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同时组成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4月14日 西北野战军在羊马河歼敌一三五旅四千七百余

人。

4月15日 毛泽东在靖边县王家湾致电彭德怀等，作关于西北战场作战方针的指示。

5月4日 西北野战军攻占蟠龙，歼敌一六七旅六千七百余

人。

5月13日 周恩来、陆定一由王家湾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驻地马家沟（真武洞西五里），代表党中央祝贺西北野战军三战三捷。

5月14日 边区五万军民在真武洞（安塞）举行祝捷大会，周恩来、彭德怀、习仲勋等出席大会并发表讲话。

5月30日 周恩来写信给西北局领导同志，作关于动员参军问题的指示。

7月12日 中央军委任命阎揆要为西北野战军参谋长。

7月18日 中共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举行前委扩大会议，研究我军战略进攻阶段各解放区配合作战等问题。陈赓由华北前线到达陕北参加会议。

7月25日 毛泽东对刘少奇写给晋绥同志的信作了批示。批示说：“少奇同志这封信写得很好，很必要。”“希望各地领导机关将这封信印发给党政军各级一切干部，并指示他们研究这封信，用来检查自己领导下的一切群众工作，纠正错误，发扬成绩，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改造一切脱离群众的组织。”

8月20日 西北野战军在米脂沙家店歼敌三十六师六千多人。从此，西北战场人民解放军由内线防御转入内线反攻。

8月21日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到佳县前东元村向参加西北野战军高干会的全体同志祝贺胜利，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8月30日 中共中央任命周恩来为中央军委代理总参谋长。

9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规定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大量歼敌。

9月23日 西北野战军于延长安家渠召开纵队首长会议，决定二、四纵队南下，在黄龙山区进行外线作战。10月3日，西北野战军前委任命王震为黄龙区行动委员会书记，王世泰为副书记。

9月25日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以警一旅、警三旅和骑兵

第六师组成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

9月28日 周恩来在佳县神泉堡对中央机关干部作时局问题的报告。

10月9日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以新四旅、教导旅组成西北野战军第六纵队。

10月1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同时，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0月10日 中共中央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

12月25日—28日 中共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举行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第十四节 一九四八年

1月20日 毛泽东为习仲勋关于土改中的一些问题的报告写信给各中央局，指出：“我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的这些意见。……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领导机关千万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只要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就可以纠正过来的。”

1月20日 西北野战军第一次前委扩大会议在党中央驻地米脂杨家沟召开。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出席会议作了重要讲话。彭德怀作关于西北解放军转入外线作战的基本任务和进入蒋管区的各项政策等问题的讲话，贺龙作关于后方动员与供应问题的讲话。

1月30日 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的指示。

2月18日 毛泽东复李井泉信，对老区、半老区的土改工作方针问题作了指示。

2月22日 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

2月下旬 中央军委任命赵寿山为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

2月29日—3月3日 西北野战军发动宜川、瓦子街战役，歼敌近三万人，使西北我军由内线反攻转入外线反攻。

3月7日 毛泽东以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名义，发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的评论。

3月23日 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及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在陕北转战一年零五天后，东渡黄河前往华北。

4月22日 西北解放军收复延安。

第十三章 延安对中国革命 做出的巨大贡献

延安是举世闻名的中国革命圣地。它对新中国的产生有两大重要贡献：一、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二、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和发祥地。

第一节 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1935 年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生于此、长于此的民族英雄刘志丹和谢子长经过极其艰苦复杂的斗争，在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创立了西北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包括延长、延川、安定（子长）、安塞、靖边、保安（今志丹）等 6 座县城，游击区扩大到陕北、陕甘边的 17 个县。主力红军发展到 5000 人，游击队发展到 4000 人。在根据地内进行了土地革命，广大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建立起了地方苏维埃政权，群众的革命热情十分高涨。这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唯一没有丧失的革命根据地。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军民给予了积极支援。中央红军长征到吴起镇时，已值深秋，人们早晚已离不开棉衣，而中央红军指战员还身穿单衣，脚穿着草鞋，苏区政府和游击队积极组织群众支援和慰问中央红军。陕北人民生活本来就很不艰苦，但他们踊跃筹集粮食、布匹，制作

服装。定边县宁塞川动员 100 多名游击队员、赤卫队员并调集 300 多头牲口，给中央红军送粮 2 万公斤。乱石头川区送粮 1.5 万公斤。赤安县六区的 3 个乡送粮 1.4 万公斤、猪 50 多头、羊 270 多只。保安县游击支队把从土豪那里缴来的 300 余只羊送给中央红军。定边县政府送土布 3 大卷、红洋布和黑市布 3 匹。苏区政府还没收了吴起镇恶霸地主高惠的 4500 公斤羊毛，组织上百名毡匠为中央红军赶制毡衣。直罗战役时，当地组织了 1000 多人的担架队，有力支援红军的反“围剿”斗争。

红 15 军团得悉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立即支援中央红军：①每个连抽出机枪 3 挺、其它枪支弹药若干送给中央红军；②经济部拿出 1 万元币票，卫生部调出部分衣服、药品，送给中央红军；③在劳山和榆林桥战役中入伍的战士全部拨给中央红军。毛泽东和彭德怀于 10 月 26 日收到这些雪中送炭的物资款项后，立即写信给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感谢他们对中央红军的帮助和支持。

毛泽东感慨的说：“没有这块土地，我们就下不了地。”

第二节 刘志丹和谢子长

刘志丹、谢子长是陕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

1. 刘志丹

刘志丹，名景桂，字子丹（后改为志丹），志丹（旧称保安）县金鼎镇芦子沟村人。1903 年 10 月 4 日出生，1924 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入党。1926 年初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炮兵科。同年秋毕业，随军北伐。1928 年领导渭华起义，任军委主席。1928 年秋，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主席，返回陕北。1930

年，在永宁山创建武装，以商借粮草为名，奇袭甘肃合水县太白镇，缴枪 60 余支，骡马 10 余匹，名震陕甘边，史称“太白收枪”。后入甘军开展兵运工作。1932 年任陕甘游击队副总指挥。1933 年后，历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参谋长、师长、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奠基者。1935 年 2 月，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安定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刘志丹当选为委员。同时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谢子长任主席，刘志丹任副主席，因谢子长身负重伤，刘志丹实为总负责。同年 7 月，刘志丹指挥西北红军，经两个多月的战斗，粉碎了陕甘宁晋四省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歼敌 5000 余人，缴枪 3200 余支，先后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定、安塞、靖边、保安 6 座县城。从此，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接环庆，东临黄河约 20 多个县的革命根据地，红军正规部队 2 个师 9 个团 5000 余人，游击队 4000 余人。8 月，蒋介石又调集陕甘宁晋绥五省军队及驻陕东北军主力共 10 余万人，对西北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9 月，陕北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同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挥师南下，在劳山战役中重创敌东北军一一〇师，师长何立中毙命，迫使瓦窑堡守敌高桂滋部和井岳秀部逃往绥德。但陕北发生了错误的“肃反运动”，原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和西北军委机关、陕甘边县以上干部几乎全部被捕。刘志丹被骗离前线，在返回根据地首府瓦窑堡的途中，碰见从瓦窑堡来的通讯员，说有给十五军团的急件，顺手交给刘志丹。原来这竟是一封密令逮捕他和其他同志的名单。为顾全大局，他将信交给通讯员，要他送往军团部，自己毅然前往瓦窑堡，旋被扣押。中共中央

和毛泽东到达陕北后，纠正了错误的肃反，刘志丹等获释，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刘志丹被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红军北路军和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要职。1936年，刘志丹率红二十八军渡河东征。4月14日，在指挥部队攻占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中弹牺牲，年仅34岁。

为纪念刘志丹将军，中共中央于1936年6月改保安县名为志丹县。1940年，中共中央指示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志丹县修建烈士陵园。陵园设计钟敬之。1943年4月，烈士灵柩由子长县移迁故乡陵园，林伯渠等中共要人亲自执绋下葬。1947年，陵园遭胡宗南部队严重破坏。建国后，于1970年、1973年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进行了重新修复。刘志丹烈士陵园，现位于志丹县城所在地保安镇，坐北向南，面积3.3万平方米。青石牌坊大门，两侧立石狮一对。缓坡上耸立着花岗岩雕成的刘志丹塑像，基座上镌刻着“刘志丹将军”五个镏金大字。拾级而上，两边苍松翠柏环绕。台级共9组34级，寓意烈士牺牲时34岁。正院内，迎面是宽大的纪念亭，中央伫立毛泽东题词的石碑：“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和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小亭四方分布，均有党、政、军领导人的题词碑，计50通。毛泽东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纪念刘志丹同志”；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江泽民题词：“学习刘志丹同志的革命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院内还有造型独特的地球碑一通，上刻陕甘宁边区图示，并镌刻：“陕甘宁边区的创造者”几个大字。陵园最深处是由5孔窑洞和5间厦檐组成的纪念堂。“刘志丹将军之墓”墓碑

立于灵堂屋顶。陵园内还辟有烈士纪念馆，展出各类文物及烈士生平简介。1986年，陵园被国务院列为首批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2. 谢子长

谢子长，名德元，字子长，子长（旧称安定）县李家岔镇枣树坪人，生于1897年1月，为陕甘、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十七军创始人之一。1922年在山西阎锡山开办的太原学兵团学习军事。1924年回安定县办县民团，任团总。翌年赴京津，于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返回陕北后，开展兵运和农运工作，群众称其为“谢青天”。1927年发动清涧起义。清涧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中共直接领导的第三次起义，打响了陕北和西北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次年，又参加领导了渭华起义。1931年，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揭开了陕甘宁工农武装割据的序幕。1932年，任陕甘边区第一支红军游击队——陕甘游击队总指挥。1934年，成立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兼任总指挥，7月攻入安定县城，营救出被捕党员和群众200余人。后兼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取得井武塌、张家屹台数战的胜利。8月强攻清涧河口，胸部中弹，带伤指挥，直至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1935年，在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联席会上，被推选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后伤势恶化，于1935年2月21日逝世于安定县灯盏湾村，时年39岁。同年5月，为纪念谢子长将军，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改烈士家乡为子长县。

谢子长陵园位于陕西子长县城东北祁家湾。始建于1942年，1947年国民党军占据瓦窑堡后被毁。1952年重修，根据周

周恩来总理的提议，定名为子长烈士纪念馆。纪念馆坐北向南，占地 12000 平方米。1989 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第二批重点烈士纪念物保护单位。子长陵园呈四方形，前后两院。大门内矗立革命烈士纪念塔一座，通高 11 米，塔身三面刻有子长县 300 位烈士英名。塔后东西两侧分列两座展室。东西两亭的碑上镌刻着许多名人题词。正中为西安美术学院雕塑的谢子长将军大理石像，总高 6 米，烈士肩披大衣，身着戎装，发式中分，右腿前迈，呈动态，表现了烈士永往直前的革命精神。中央大碑亭内立有三通毛泽东手迹石碑，分别书写：“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前仆后继打倒人民公敌”和毛泽东 1939 年撰写的《谢子长烈士事略》石刻碑。墓堂踞于后院，墓堂南壁正中横书“谢子长同志之墓”和谢子长同志生平事迹简介；正壁悬挂谢子长画像。堂内庄严肃穆。门厅左右碑廊内竖立着邓小平、江泽民、陈云、杨尚昆、李鹏等 20 多位领导人题写的花岗岩石刻碑。

第三节 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和发祥地

1. 小米饭哺育了共产党人和八路军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位于黄土高原腹地，地广人稀、土地贫瘠、交通闭塞、生产落后，经济基础十分薄弱。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顽固势力和日本侵略者乘八路军主力挺进华北抗日前线之机，对陕甘宁边区进行骚扰和破坏。1939 年 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反共方针，掀起反共高潮，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并停发八路军军费，使边区在财政上和物资上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为了摆脱困难，中共中央领导陕甘宁边区的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从1941年开始的大生产运动和劳动竞赛中，陕甘宁边区军民通过努力劳动，取得了丰硕成果。1941年，边区生产粮食163万石。1942年，全边区生产粮食168万石。1943年粮食总产184万石，除去消费162万石，还节约22万石；当年收获棉花173万斤，达到边区棉花需求量的50%以上；当年增加耕牛1万多头，毛驴1200余头，羊子2万只。1944年，边区粮食产量增加到200万石；棉花面积增加到35万亩，产量达到300多万斤（皮棉）；牛、羊总头（只）数比1937年增长了2至3倍，牛、驴达到403620头，羊子达到1954756只。农民的公粮负担也逐年减少：1941年为20万石；1942年为16万石；1943年为18万石；1944年为16万石；1945年为12万石。陕甘宁边区在1944年12月至1945年1月14日召开的“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上，就有476位劳模出席，比第一届会议代表增加了两倍多。其中特等劳模74名，甲等200名，乙等189名以及模范单位14个，并给予奖励。其中，1944年在大生产运动中取得的成就尤为突出：粮食方面，全边区增产细粮20余万石，机关、学校产细粮近10万石，除了边区军需民食外，可结余粮食28万石，连同前几年的结余，边区积存粮食达70万石以上；棉花方面，产量达300万斤，可以织布150万匹，自给率达到2/3；轻工业方面，军民生活所需的毛巾、肥皂、火柴、纸张、陶瓷、卷烟、袜子等全部或大部分可以自给；重工业与化学工业，能够炼铁、炼油、修造机器、配制军需品、制造三酸和玻璃等。边区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和劳动竞赛，不仅生产自给，部分地县还有效地解决了财政问题。据1945年统计：边区27个县自给生产收入7493万元，占总收入的37%，这个数字不包括蔬菜和个人生产的肉食等。还减轻了农民9%的征粮负担。边区渡过了财政难关，并大大地改善了人民生活，许多县达到了丰衣足食。

边区政府规定，救国公粮根据每户土地和劳力情况，以户为单位定量征收。平均每户每年承担 1.44 大石。1935—1948 年，本区部分县捐献马料 22047 余石，公草 1393645 公斤，银元 1000 余万元，现金 3000 余万元，肉类 18 万公斤，菜类 60 万公斤，木炭 327500 公斤，军鞋 23672981 双，纺线 2497.5 公斤，土布 63678 匹，棉衣、棉大衣 13940 余件，袜子、手套等 150 余万双。

2. 拥军拥政

延安是“双拥运动”的发祥地，也是延安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优良传统。1941 年 5 月 1 日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三条提出：“提高边区武装部队战斗力，保障其物质供给，改善兵役制度及其他后方勤务的动员制度，增进军队与人民的亲密团结”。施政纲领第四条规定：“加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工作，彻底实施优抗条例，务使八路军及一切友军在边区的家庭得到物质上保障与精神上安慰”。政府与人民拥护军队、优待军属，部队拥护政府、爱护人民，使军民之间形成了鱼水般的紧密团结。同年 12 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修正陕甘宁边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陕甘宁边区抗属离婚处理办法》《陕甘宁边区调整军政军民关系、维护革命秩序暂行办法》。这些条例、办法的公布及贯彻执行，体现了边区政府关于军民团结的正确主张和政策，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为了进一步改善军政军民关系，加强军政军民团结，1942 年 10 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在 1943 年春节期間，由边区政府和留守兵团同时发起拥军拥政活动月。1943 年 1 月 15 日，边区政府发布《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决定指出：“八路军不仅坚持了华北抗战，在全国抗战中起了支持作用，而且陕甘宁边区的保卫，人民民主民生利益的保护，亦全赖有八路军之镇

守”。决定提出：“八路军是值得政府和人民拥护的军队；拥护军队是各级政府与全体人民应有的责任与义务”。决定要求各级政府必须积极改善和加强拥军工作，应将拥军工作看成经常重要的工作，给以定期的切实的检查，成绩优良者，予以奖励，对此工作漠不关心毫无成绩者，应给以批评和惩罚。同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解放日报》发表《造成拥军热潮，增强拥军工作》的代论文章，要求“各级政府务于拥军运动日内对今后拥军工作的改进和转变，在思想和组织上打定新的基础。这是边区人民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巩固边区的一个重要步骤。”边区政府决定，从1月25日至2月25日为全边区拥军运动月，1944年1月6日，边区政府制定并在《解放日报》上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拥军公约》：“拥护军队，保卫边区。帮助生产，参加战争。军人过往，招待殷勤。运送伤病，爱护关心。防奸严密，消息灵通。优待抗属，建立家务。退伍残废，立业成家。潜逃战士，归队不差。过年时节，慰劳有加。军民团结，战胜日寇。”

1943年春节前后，边区各级政府领导人民普遍开展了拥军优属运动。从分区到县、区、乡政府，都分别举行了扩大的政务会议，邀请驻军代表参加。各级政府负责人认真开展自我批评，检查了过去对军队认识不够、爱护不够、尊重不够的错误，并且提出了今后改正的措施。在社会各界群众中举行了各种座谈会、拥军大会、军民同乐晚会等，进行普遍深入的拥军教育。通过各种形式，向群众详细介绍军队在保卫边区、参加生产、爱护人民方面的功绩，启发群众爱护军队的自觉性和真挚感情。1月27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以62300余元（边币）的慰劳代金，慰劳延安附近驻军、干部医院、休养所、抗日军人家属和退伍军人。2月17日，林伯渠主席率领慰问团

赶到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驻地南泥湾，慰问三五九旅将士，受到王震旅长兼政委和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林伯渠在讲话中指出，这次我们带来的慰劳品很少，然而我们带来了延安及边区人民对于自己的军队无限的爱护热忱和关心。

在1943年的拥军运动月中，各个乡政府和各机关学校，都募集了许多慰劳品，并且推举代表组成慰问团，率领秧歌队，慰问驻军和抗日军人家属。如延安市枣园乡有6户抗属，乡政府给每户慰劳猪肉12斤，粉条1斤，米1斗（每斗约30斤）。延安市各级政府在春节期间邀请驻军指战员和抗属会餐，占到抗属总数的47%。

与此同时，边区各部队也广泛地开展了拥政爱民运动。边区“双拥”运动的经验，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由毛泽东撰写的题为《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要求各根据地仿照陕甘宁边区，“应准备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军队方面，重新宣布拥政爱民公约，自己开检讨会，召集居民联欢会（当地党政参加），有损害群众利益者，实行赔偿、道歉。群众方面，由当地党政和群众团体领导，重新宣布拥军优抗公约，举行热烈的劳军运动。”1944年1月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布《关于拥政爱民及拥军工作的决定》，要求当年的拥政爱民及拥军运动，不仅要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而且要使它更加深入，成为部队和广大人民群众自觉的群众运动，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运动。”1944年的双拥工作在规模上和成效上都比以前有了很大的发展。

陕甘宁边区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深入发展，使边区出现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可喜局面。并且随

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得到发扬光大，变为巨大的精神力量。

3. 拥军支前

1935—1946年6月，仅延安专署就有2万多人参加红军和八路军。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政府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的人民军队，从此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6月30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紧急动员，准备战争，保卫边区指示》。11月初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三届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把动员一切力量，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边区的进攻，列为当时边区最紧迫的战斗任务。林伯渠主席号召在全边区开展群众性的参军运动，动员广大青年随时源源不断的到军队里去，保卫边区，保卫家乡。11月11日，中共中央召开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干部动员大会。朱德和彭德怀号召全边区60多万名青壮年以“抢我一粒粮，还我一滴血”的精神参军参战，彻底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从此，陕甘宁边区人民掀起了参军参战高潮。据统计，从1946年7月至1948年12月，陕甘宁边区共有50705人参加解放军，另有1.4万余人加入地方干部队伍。其中延属分区有12407人参加解放军。在参军的人员中，有中共安塞县县长贺兴旺、志丹县县长赵玉文等领导干部，有受过边区政府奖励的民兵英雄石秀山、王瑞臣、高善祥、樊志杰、田启元等。延安县姚店区三乡白牙炭厂模范工人高加福、陈如业等10名工人一起报名参军；安塞县坪桥村75岁的叶老大娘主动送孙子参军入伍；延长县完全小学在数日内有12名学生参军；子长中学的36名毕业生中，有20多人报名参军。延安县吴家枣园（今宝塔区柳林乡）群众在5天内，就捐赠边币270余万元。永胜区的女共产党员贺兰英、刘玉英和王桂花等人，拿出自己结婚时珍藏的新手巾等物品，慰劳新战士。乌阳区

(今属宝塔区元龙寺乡)史家沟村的艾巫元参军后,乡政府拨出1孔窑洞和60余亩土地,帮助他家搞生产。

在积极参军的同时,陕甘宁边区人民还竭尽全力,支援前线,从1947年3月1948年2月,边区人民参加担架队民工198653人次,后勤运输民工1282409人次,修筑工事民工22678人次,押送俘虏民工11204人次,为部队带路11720人次,为部队磨面、炒干粮、做军勤服务用工655000多个,动员支前牲畜1478707头(次),动员随军担架6633副,临时担架1.55余万副。此外,从1947年3月至1948年6月,边区各界妇女共做军鞋929000多双。为了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仅陕甘宁边区延属分区有5500多名烈士血洒疆场。全区的支前民工及畜力,平均全年服勤时间在两个月以上。如延安县牡丹川区(今宝塔区梁村、张坪一带)五乡,每名劳力1948年平均服勤为92.8天,每个畜力服勤平均为78.2天。延属分区群众的物质负担(公粮、公草及军鞋等),约占到全年总收入的1/4到1/3。在1948年内,黄龙分区完成公粮任务13.2万余担。西北野战军在当年2月外线出击后,到当年10月所用的军粮中,由黄龙分区供给的军粮即达48.4%。在支前中,涌现出一大批英雄集体和功臣模范,如由安塞县边区自卫军连长苏云海率领的担架队,参加蟠龙战役的志丹县担架队,都是受到政府和军队表彰的模范集体。延安县随军支前担架队于1949年5月随西北野战军进军大西北,转战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屡立战功,获得“支前有功”奖旗,于当年10月30日凯旋归来。

据不完全统计,在1948年内,陕甘宁边区人民动员支前担架7355副,支前民工总数达4085787个,支前畜力总工数1576846个,运输车辆工数98210个。当年所用军费开支,占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全年财政总收入的86.2%。在1949年内,陕甘

宁边区共动员担架 13353 副，支前民工总工数 7686645 个，支前畜力总工数 169480 个，运输车辆工数 389541 个。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为支援部队和重大战役，有资料可统计的数字为，延安专署分区 10 县（市）人民组织随军常备担架队 3294 副（每副 4 人），13348 人；临时担架队 4731 副，23236 人；随军常备畜力 1174 头，887 人；临时运输畜力 2500 头，每畜跟 1 人，计 2500 人；畜工 23000 个。再加上后方支前的担架、运输和其它项目，总计人工 2514916 个，畜工 287577 个。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第十四章 中共中央在延安培育的精神支柱——延安精神

第一节 延安精神定义概说

目前，对于延安精神还没有一个意见一致的固定的定义。学术界有很多种说法，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根据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有多种阐述。通常说法为：延安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的一套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延安精神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我们党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崇高的理想、坚定的方向、必胜信念和艰苦创业精神的生动体现，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铁映在2004年7月19日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上说延安精神的基本内容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优良的作风。这是目前对延安精神内容最新的阐述。

我们党运用和发扬延安精神，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全国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斗争的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

的伟大胜利。延安精神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彻底结束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奴役，获得民族独立的伟大精神武器，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根本消灭剥削制度，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伟大精神武器。

延安精神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更是未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维汉指出：“这种延安精神，是我们的传家宝，是永放光芒的灯塔”。1980年，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江泽民同志在视察延安时强调：“延安精神没有过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要发扬延安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离不开延安精神。否则，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很难搞成的”。他还为陕西省委机关刊物《共产党人》挥笔题词：“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在历史变幻不定的时空中，延安精神有着永恒的魅力。上世纪80年代末起，延安成立了延安精神研究会，北京成立了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一些省也成立了省级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委七届四次全委会1989年12月12日通过了《中共陕西省委关于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的决定》，决定从1990年开始，将每年的10月26日（即毛泽东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复电日）定为全省延安精神纪念日。

第二节 延安精神的基本内容

1.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延安时期，尽管困难重重，险象环生，但由于我们党坚持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今天，从国内来讲，我们面临着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情况和实现跨世

纪宏伟目标的伟大任务；从国际环境来讲，遏制与反遏制、“西化”与反“西化”、颠覆与反颠覆、演变与反演变的尖锐斗争更加激化。可以说，现在的任务更艰巨，环境更复杂，更需要我们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我们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这是已被我党、我国的历史证明的真理。

2. 爱国主义精神

每个真正的人都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怀有深厚的爱恋之情。这是一种长期积累起来的乡土情感。当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在受难的时候，真正的革命者必然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有救国救民的使命感和拯救意识。当自己的国家受到外来侵略的时候，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就更加充分表现出来。抗日救国就是延安时代爱国主义的表现。

3. 共产主义理想

只有爱国民主的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热情还不行。必须要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有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所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要取得民族的解放，人民的解放，就必须坚信共产主义理想一定实现，并为之努力奋斗。延安时代所进行的抗日救国伟大斗争，推翻蒋家王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奔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

4. 实事求是的精神

不仅要有爱国主义热情，共产主义理想。还要对实现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才能真正找到一条民族解放的道路。教条主义和空谈主义都不能救国救民。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正是一条正确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5. 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无产阶级革命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革命。无产阶级政

党就是为实现本阶级的历史使命而产生的，它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它产生于人民，为人民利益而奋斗，其所有主张和目的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革命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6. 艰苦奋斗的精神

要革命就不能依赖别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靠我们自己解放自己。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是这种精神。另一方面还要有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拼命精神和牺牲精神。同时还要有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和美德。

7. 团结友爱精神

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只有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

8. 自觉遵守纪律的精神

铁的纪律是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在延安时代，我们党针对党内存在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分散主义等错误倾向，在全党开展了纪律教育，从而使全党和党的组织都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团结起来，真正做到了革命队伍整齐，步调一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9. 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的党三大作风。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真理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准备随时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可见，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自觉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是

一种修养精神。

第三节 延安精神的产生和形成

概括地说，延安精神形成于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至1945年党的“七大”胜利召开期间，延安精神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培育形成的一种奋发向上的革命精神。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写下《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文中第一次提出“自力更生”的概念。他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937年，他完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之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奠定了延安精神的哲学基础。1938年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同学会成立题词，系统地提出：“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1938年5月他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同年毛泽东在延安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再次讲道：“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共产党历来更提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他把延安精神的另一核心概念“艰苦奋斗”引入了进来，并解决了先进的世界观与民族优良传统结合的关系。在

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倡导下，延安所有干部学校普遍形成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校风。延安精神在延安初步体现。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指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944年，毛泽东又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讲话，他着重指出：“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他鲜明地提出了延安精神对人格的要求。

1942年前后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是延安精神形成的最重要阶段。1939年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指出：“自己动手，克服困难”。1941年，他又强调：“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42年，他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生产运动中，中共中央提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丰富和发展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内涵。以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为象征的大生产运动，就是这种精神的伟大实践。整风运动把中国共产党从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以科学的、理论的思维把延安精神推向新的高峰。毛泽东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科学地阐述了“实事求是”，他说“‘实事求是’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943年，他为延安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从而最终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毛泽东思

想的灵魂，亦当然是延安精神的灵魂。整风精神和南泥湾精神是延安精神形成的主要标志。

1942年，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在他们的思想中、行动中，没有丝毫消极态度，他们完全不怕困难，他们象生龙活虎一般能够征服一切困难。我们看延安同志们对于工作是怎样充满了负责精神的；……在这种精神下，延安同志们没有一件事不是实事求是的。他们对于他们所领导的延安全县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及各种具体情况是充分了解的，他们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他们就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群众的艺术，他们完全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我们希望全边区的同志都有延安同志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工作态度，这样的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也学会领导群众克服困难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使我们的工作无往而不胜。”这样，“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就逐渐凝炼和引申为“延安精神”。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又再次明确而全面系统地阐述党的三大作风。延安精神随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与发展，日臻完善。

第四节 延安精神形成的主要标志

延安精神形成的主要标志是：

1. 1938年毛泽东为抗大规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在延安所有的干部学校中普遍形成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作风，从而为延安精神的初步形成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如果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也是不能持久的。抗大精神是延安精神初步形成的体现。

2. 1941年至1942年开展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对延安精神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整风运动的最大收获就是把党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树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大生产运动中，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对党的艰苦奋斗精神的丰富和发展。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就是对艰苦奋斗精神的伟大实践。因此，整风精神和南泥湾精神是延安精神形成的主要标志。

3. 1944年毛泽东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号召全体军民学习张思德完全彻底为人民的崇高品质，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依靠人民、相信人民，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我们将无往而不胜。张思德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张思德精神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

4. 1945年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党的三大作风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延安精神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也是伴随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而发展的。

第五节 延安精神的主要特征

1. 时代性。延安精神，顾名思义它是在延安时代形成的精神（当然其前沿可以追溯到长征，这里主要是指在延安形成），贯穿于整个民族革命战争时期，它集中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所以，它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2. 完整性。延安精神内容形成的几个方向，它有一条主线

来联结，形成一个完整的精神体系，那就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它贯穿在整个延安精神的内容中，也就是说，每个方面都是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为主旨而联结。例如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作为主线和基础，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就不可能形成彻底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作风；如果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为主线作基础，也就不可能形成忘我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等等，总之，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为主旨，是不可能把这几方面统一起来，形成这样完整的思想体系。

3. 实践性。延安精神它不是空洞的说教，也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可以操作见之于实践的。本着精神变物质的原理，延安精神可以反映在革命队伍中每个同志的工作、生活、作风、战斗等各个方面；延安精神它可以分化成若干条具体措施，来指导客观实际和改造客观实际。比如提倡艰苦奋斗和自力更生的精神，在延安就可以开展群众大生产运动，去参加南泥湾开荒，并以这种精神改造了客观的面貌，获得了大丰收，因此，它具有实践性。

4. 广泛性。就延安精神的宗旨和内涵而言，它可以面对全民，相当广泛。就其接受对象来看，它不是仅适用哪一部分对象更不是哪一个人，而是广大群众。不管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干部是军人，是工人还是商人，都可以而且应当学习延安精神，发扬延安精神，这样才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振兴。所以，延安精神包括的爱国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不管哪一条内容，对每个公民来说，都是应当认真继承和发扬的。

5. 继承性。正是因为延安精神有以上这样几个特点，由此它也是可以而且应当加以继承的，特别是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的今天，就更有其特殊的意义。因为在当今改革开放、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也必然随之带来一些不健康的精神糟粕，致使有些地方有些干部受其影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抬头。这样，坚持延安精神，发扬延安精神，继承延安精神就显得更加重要。在我们三代领导人中，毛主席、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都先后发出了革命传统不能丢，艰苦奋斗不能丢，要发扬这种精神，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号召。这里所指的革命传统和艰苦奋斗，就是指的延安精神。所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希望把优良传统代代相传，也只有把具有继承性的延安精神继续坚持下去，代代相传，才能保证党不变色，国不灭亡，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因此说：“延安精神要代代相传，世世代代永不丢。”

6. 稳定性。延安精神作为一种精神财富，具有超越时空的稳定性，激励着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用延安精神激发起全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救国热情，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战胜了内外强敌，建立了新中国。建国初期，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我们党又是靠延安精神，领导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迅速医治好战争创伤，开展了全面的经济建设。三年困难时期，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国际反华大合唱，我们党还是靠延安精神，团结全国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战胜了各种想象不到的困难。今天，我们继承发扬延安精神，又不断推动经济建设步步迈向辉煌。

7. 生命力。延安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培养和教育着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从延安时期聚集在延河之滨的无数革命先辈，到改革开放以来从海外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的无数精英学子；从为人民利益而牺

牲的张思德，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从五十年代忘我工作的孟泰，到六十年代的“铁人”王进喜；从“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到人民的好公仆孔繁森、李润五……；在他们身上，处处闪耀着延安精神的光辉。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所形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和高尚情操，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人。

第六节 延安精神的科学体系

延安精神博大精深，内容丰富，但最根本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1. 政治灵魂

延安精神首先是坚信共产主义的革命精神，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党历来十分重视对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增强对无产阶级事业必胜的信心。在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把革命的政治工作作为军队建设的指南来抓，在军队中着手建立党代表制度、政治机关工作制度。由于有了党的正确领导，有了坚定的政治方向，在物质条件极差、环境极为艰苦的情况下，红军干部战士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精神、高昂的战斗意志，战胜了强敌、扩大了苏区，长征二万五千里，胜利北上到陕北。

抗日战争爆发，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这就是当时全国千万热血青年积极投奔延安之原因所在。1938年元月5日，毛泽东为抗

大题词中提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

2. 理论基础

延安精神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

在延安时代，毛泽东同志曾说：“延安同志们没有一件事不是实事求是。”可见，延安精神首先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科学精神。它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是同主观主义相对立的。实事求是是在整风运动中确立的。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这次运动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彻底揭露了党内“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路线的假马克思主义实质。批判了他们长期奉行的反动哲学基础和唯心主义思想根源，从而一扫当时危害极大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歪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

例如“三三制”政权的原则是根据对中间人士政治态度的正确分析、确认争取中间人士、充分发挥他们的抗日热情提出制定的，这不仅体现了党的民主作风，也说明我党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1942年6月3日，边区政府在大礼堂正在召开征粮会议，这时天降大雨，雷声大作，延川县代理县长李彩荣不幸身亡。消息传开后，有个老百姓借此指名骂毛泽东。毛泽东知道后，并没有追查这个人，而是派人了解群众骂自己的原因，后指示有关部门将粮从二十万石减少到十万石左右，并动员干部和军队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解决自己吃穿减轻农民的负担。这件事既体现了毛泽东豁达大度的民主作风，更反映出他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3. 实质核心

延安精神是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廉洁奉公的公仆精神。

群众路线是党的优良传统，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宗旨，是我们革命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这是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人民才是社会的主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党和人民群众患难与共，始终得到全国人民的最坚决的支持和最无私的援助，形成了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得如此之快，就是因为它失掉了民心。

在延安时期，党中央毛主席和人民亲密无间。例如毛泽东枣园给老人过寿，住在杨家岭时经常和群众交谈。他始终关心群众的吃、穿、住、行等问题。可见，从延安精神的实质和核心而言，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4. 根本特征

延安精神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既是延安精神的根本内容，也是延安精神的根本特征，是我们党经过长期的曲折斗争而获得的宝贵经验。党在初创时期，由于思想上的幼稚，主要领导人的无知，在大革命时期不知道进房子当主人，不知道刀能杀人，对共产国际只知讲服从依赖，放弃了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的主动权。蒋介石的屠刀、共产党人的鲜血，使一部分同志的头脑清醒了，认识到依靠自己力量干革命的重要性。面对抗战的严峻形势和统一战线内部的复杂情况，党中央、毛泽东强调必须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当然这并不是要耍个人英雄主义、拒绝任何外部援助。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反复证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丧失自尊、自信心，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为争取民族独立繁荣富强而不懈地斗争，这个民族只

能听人摆布，任人宰割。

当年旨在渡过抗日难关，奠定抗战最后胜利的物质基础的大生产运动，自始至终贯穿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从而成为延安精神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的生动体现。1939年2月开展的大生产运动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保障了机关部队的给养，满足了人民的需要，边区实现了丰衣足食。八路军359旅开发南泥湾，就是大生产运动中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典型。

第七节 延安精神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思想基础

1. 延安精神产生的历史条件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也就是说，一定的主观的精神意识是一定的客观的物质存在的反映。延安精神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多方面的历史条件和深刻的社会基础。这就是：

第一、延安精神形成和发展的直接原因。1941年至1942年，解放区面临着严酷的军事斗争和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为了战胜困难，党领导抗日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敌、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聪明才智，涌现出了创造抗大精神和南泥湾精神的英雄群体。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谈到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这件事时说过，除了它的消极的坏处一方面外，还产生了一个积极的方面，那就是促使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而其结果则居然达到了克服困难的目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古话，是完全自觉的被理解的。”经济困难是形成延安精神的一个重要的客观条件。

第二，成熟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产生延安精神的决定性的主观条件。延安时期，我们党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已经成熟为一个全国性的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空前团结和统一的党。党中央已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久经考验的领袖集团。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成熟，形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尤其是经过整风运动，干部和党员的马列主义和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已成为全党的新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从而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第三，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地处偏僻，经济落后，但人民富于革命传统。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陕北开始传播。大革命时期，李子洲等在这里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开展了国民革命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在陕甘和陕北举行武装起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延安成为党中央的所在地以后，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奔赴延安，使延安成为中国当时经济上虽然落后，而政治上最先进最民主最革命的地方，这就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

2. 延安精神产生的思想基础

第一，延安精神是民族精神的升华。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个性的优秀民族，是一个内在精神异常丰富博大的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铸造了自己特有的民族精神，即朴实无华的求实精神、吃苦耐劳的自强精神、反抗黑暗统治的革命精神、抵抗外敌入侵的斗争精神、襟怀豁达的乐观精神。这五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古老精神。而延安精神的基本内容就是建立在民族精神基础上的自主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爱国主义的优秀传

统的结合，这种思想的产生，不仅有几千年的社会经济条件 and 实践基础，而且有相应的文化传统及社会心理基础。延安精神没有离开中国人类的文明大道，而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民族之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升华。

第二，延安精神是革命精神的结晶。中华民族富有革命传统，自古以来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赞成平等，不赞成互相压迫，自古以来对压迫采取反抗的手段解决。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五四”运动，倡导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和反帝爱国精神，这些精神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从而也积淀在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思想深层。在现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中国几千年来革命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在各个不同的斗争阶段，都产生了不同的革命精神。在井冈山时期产生了井冈山精神，主要内容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锐意进取，勇于开拓”、“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长征中产生了长征精神，主要内容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互相关心、同甘共苦、生死与共、坚持胜利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些精神的继续和发展，是延安精神赖以形成的沃土。作为统一的革命精神，延安精神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具有连续性和整体性，是革命精神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的不同特征和风貌。

第八节 延安精神的显著作用

延安精神是我们党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培育的一种独特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灵魂。在我们党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缔造新中国的历史进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延安精神不断发挥着它的重要作用。概括地讲，主要有四个方面：

1. 显著的育人作用。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所处的环境极其恶劣，外有日寇侵略，内有投降派，根据地生活条件很差。面对内忧外患的困境，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既坚持用自己创立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又处处率先垂范，以压倒一切困难的顽强意志和艰苦奋斗精神，鼓舞、激励和培育出一代历经艰险考验而意志坚定的革命大军，才使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回顾过去，不难看出，正是我们党用延安精神培育起来的那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经过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的英勇斗争，才有我们的今天。

2. 巨大的凝聚作用。在延安时期，我们党进行过全党整风，搞过大生产运动，又对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进行了认真的总结，促使全党统一了思想，有了共同的理想信念，又有了纯洁的革命组织，也树立了令世人佩服的优良作风。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这种高尚的情操和不屈不挠的奋斗，才带动、感染和吸引了千千万万的革命者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推翻了三座大山。如果没有延安精神这种巨大的凝聚力，就不会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3. 有力的导向作用。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十分重视加强对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引导树立牢固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促使所有的革命者都有胸怀远大理想，扎扎实实地奋斗。这种永不停息的奋斗精神，不仅在当时起到明显的导向作用，也为我们今天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4. 不断的创新作用。我国的国情决定我们党所从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既无先例，又不能照搬别国的作法，只能靠自己探索和创新。如：以毛泽东为代表在实

践中开创了中国特色即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创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爱国力量在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经过大生产运动，有效地解决了革命势力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等等。这些都是从实际出发，大胆开拓创新的结果。

资料来源

1. 《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 《毛泽东文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6.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7.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8.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9.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报刊史研究室编：《延安文革》，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1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11.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12.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13. 李君如：《毛泽东与近代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版。

1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中央在延安纪事》，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5. 中共陕西省委研究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时期》，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6. 延安革命纪念馆编：《圣地延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7. 中共延安市委宣传部编：《延安精神概览》，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
18. 刘煜主编：《圣地风云录》，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版。
19.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试用本）。
20. 阎伟东编著：《解读延安》，中国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
21. 《延安市志》，1994年12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22. 《延安地区志》，2000年8月西安出版社出版。
23. 胡晓梅编：《延安革命旧址介绍》，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
24. 王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会议资料集》，延安市老年学会编，陕内资图批字（99）FY·011号。

优秀民营企业家曹春景



优秀民营企业家曹春景是安徽省颖上县人，现为延安龙飞建筑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延安市政协委员、延安市宝塔区政协委员，延安市工商联、乡镇企业协会、建筑协会、慈善协会、墙材技术协会副会长，陕西省安徽商会副会长，中国乡镇企业协会、陕西省乡镇企业协会常务理事。

曹春景于1969年随工队来到延安，在延安娶妻成家，开始艰苦创业。1978年创办了“川口建筑队”，逐渐形成了集建材、建筑于一体的综合性建筑企业。2001年，联合了四家建筑企业组建了“延安龙飞建筑有限责任公司”。曹春景领导的龙飞建筑公司视质量和信

誉为生存的根本，获得了良好的社会信任和发展空间。几年内，公司发展总资产一亿多元，职工1千多人。目前，公司实力雄厚，有高中级技术人员154名，有各种施工设备数百台，实现了计算机网络系统管理，具有同时承建四十万平方米施工任务的能力。公司历年承建工程竣工合格率100%，优良率□85%。2003年公司通过了质量、安全、环境三体系认证。现在，延安龙飞建筑公司成为延安市乡镇企业中规模大、实力强的二级建筑企业。

企业发展起来以后，曹春景非常注重社会效益。近几年来，公司对十一所中、小学校建设进行了无偿投资，资助失学儿童和困难大、中专院校学生，为孤寡老人和灾区捐款，累计达186.9万元。为延安市宝塔区新农村建设资助46万元。在延安市慈善协会建立曹春景慈善爱心基金400万元。累计安排下岗职工就业116人，安排农民工就业3000人。

曹春景领导的延安龙飞建筑有限公司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近年来，公司在省、市、区获得了“明星企业”、“重合同、守信用”企业、“诚信先进单位”、“优秀民营企业”“纳税大户”等78项荣誉。曹春景获得了“中华爱国之星”、“陕西省优秀乡镇企业家”、“第五届全国乡镇企业家”、“宝塔区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爱心企业家王西林



王西林总经理

全国劳动模范、延安王家坪实业发展集团公司总经理王西林，被延安人称为爱心企业家。公司起步为王西林于1987年创建的延安王家坪汽车联营运输公司，成立20年来，把一个由两辆解放牌汽车跑运输起步的个体企业发展成为集汽车货运、铁路代办运输、车辆修理加油、停车住宿、建筑装潢、石油钻井、石化物资和橡胶制品贸易、房地产开发、酒店业和教育教学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民营企业，总资产达4亿多元，年上缴税费2800多万元。历年来，他资助社会公益事业3500多万元。

王西林很小的时候，父亲蒙冤被打成历史反革命，1963年辗转落户到延安市宝塔区麻洞川乡玉家崖村。淳朴的当地农民给了他许多帮助。父母也一再教诲他，要牢记乡亲们的恩情。王西林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帮助穷困的人也能过上好日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西林父亲被落实政策平反。参加工作且已转干的王西林于1987年下海创办企业，决心牢记母亲的教诲，办企业为民服务。

1988年他白手起家时期，克服自身困难，一次就购买了50套课桌凳捐给王家坪小学。从此他，他展开了资助社会事业的善举。从1997年3月到2001年9月，他捐资228多万元，在宝塔区麻洞川乡和玉家崖村、枣园华林村、南泥湾金庄村、志丹县李家洼村、大荔县安昌村、富县秋家沟村建起了7所希望小学，使当地改善了教学环境，使2000多名小学生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奋发学习。同时，他还资助贫困学生，历年来他共捐助学费58万元，资助学生66名。其中：大学以上33名。2005年8月，他给延安市总工会捐款20万元，解决了一大批贫困大学生的学费问题。

王西林还把目光投向了因病致穷的人们。历年来，他资助社会各界人士治病50余人次；资助治疗费达100余万元。

王西林常讲“赚钱是为了给社会多做贡献”。从1996年开始，他给延安市扶贫攻坚、陕西省慈善协会、延安市慈善协会、长江流域抗洪救灾、安康洪灾区、陕南洪灾区、子长洪灾区捐助达120多万元。2005年7月捐款300万元，为陕南商

洛、安康、汉中三个市修建117座“慈安桥”。2006年8月，他在陕西省慈善协会设立个人冠名助学基金500万元，用于资助陕西省大学生。2007年8月他又在延安市慈善协会设立800万元冠名慈善基金，发展延安慈善事业。为包扶小康村宝塔区麻洞川乡樊村新农村建设投资150多万元，扶持产业建设和村容村貌建设。

随着公司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增加，王西林开始关注社会事业。他为延安城市建设、公安机关办公、农村医疗卫生、养老院、植树造林等捐助资金达400多万元。王西林在企业积极主动地安排下岗职工和待业青年700多人，为构建和谐延安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无私的奉献。

王西林不断提高公司员工的福利待遇，关爱职工的生活，为职工谋利益放在第一位。

在王西林的领导下，集团经营连年上台阶。先后荣获省、市、区先进私营企业、明星企业、助残先进集体、光彩事业先进企业、陕西省私营经济先进基层党组织、文明企业等多项荣誉称号，总经理王西林现任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工商联副主席、陕西省劳动模范协会副会长、陕西省慈善协会荣誉会长等多项职务。他本人亦先后荣获陕西省先进青年企业家、陕西省交通运输十大新闻人物、陕西省十大扶贫之星、陕西省为公益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民营企业企业家、陕西百杰、陕西省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全国十大公益之星提名奖等50多项殊荣。2005年4月，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并受到了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亲切接见。2005年11月，王西林被国家民政部授予中华慈善奖，2006年9月又被陕西省民政厅和陕西省慈善协会授予三秦慈善奖。



王西林出席十一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



王西林在安康实地察看由他捐建的慈安桥



王西林总经理和集团公司领导合影



王西林与资助的贫困大学生在助学金发放仪式上

延长石油管道运输公司奋力创业

延长石油管输公司成立于2005年12月21日，是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直属单位之一，主要负责集团公司的油品管输、原油采调和管道建设工作。公司下设10个机关处室、2个直属科室、3个基层生产处、4个项目建设指挥部。从业人员1026人。2007年，管输原油444.1万吨，管输成品油225.6万吨。

目前，公司拥有永坪姚店（同沟敷设4条）、川口姚店、甘谷驿姚店、定边靖边、靖边榆林、七里村姚店、子北永炼、小河、天赐湾榆炼等11条原油、成品油在运管线，管线途经榆林的定边、靖边、横山、榆阳区和延安的延川、延长、子长、宝塔区共8个县区，全长599公里，管输规模为原油600万吨/年、成品油250万吨/年。正在建设全长为726公里的吴起延炼、安塞永炼、延炼西安等3条原油、成品油管线。

至“十一五”末，公司管线总长度将达到1300多公里，原油管输规模达到1400万吨/年，成品油管输规模达到750万吨/年，职工人数达到1600~2000人，油品管输率达到90%以上，基本实现干线管道输油目标，与公路运输方式相比，每年可节约运费5.98亿元，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十分显著。



公司总经理高宏深入生产一线检查指导工作



职工以饱满的热情参加生产建设



灾区
向四川地震
捐款

职工进行文体活动



职工进行工作经验交流



职工工作认真负责



职工参加“我为延安种棵树”活动



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延安市公安局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



延安市市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
记曾岚



延安市公安局党委
副书记
局长牟晓良

近年来，延安各级公安机关在市委、市政府和省公安厅的正确领导下，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公安部、公安厅以及市委、市政府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以构建和谐社会、打造“平安延安”为主线，以“创陕西名片、争全国一流”为目标，坚持用延安精神抓“三基”、带队伍、促工作，推动各项公安工作上很大的台阶。一是全市13县局、分局主要领导的高配全部到位，标志着我市县级公安机关领导班子建设上了个新台阶。二是公安警务保障工作得到明显加强，各级公安机关的硬件设施、装备、办公条件在原有基础上又上了很大的台阶。三是全面启动了警务信息化战略，完成了警务综合平台建设和应用培训工作，警务信息综合平台中的10个系统已经启用。四是超额完成了警务室建设任务，在全省率先高标准并超额完成警务室建设任务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五是城市报警与监控系统建成并投入使用。六是公安基础设施建设和硬件装备上了很大台阶。七是队伍正规化建设和公正执法水平大大提高，民警法律素质和执法办案水平明显提高，公安信访案件查结率达100%，刑事三率全部达标，案件办理合格率达99%。八是推进“平安建设”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各级公安机关始终保持了对各类违法犯罪的高压态势，坚决打击了一批邪教组织的捣乱破坏和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圆满完成各类重大政治警卫和重大活动的安全保卫任务，社会治安呈现刑事犯罪下降、群体性事件下降、交通事故四项指数下降，公安各种呈现大要案件侦破率上升、人民群众满意度上升。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拓宽了办学路子



学院新校址奠基仪式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是经陕西省政府批准成立、国家教育部备案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自2005年8月正式挂牌运行以来，

内部管理更加科学，师资队伍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专业体系日臻完善，招生规模逐年扩大，办学水平不断提高，拓宽了办学路子。

学院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和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建立了东西部对口支援友好院校关系；北大青鸟集团阿博泰克在学院建立了国际软件人才培养基地；交通部天津海事局将海运人员西部培养基地定在学院；学院在延长石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延安旅游集团公司、延安大唐发电厂等48家企业或基层单位建立了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学院办学路子的拓宽，服务功能的进一步提升，使学院出现喜人的局面，2007年录取新生1276名，各项工作迈上新的台阶。



延安市卫生学校为国家培养2万多名医务骨干

延安市卫生学校是陕北地区唯一一所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位于延安市枣园路，占地168亩，校舍面积38000m²，学校拥有5000m²设施完善的学生公寓楼一栋；有设备完善的实验室22个，四个多媒体教室和现代化电教楼一栋，图书馆藏书70000册，各学科电教片250部，有稳定的生产实习基地25处。

学校创建于一九五一年，至今已有五十多年的办学历史。学校现有在校生3200名，现开设：护理、药剂、助产、口腔工艺、检验、医学影像6个中职卫生专业；与北京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开设应用药学、卫生管理、护理学、医学信息管理等4个大专和专升本远程教育；与陕西中医学院开设中医、中药大专和专升本函授教育；与延安大学联合开设临床医学、高级护理和医学影像技术3个高职专业；与延安市卫生局开展公务员和乡村医士培训。目前学校形成了中



延安卫校图书馆电教楼



延安卫校学生公寓楼

专、大专、本科和各类短期培训的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办学模式。学校现有教职工145名，有专任教师88名，其中高级讲师25名，讲师38名，并长期聘请延安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专家教授为学生讲课。办学五十多年来，已为国家培养了20000多名医药卫生技术人才和卫生管理干部，为延安乃至陕西的卫生事业和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目前，延安市卫生学校在校长李升荣的带领下，正以昂扬的姿态，崭新的面貌，坚定的步伐阔步前进，去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延安市农业局局长杨继武

市农业局以服务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市农业局新一届领导班子以中央一号文件为指导，围绕新农村建设总体要求，认真落实各项支农惠农政策，按照“一村一品”发展模式，稳定粮食生产，突出以苹果为主的绿色产业开发，不断加大农业科技推广、示范、研究力度，狠抓农村能源建设，大力开展农产品

质量安全专项整治活动，使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取得了优异成绩。

2007年，全市农村经济总收入68.95亿元，较上年增长13.9%。全市新增苹果面积10.5万亩。新建日光温室大棚5630座，有11个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通过陕西省农业厅认证，蔬菜总产55.15万吨，较上年增长6.19%。新建农村户用沼气池26153口，全市农村户用沼气池累计达到105460口。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全市新建558个农村信息综合服务站，洛川县作为全省唯一示范县，350个行政村全部按照“五个一”的标准建成并投入应用。全市建成市级和13个县级农业信息服务平台，82个乡镇、558个村、12个龙头企业、58个种养大户成为信息服务点，初步形成了“市有中心，县有平台，乡有服务站，村有信息点”的农业信息网络体系。

朝气蓬勃的延安市地方税务局



地税局领导班子成员

延安市地方税务局组建于1994年9月，实行垂直为主、条块结合的管理体制。内设9个科室、2个事业单位，下设直属税务分局、稽查局2个直属机构、13个区县地方税务局和80个税务所。共有干部职工797名，管辖各类纳税人1.6万多户。主要负责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烟叶税等11个地方税种

和教育费附加征收任务，同时承担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水利建设基金、文化事业建设费、残疾人保障金、散装水泥资金、水资源费、煤炭价格调节基金、工会经费、副食品价格调节基金等10项基金的征收管理工作。

延安市地方税务局建局以来，在省地税局和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局继承发扬延安精神，积极贯彻“依法治税、兴税强省”战略，坚持依法、科学、文明、廉洁、和谐征税，锐意进取，不懈奋斗，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绩。1994—2006年累计组织各项收入201.58亿元，其中地方税收167.3亿元，教育费附加11.1亿元，社保费和基金23.18亿元。年组织收入由1994年组建初期的1.18亿元跃升到2007年的46.5亿元，成为构筑延安公共财政的重要支柱和全省地税收入的主力军之一。同时，连续14年荣获市委、市政府“创优评差”最佳单位，被省委、省政府评为文明单位。

延安市粮食局促进了粮食经济健康稳步发展



延安市粮食局局长张康立

市粮食局新一届领导班子不断加强对全市粮食工作的指导、协调、监督、服务，积极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建立和完善各级粮食储备管理体系，增强了政府粮食宏观调控能力；加强粮食市场监督管理体系建设，组建了市粮食质量监测监督机构，加强对市场粮油质量的监督检查；认真开展全市社会粮食供需平衡统计调查，为各级政府决策粮食问题提供了政策依据；大力开展《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宣传活动，行政执法队伍培训切实贯彻国家粮食购销政策，继续坚持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加强城乡粮食供

应，保护了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确保了军需民食。同时，全市粮食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得到全面发展，市粮食局连续三年被省粮食局授予“全省粮食系统‘创优评差’精神文明建设最佳市局”，2002—2003年连续二年被省政府授予“全省粮食购销企业扭亏增盈先进单位”，连续多年被市委评为“五星级文明单位”、“包小康”先进单位，促进了粮食经济健康稳步发展。

奋进中的延安国税



延安市国税局领导班子成员

多年来，延安市国税局在陕西省国税局和延安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持“聚财为国，执法为民”税收工作宗旨，树立“责任、荣誉、和谐”理念，以“延安精神铸税魂”为主线，以绩效考核暨“创佳评差”竞赛活动为载体，大力实施干部教育培训“三个转移”，全面提高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有力地推动了各项税收事业健康和谐发展。连续14年被延安市委、市政府评为“创佳评差”活动最佳局（委），连续9年被评为“五星级文明单位”。2007年，被陕西省国税局评为绩效管理暨“创佳评差”竞赛活动先进单位，被延安市政府纠风办评为全市执法单位政风行风唯一免评单位，被延安市直机关工委评为“党建先进单位”。在陕西省国税局组织的“百佳征管能手”和“百佳稽查能手”竞赛活动中，获得了“双百佳能手”竞赛两个团体第一名的好成绩。

延安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也是新中国税收的发源地。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10月份就在榆林定边县设立了西北税务总局。1939年1月国民党反共活动加剧，边区政府财力日渐困难，边区政府决定建立税务机构，1940年5月9日在延安正式成立了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第一处办公地点设在距市场沟沟口约两公里处，有6面土窑洞，现由宝塔区市场沟小学占用；第二处距市场沟沟口约1.5公里半山坡上的“广兴隆记”，有9孔石窑洞，现为居民用房。

随着延安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税收收入的稳步增长，延安国税得到了上级各部门的广泛关注，国家税务总局和陕西省国税局的领导在调研和视察工作期间，先后多次到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旧址实地视察，希望得到及时地予以抢救和保护。在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2004年10月份延安市文物局已把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旧址列入了延安革命旧址范围，现正在落实抢救恢复方案，广泛征集陕甘宁边区和延安13年时期税收历史资料，为抢救和恢复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旧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延安育才学校注重素质教育



爱国教育

延安育才小学是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期间创办的一所保育小学，具有注重素质教育的光荣革命传统。近年来，学校以“抓管理、重素质、创一流”为奋斗目标，以艺术教育为突破口，在师生中进行“教师一专多能、学生个性发展”的教育改革，取得优异成绩。被国家教育部和省教委等单位命名为“素质教育示范学校”、“陕西省教育科研项目学校”、“陕西省艺术教育特色学校”、“国家艺术教育先进集体”、“省级文明学校”等荣誉称号，被延安市区群众作为孩子进行小学教育最理想的学校。

特种设备检验所

延安市特种设备检验所（原锅检所），成立于1985年4月，1999年归口市质量技术监督局。2002年2月通过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计量认证审查认可验收。

所里在编人员36名，取得大学本科学历者7名，大专学历者17人，工程技术人员32名，占职工总数的88%，其中副高级职称3名，中级职称5名，初级职称24名。具有检验师资格5人，检验员资格25人。目前，形成了锅炉、压力容器、压力容器管道、安全阀、电梯、起重机械、等安装、修理、改造的质量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的检测服务体系。对确保消除特种设备隐患，保证安全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特检所为延安市的特种设备安全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了广大用户的好评和上级的奖励。2006年荣获延安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先进单位、陕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先进单位、创佳评差最佳单位，2007年被延安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评为优秀单位。



特种设备检验全体干部

市民政事业“十五”期间全面发展



袁春河局长作延安乡镇民政工作站建设经验介绍

“十五”期间，我市各级民政部门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工作大局，充分发挥稳压减震的职能作用，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的成绩。自然灾害紧急救助、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五保供养、农村特困户救助和医疗救助等机制基本建立，并取得显著成效。城乡低保基本实现应保尽保。城市医疗救助试点顺利，农村医疗救助全面开，住房救助、教育救助积极推进。双拥优抚安置工作在创新中求得突破，延安市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五连冠”称号。建立了优抚对象抚恤补助经费自然增长机制，成立了延安红军墓园和老复员退伍军人光荣院，退役士兵安置改革不断深入。社会福利与社会事务工作快速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社会化进程加快。累计销售社会福利彩票1.2亿元，“明天计划”，“星光计划”卓有成效。城乡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全面推进，社区建设得到全面加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顺利实施。民间组织管理工作进一步加强。区划地名工作取得新成绩。特别是基层民政组织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在全市创建了178个民政工作站，人员编制超过600名，从根本上提高了民政部门为群众服务的水平，为更好地落实党和政府的救助救济政策开通了“直通车”。

责任编辑：王庆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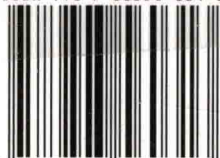
封面设计：阎伟东

照片提供：延安市文物局



杨家岭中共中央七大旧址

ISBN 978-7-80356-031-3



9 787803 560313 >

定价：28.00元